

ROBERTO BOLAÑO

EL ESPÍRITU DE LA CIENCIA-FICCIÓN

科幻精神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侯健 译

《2666》作者科幻迷波拉尼奥文学宇宙的地基
媲美《荒野侦探》的青春诗篇

科幻不仅是宇宙航行、外星生物或对未来科技的预言，
更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一抹对抗暗淡生命的明亮激情

文
景

HORIZON

科幻精神

罗贝托·波拉尼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幻精神 / （智）罗贝托·波拉尼奥著；侯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500-6

I．①科... II．①罗...②侯... III．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54729号

书 名：科幻精神

作 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译 者：侯健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张 晨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500-6/I·1995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以 设 未 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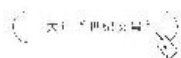
豆瓣 do-ban



bilibili



说前世的因果
是我个左眼的「欠子」



EL ESPIRITU DE LA CIENCIA-FICCION by Roberto Bolaño

Copyright © 2016, The Heirs of Roberto Bolaño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卡罗琳娜·洛佩斯

目 录

[1](#)

[2](#)

[墨西哥宣言](#)

[译后记](#)

“能允许我对您做个采访吗？”

“当然可以，但请短一点。”

“您知道自己是这个奖项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吗？”

“真的吗？”

“我刚和一位组织者聊过。我感觉他们都挺激动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这是项殊荣……我很高兴。”

“所有人看上去都很高兴。您喝的是什么？”

“龙舌兰酒。”

“我喝的是伏特加。伏特加是种奇特的饮品，不是吗？我们女人很少喝它，我是说纯伏特加。”

“我不知道女人一般喝什么。”

“啊，是吗？总之，无所谓了，女人喝的东西一向都是秘密。我说的是她们真正在喝的东西，永远会喝的东西。不过咱们不聊这个。今晚月色很好，您不这么认为吗？从这里可以望见最偏远的村镇和最遥远的星辰。”

“这是种光学效应，小姐。你要是认真盯着看的话，会发现那些大窗户正以一种非常神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模糊。咱们到外面露台上去吧。我觉得咱们正待在森林中央，大概只能看到树枝。”

“也就是说那些星星都是纸做的喽。那城镇的灯光呢？”

“磷光。”

“您可真是聪明。好了，请谈谈您的作品吧。谈谈您自己，再谈谈您的作品。”

“我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大家都在那边不停地唱歌跳舞，我不知道……”

“您不喜欢聚会吗？”

“我觉得所有人都已经醉了。”

“他们都是之前几届竞赛的获奖者和决选作家。”

“上帝啊。”

“大家都在庆祝新一届竞赛结束。这很……自然。”

扬的脑子里闪过了某些幽灵以及某些幽灵般的日子。我认为那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声喘息，而现在扬已经冒着大汗躺在了地上，嘴里直喊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手势和僵硬的动作，他好像是想让我明白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什么？我说话的同时，他的食指还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上下摆动。啊，臭狗屎，扬说道，疼死我了，是老鼠，是些擅长登山的老鼠，妈的，然后他又说，啊啊啊。而我则扶着他的胳膊，或者说是把他按住，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他不仅汗如雨下，而且下的还都是冷雨。我明白自己应该出门找医生，但直觉告诉我他不想一个人待着，又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出门。（那天晚上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漫漫长夜。）事实上，从某种特定视角来看的话，我认为扬并不在乎我的去留，但是他不想看医生。所以我对他说，你别死，你就像是《白痴》里的那位公爵，要是咱们有镜子的话，我肯定会给你拿过来，但既然咱们没有，那么相信我，试着放松下来，你可别死。于是，在流了至少有挪威海那么多的汗水之后，他说我们这间屋子的房顶上全都是基因变异的老鼠。你没听到它们的动静吗？他颤抖着说道。我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我回答说，听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幢八层楼的顶层阁楼里听到老鼠的窸窣声。啊，扬说道。可怜的公寓，他说。他的身体又瘦又长，我不由暗下决心今后要多在意一下他的饮食。后来他似乎睡着了，眼睛半闭着，脸冲着墙。我点了根烟。透过我们屋子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早晨的最初几道光线已经显现。楼下的街道依然一片漆黑，也没什么人，但车子已经如常出现了。突然，我听到背后传来了扬的鼾声。我看了看他，他睡着了，半裸着躺在没铺床单的床垫上，他的额头上贴着一缕黄发，他的头发慢慢干了。我倚在墙上，任由自己滑坐到角落里。一架飞机从窗框处飞过，红灯，绿灯，蓝灯，黄灯，像是彩虹下的蛋。我闭上眼，回想着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想着那一幕幕悲伤的场景，它们似乎可见亦可触。后来我脱了衣服，到自己的床垫上躺下，我试着去想象扬做的噩梦，就在睡着之前，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那天晚上扬肯定感觉到了很多东西，但不包括恐惧。

亲爱的爱丽丝·谢尔登^[1]：

我只想对您说我对您抱有深深的敬意……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您的作品……当我不得不拆散我的图书馆时——它从来就不大，但也不算小——我无法做到把您的所有作品都送人……所以我留下了《在世界的围墙之上》^[2]，有时我还能背出几段……背给我自己听……我也读过您的短篇小说，但很不幸后来我慢慢就找不到它们了……它们通常会被收入某些选集或是刊登在杂志上，然后流入我的城市……有个家伙总是借给我稀奇的东西……我还认识了一位科幻作家……很多人说他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位科幻作家……不过我不信……雷莫对我说他妈妈在十年或十五年前还认识另一位科幻作家……那人叫贡萨雷斯，或者我朋友记得他叫这个名字，他在瓦尔帕莱索医院统计办公室工作……他给雷莫妈妈钱，还给其他姑娘钱，目的是让她们买他写的小说……他的书也是他自己掏钱出版的……在瓦尔帕莱索那个天色暗红的下午……贡萨雷斯等在书店门外，雷莫的妈妈进去买书……那里当然只卖统计办公室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会买的书……雷莫还记得他们的名字：玛伊特、露西娅太太、拉巴纳雷斯、佩雷拉……但他不记得书名了……《火星入侵》……《向烟雾缭绕的仙女座飞去》……《安第斯山的秘密》……我想不出更多名字了……也许改天我能找到一本……读完后我就把它寄给您，作为对您带给我的愉快时光的简单报答……

您的朋友，
扬·史瑞拉

^[1] 爱丽丝·谢尔登（Alice Sheldon，1915—1987），美国科幻作家，以笔名小詹姆斯·蒂普垂（James Tiptree Jr.）为人熟知。1970年代她发表了多篇杰出的女性主义短篇科幻小说。——中译注，下同

^[2] *Up the Walls of the Word*（1978），爱丽丝·谢尔登出版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探讨了心灵感应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心灵现象是否真实。

“咱们聊聊您的获奖作品吧。”

“好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你想让我说说它讲了个什么故事吗？”

“我很乐意。”

“故事发生在圣塔芭芭拉，一个位于智利南部、靠近安第斯山的村子。那是个可怕的村子，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和墨西哥的这些美丽的小村子完全不一样。不过有个特别之处让它显得高贵了起来：村里所有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我必须承认我没去过那里，但在我的想像中它是这样的：街道路面没铺砖，建筑物表面都是或深或浅的栗色，没什么小路，或者就像西部片里那样，屋前有粗糙的木制坡道，可以在雨季防止泥沙入屋。故事就始于这个噩梦般的村子圣塔芭芭拉。具体来讲，发生在马铃薯研究院或者说土豆研究院，那是栋如谷仓般的三层建筑，房顶上还立着铁制的风向标，它可能是加尔瓦里诺街上最荒凉的建筑了，实际上却是未知大学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系部之一。”

“这真吸引人，继续，继续。”

“一楼只有两个房间。第一间屋子很大，之前人们甚至会在里面存放拖拉机；另一间则非常小，而且位于角落。那个大房间里放着些桌子、椅子、档案柜，甚至还有睡袋和垫子。墙上钉着海报和不同种类块茎的图画。小的那间屋子里则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地板、屋顶和木头墙壁，但和用来搭建这整栋建筑的那些旧木头不同，这里的木头都是新的，裁切打磨得很好，颜色几乎可以说是乌黑发亮。你不会听得无聊吧？”

“不会，继续，继续。我这也算是在休息了。您可不知道今早我在墨西哥城做的那些采访有多么费劲。我们这些记者活得就像奴隶一样。”

“好吧。沿着没有扶手的楼梯走上去就到了二楼，那里又有两个房间，面积都一样。其中一间里面有好几把椅子，样式各不相同，还有张写字桌，一块大黑板和其他一些物件，这些东西让人隐约感到，或者说应该说模糊地感觉到，这里是间教室。另一个房间里就只放了些老旧生锈的农具，不过通往三楼的楼梯也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在三楼可以看到一组无线电收发设备，还有一堆展开铺在地上的地图、一台FM调频收音机、一套半专业的录音设备，以及一系列日产扩音器，等等。我说‘等等’是因为还有些东西我没提到，因为它们无关紧要，或者说我会在后面慢慢讲到，到时候您就能知道所有细节了。”

“亲爱的朋友，您这悬念可真够折磨人的。”

“咱们就省掉那些荒唐的景物描写吧。且说在三楼，在那间巨大又冷清的顶楼房间里，能找到所有现代或近乎现代的通信工具。那组供教学使用的无线电收发设备是研究院从前拥有的许多现代设备中仅存的一套了，其他设备都被迫出售了，因为未知大学压根儿对这里不管不顾，再加上这边的负责人也得填饱肚子。这所研究院完全处于无序状态，据说从几个月前开始就没人再费心擦擦洗洗了。那个房间有两扇窗户，就房间的面积来看，窗户的数量是太少了，每扇窗户都装有木制百叶帘。从朝东的那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群山。而从另一扇望出去看到的则是无尽的森林，还能看到一条路的起点或终点。”

“真是闲适的景色。”

“闲适的景色或可怕的景色，就看你怎么看了。”

“嗯……”

“研究院周围一圈都是花园。以前那里通常停着木轮马车或卡车。现在除了负责人的那辆越野自行车之外，那儿连一辆车都没有了。负责人六十多岁，热爱健康的生活，所以才买了辆自行车。花园边竖着木栅栏，上面还缠着铁丝网，只有两个入口。正门又大又

重，外面挂着块发黄的金属牌子，上面用黑色的字写着：马铃薯研究院—饮食研究3。再往下还有行小字，写的是街名和门牌号：加尔瓦里诺800。另一扇门在花园后方，普通访客习惯走那扇门。它很小，不面向街道，门前是片空地，然后是森林，还有那条路。”

“那条路是从阁楼上可以望见的那条吗？”

“没错，路的尾巴。”

“能住在阁楼上可真好啊，虽说面积不大。”

“我在那种房间里住过数不清的日子，真的不推荐你住。”

“我说的不是房间，而是阁楼。”

“都是一回事。景色是一样的。和绞刑架上的视野差不多，但确实能看得很远。日出和日落都看得到。”

我认为那是个理想的场景，画面啊，想法啊，都可以围绕它展开：一个身高一米七六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蓝衬衫，顶着太阳站在美洲最长的大道边。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来到了墨西哥，从高楼间隙中透过来、射到我们身上的是我们梦想过无数次的墨西哥城的阳光。我点了根烟，寻找我们的窗户。我们住的是栋灰绿色的房子，三天前，扬一看到我们的住处就说那像是德意志国防军^[1]军服的颜色。公寓的许多阳台上摆着花，再往上能看到屋顶阁楼的窗户，它比有的花盆还要小。我试图喊扬到窗边来，让他看看我们的未来。然后呢？然后就走人，告诉他我要走了，扬，我会带些鳄梨回来吃的（还有牛奶，尽管扬憎恨牛奶），还会带回来好消息，超级男孩，完美平衡，超棒的工作会接踵而来，我会成为诗歌版面的明星记者，我的电话会响个不停。

此时我的心脏开始以奇异的方式怦怦乱跳。我想：我是公路和人行道间的一尊雕像。我没有喊叫。我开始前进。几秒钟后，我还没走出我们那栋大楼投下的阴影，又或者没走出笼罩着我们那栋大楼的阴影，此时我的形象映在圣伯恩斯商店的玻璃上，奇怪的精神复制品，一个穿着破旧蓝色衬衫的年轻人，头发长长的，正奇怪地倾斜着身子，如同要在珠宝和罪行前跪倒一般（可到底是什么珠宝，什么罪行呢？我立刻就忘了这些东西），怀里抱着面包和鳄梨，此后它将永远被人们称作牛油果，还有一升拉拉牌牛奶，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杳无人烟的地方，那不是我的眼睛，是迷失在窗户玻璃黑洞中的一双眼睛。

我缓缓转过头。我是知道的。扬正从窗户探出身子来望我。我在空中挥了挥手。扬喊了些不知所云的话，还把半个身子都探了出来。我吓了一跳。扬为了回应我，先是来回晃着脑袋，然后又转着圈地摇，而且越摇越快。我很害怕他会掉下来。路过的行人看到我呆立在原地，于是也目光上移，他们刚好看到扬伸出一条腿来，做出踢打云朵的动作。他是我朋友，我对他们说道，我们刚到这里没几天，他正在给我加油鼓劲呢，我马上就要去找工作了。啊，真好啊，真是个好朋友，有的人这样说道，然后微笑着继续赶路去了。

我想，在这样一个包容的城市里，我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当时我离命运之神的安排是多么近，又是多么远啊！我记忆中那些最初的墨西哥式的微笑是多么清澈，又是多么让人感伤啊！

[1] 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1935—1945年间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军种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武装党卫队在有些时期也从属于国防军。

“我梦到了一个俄罗斯男人……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梦到了一个金发女郎……傍晚……你懂的，似乎是在洛杉矶的郊外，但是没过多久那里就不再是洛杉矶了，变成了墨西哥城，金发女郎则走在透明的塑料隧道里……她的眼神充满哀怨……不过这是我昨天在公交车上做的梦。”

“我梦里的那个俄罗斯男人倒是很高兴。我感觉他马上就要登上宇宙飞船了。”

“这么说他是尤里·加加林。”

“我再给你添点龙舌兰酒？”

“好的，伙计，来一点儿吧。”

“最开始我也以为那是尤里·加加林，但你肯定想象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在梦里被吓得汗毛直竖。”

“可是你睡得不错。我写作到很晚，我看你睡得挺好。”

“好吧，那个俄罗斯人钻进宇航服里，当时他是背对着我的。换好衣服他就走了。我想跟着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迈不开步子。这时俄罗斯人转过身来，向我挥手道别……你知道怎么着？你猜他是谁？”

“我不知道……”

“一只海豚……宇航服里是只海豚……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特想哭……”

“可你连鼾声都没发出来。”

“太可怕了……现在我不怕了，不过梦里那个场景可真是骇人，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我的嗓子眼儿。不是死亡，你明白吗？更像是喝醉了的感觉。”

“一只来自列宁格勒的海豚。”

“我觉得这是个启示……你昨晚没睡觉？”

“没有，我写了一整晚。”

“你不冷吗？”

“冷得很。妈的，我还以为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挨冻呢。”

“天快亮了。”

我俩的头刚好可以挤进窗框里。扬说他想到了鲍里斯，他说那话时就好像是在说着什么无足轻重的事情。

太阳说：我升起来啦，你们要习惯这一切，每隔三天我就会露一次脸。

“啊呀，瞧瞧这日出。”扬说这话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拳头攥得很紧。

我开始在《国家报》的文化副刊工作了。副刊的主编罗德里格斯是个年老的安达卢西亚诗人，曾是米格尔·埃尔南德斯^[1]的朋友，他允许我在每期副刊上都发表文章，也就是说一周一次，每月四次。赚来的钱足够支撑我们生活八九天。至于剩下的二十一天，我就靠给一份历史杂志撰稿来补足，那份杂志的主编是个阿根廷人，和罗德里格斯一样老，但是皮肤更加光洁紧实，我从没见过保养得那么好的人，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给他起了个“洋娃娃”的绰号。要是还缺钱的话，就得靠我的父母以及扬的父母来帮衬了。大概就是这样吧：30%的生活费从《国家报》赚，另外30%我们各自的父母给，再有40%是靠给《历史与世界》撰稿得来，“洋娃娃”的那份期刊就叫这个名字。我习惯用两天左右的时间把给《国家报》写的那四篇文章完成，都是些诗集的书评，有时也给小说写书评，也有很少的几次给散文写。罗德里格斯每周六上午把书交给我，那也是所有或几乎所有与副刊有合作的人挤在小办公室里开会的时间，大家在那里递交工作成果，领走报酬，有的人会提出一些想法，那些想法往往糟糕透顶，罗德里格斯通常不会接受，因为他不想让副刊变成个笑话。大伙每周六聚在一起最主要的目的是和朋友聊聊天，说说敌人的坏话。所有人都是诗人，所有人都喝酒，所有人都比我年纪大。聚会不是很有趣，但我从没缺席过。罗德里格斯一宣布散会我们就会到咖啡馆去，我们会在那里继续聊天，直到诗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只剩我独自一人坐在原地，双腿交叉，透过大落地窗欣赏永无止境的美景、墨西哥城的男男女女、专注工作的警察，太阳则藏在屋顶后面，像是在监视着这个星球。和“洋娃娃”的合作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首先，出于日益增长的羞耻心，我拒绝在任何一份稿子上署真名。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洋娃娃”时，他先是痛苦地眨了眨眼睛，然后立刻接受了。你想署什么名呢，伙计？他嘀咕道。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答案：安东尼奥·佩雷斯。好啊，好啊，“洋娃娃”说道，你是个有文学野心的人。不，我发誓我没有，我撒谎道。不管有没有我都会要求你写出高质量的稿子，他说道。然后，每次提到这个时他都会显得有些难过，就着这些话题编些漂亮的故事出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迪林杰^[2]，第二篇写的是那不勒斯的克莫拉^[3]。（安东尼奥·佩雷斯竟然成段引用了康拉德一则短篇小说中的文字！）后来我还写了“情人节大屠杀”^[4]，瓦拉瓦拉市女投毒者的人生，林德伯格之子绑架案^[5]等。《历史与世界》杂志社位于林达维斯塔区的一幢老建筑内，每次我去送写好的文章时，从来就没碰到过除“洋娃娃”之外的任何人。我们的对话也很简短，我交文章，他给我新的工作，还会给我些参考资料，例如他在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主编的一份刊物的影印件，还有在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出版的类似刊物的影印件，我有时会从那些资料里提取信息，有的时候甚至会大段抄袭。“洋娃娃”经常向我问起扬的父母，他很久之前就认识他们了，然后他会长叹一声。史瑞拉家的公子最近怎么样？挺好。他做什么工作？他没工作，他还在上学。啊。就这样。扬自然已经不再上学了，我们骗他的父母说他还在上学，这会让他们更安心一些。事实上，扬压根儿就没怎么走出过阁楼。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他当然也出过门，只不过是从房间走去厕所，或从房间走去淋浴间，厕所和淋浴间都是我们和阁楼里的其他租客共用的。他有时也会下楼，绕着起义者大道走一圈，顶多走上两个街区，通常走得很慢，像是在打探什么似的，走不了多久他就会返回住处。我时常会感到孤独，我需要认识更多人。在《国家报》体育版工作的一位诗人给我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对我说：去参加哲学和文学系举办的诗歌讲堂。我对他说我不相信诗歌讲堂能真的教什么好东西。他对我说道：你在那儿能遇到年轻人，和你年纪相仿的人，而不是那些一门心思想着找个地方领工资的失败者或醉汉酒鬼。我笑了。现在这家伙马上就要哭了，我想道。他说道：女诗人，那里有女诗人啊，小老弟，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啊。

[1]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 1910—1942），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

- [2] 约翰·赫伯特·迪林杰（John Herbert Dillinger, 1903—1934），大萧条时期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一名银行抢匪和黑帮成员。其震惊世人的犯罪事迹已成为美国经典的都会传奇。
- [3] 克莫拉（Camorra），类似黑手党的秘密组织，起源于那不勒斯地区，是意大利最古老的犯罪团体之一。
- [4] 指1929年2月14日在美国芝加哥市发生的一起黑帮争斗事件。
- [5]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1932年，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仅二十个月大的长子被绑架并遭杀害。凶手认定与案件背后隐情至今仍有争论。

亲爱的詹姆斯·哈尔：

我在墨西哥的一份杂志上读到您准备创建一个由美国科幻作家组成的协会，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这个想法不错，但却有些笼统，很可能是因为那份杂志搜集到的信息有限，不足以展现你们的真实意图。您就姑且把这封信看作一个拉丁美洲科幻作家写给您的吧。我今年十七岁，还没有任何作品发表。我曾经把自己写的东西交给我的国家的一位文学老师看过，他是个体面人，（疯狂）痴迷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同时还以更加平静的方式热爱着文学共和国，只有来自我们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的读者才会是这个样子。想象一下某个来自深南部的药剂师，或者迷失在亚利桑那州某个小镇里的人，再或者是维切尔·林赛^[1]的某个狂热读者，这样你就能对他有个大致的概念了。或者也不用对他有概念，您继续读信就好。我刚才说到我把我的习作交到了他的手上。那位亲爱的老师读过我的短篇小说后说道：亲爱的扬，我希望你当时没有吸烟。他指的是抽大麻，但那不对，据我所知，抽大麻是不会出现幻觉的，他是想说希望我不要再靠迷幻剂或其他什么东西来胡写了。（不得不说的是，在学校里大家都说我是个聪明的学生，但是注定会被人“遗忘”和“抛弃”。）亲爱的老师，我对他说道，那是篇科幻故事。那个体面人想了一会儿。但是，扬，他回答道，这些东西太虚无缥缈了。他的食指抬了起来，几乎都要指着西北方向了，然后又忽然直直地指向南方，可怜的帕金森患者，或者说我可怜的头脑啊，即便在当时，“现实”也会让他们颤抖和迷茫。尊敬的老师，我争辩道，举个例子，如果您觉得我们不能写星际旅行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per saecula saeculorum^[2]靠着别人的梦想和愉悦而生活了，除此之外，您还应该留意一下我笔下的人物都是俄罗斯人，这可不是随意为之。我们的梦想，我那位从来没有太受别人尊重的老师嘀嘀咕咕地说道，应该是成为1928年的法国。由于我不清楚那年在巴黎发生过什么，我只好结束了那场争论。第二天，我俩又在学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说：老师，迟早有一天会有人把1939年的法国囫圇个儿地塞进您的屁眼里的。要是我能预知未来的话，当时肯定不会说出那句诅咒了。仅仅几个月后，那位我永远怀念的老师就在宵禁期间借着月光散步时死掉了。至于那些我写的故事也已经找不见了。您认为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写出好的科幻文学作品吗？您的那个协会，愿上帝保佑它，真的正在策划颁发奖金——雨果奖、星云奖——给第三世界国家里写机器人写得最好的人吗？还有，您领衔的团体是否考虑过在政治领域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呢？当然了，我指的是站在同情者的角度给予的支持。希望能立刻收到您的回信。

诚挚的问候，

扬·史瑞拉

^[1] 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美国诗人，被认为是现代吟唱诗歌之父，力图复兴诗歌的音乐性质。

^[2] 拉丁语，意为“永远永远”。

诗歌讲堂的主讲人是桂冠诗人赫雷米阿斯·莫雷诺，举办地点是在三楼文学系，那间屋子很小，有人用红色喷漆在墙上喷了几个字：阿尔希拉·索斯特·斯卡弗^[1]曾至此处。字喷在离地三十厘米高的地方，清晰却又卑微，来客如果不低头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它。第一眼看上去，那个涂鸦平淡无奇，可要是连续几分钟重复读它的话，你就会感觉其中蕴含着呐喊般的力量，甚至让人有些难以忍受。我问自己写下这句话的人是谁，看颜色不是新近写的了，那些好动的清洁工没有把它擦掉，看来是天意，可是这位在离地数十厘米的位置安营扎寨的阿尔希拉到底是何许人也？

赫雷米阿斯似乎是想让我更加迷茫一些，他突然问我怎么会想来这儿的。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便对他解释说是《国家报》的棒球专家科林建议我来他的诗歌讲堂的。我当时用了建议或意见之类的说法，我差一点就要在那说法前面加上“精彩的”或“卓绝的”之类的形容词了，但是他奇怪的表情阻止了我。只用了几秒钟时间，我就让所有人都讨厌我了。

“我完全不清楚那位先生是什么人。”

“矮矮的，皮肤有点黑，鹰钩鼻。”我结结巴巴地答道。

“毫无头绪。”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我认为是那个涂鸦，那些像是具有磁力般的红色字迹，让我立刻在脑子里联想到了贫穷与善良，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何，不过正是这个想法压制住了我跑出去的冲动。我不记得赫雷米阿斯·莫雷诺是什么时候请我坐下的了，也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严厉抨击我的祖国的了。参加活动的人们把椅子围成圈，只留出了门的位置。那些诗歌学徒中没有女生，我有种深深的挫败感，而且在环视过他们的面容之后，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善茬。

谁先来读？一个瘦瘦的男生早就把他写的诗复印了三份，分发了下去。我没拿到，但我伸长脖子，瞅到了坐在我旁边的学生手中的纸上写着的那首诗的标题。《柳树》，男生说道，嘿嘿，有点形而上学的意思。那就继续吧。我越听越糊涂，我像失眠时数羊那样数了数，他一共念了二十句诗，也可能是三十句。又或者像是在作者屁股上踹了十五脚。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一阵“嗯嗯”的声音，还有几声咳嗽，也有人在偷笑，有人发出“啊啊”声。我的感觉是，一个胖男生说道，你是想戏弄我们。要注意节奏，我想。不，不，永远都不能连用两个副动词。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和”呢？为了显得更有力量，让柳树显得更有力量。真是群狗屎大学生，我心想。我只承认我受到了马里亚诺·佩雷斯的影响，有些惊慌的作者说道。（后来我才知道那位马里亚诺·佩雷斯是赫雷米阿斯的同行，另一个诗歌讲堂的主讲人，那是官方的诗歌讲堂，系里组织的。）好了，行了，够了，赫雷米阿斯带着怒意说道。好吧，我还是觉得写得不咋地，胖男生说道，你肯定有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首诗有些模仿弗罗斯特^[2]的痕迹，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加入了讨论。赫雷米阿斯就要发作了。可是你只读过弗罗斯特的选集，笨蛋。好了，再读一读那句，就是写柳树哭泣的那句。T.S.艾略特？博尼法斯·努尼奥^[3]？马里亚诺？拜托，咱们别再把马里亚诺扯到这桩罪过中来了。诗句排列的方式，眼镜男说道，很有趣。赫雷米阿斯夺过他身边的一份复印件。倒过来看的话，诗句被刻意排列成了柳树的样子。我猜这是空间设计，是在模仿让-克拉伦斯·兰伯特^[4]吗？我发誓只是个巧合。也许是因为你读得不好。赫雷米阿斯真是没有耐心的和事佬。谁想再读一遍？就你吧，赫雷米阿斯，你读得最好。好吧，咳咳，咱们再来试试。柳树还记得地平线吗？啊，是的——他露出了鳄鱼的笑容——确实有马里亚诺的影子，毫无疑问。因为马里亚诺是我的老师。能看出来，好吧，你看，把前二十句删掉，留下结尾，结尾很有力量，现在谁还想读读自己写的？

小伙子们看了看手里的纸，没能下定决心。赫雷米阿斯像专业的心理分析师那样看了

看表。我听到走廊上传来了喊叫声、说话声、学生们的道别声、摔门声，直到另一位诗人站了起来，他的嘴巴张得还没吐烟圈的嘴型大，也像前一位一样，他在读诗前先分发了三份复印件。

朗读完，所有人都点了点头，显得很满意。啊呀，马尔克斯，你进步很大啊，赫雷米阿斯说道，但是要注意别总是提到“爱”，马尔克斯，听起来像是贺拉斯的诗。我感觉这位马尔克斯大概正处在热恋期。嘿嘿嘿。大家在赞许的同时也有些羡慕马尔克斯的好运气。是首好诗，对，先生。受夸赞者心怀感激，掏出之前揣在口袋里的骆驼牌香烟，给大家递了过去。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烟，笑了，因为所有人都笑了。我想，这样的讲堂就像是为内向无聊的人准备的小型迪厅，尽管很快我就得到了机会证实这种想法，但其实它是大错特错的。就只有这一首吗，马尔克斯？对，我就只用打字机打出了这一首。诸位真的喜欢吗？是首好诗，前所未有的，讽刺性强，强劲有力，赫雷米阿斯做了总结。马尔克斯的脸色不断变化，夹杂着骄傲和孤独感，就像是碗奇怪的杂色汤。

我当时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吃的，在想窝在阁楼里的扬，在想通宵运营的墨西哥公交车，在想鲍里斯，在想悲伤地坐在这间不祥的屋子里的自己。但是我没有离开，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门突然被打开了，走进来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他穿着满是油渍的牛仔裤和一双黑色皮靴，他说了句大家好，但依然站着，背对着我，诗人们不耐烦地挪动椅子，而赫雷米阿斯回了句，晚上好，何塞。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有意为之，虽然表面平静，但是赫雷米阿斯眼神和眉毛的动作已经表明了他的不悦。那个小伙子的头发很黑，留到了肩膀处，裤子后兜里插着本书，就像是飞船的反应堆。我觉得他是个神风特攻队队员，或者其他类型的奇怪飞行员。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也有其他很多别的身份，例如穿梭在这座城市中的越来越多的文学讲堂旅者，不过显然在那些讲堂里他也会显得格格不入。他不在意诗人们正在交换的讽刺眼神，反倒是觉得大家赶忙给他腾位置的举动很是有趣——我和一个之前一直在沉思的学生中间也腾出了个位置——哪怕当大家七嘴八舌向他发问时，他也显得很平静：出交通事故了吗？带诗歌来了吗？出城了吗？有没有读过那本新书……

他微微一笑，回答说没有。他说他没有出城，没有出事故，没带来诗歌——更没把它们复印三份——但那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记性很好。

“我来给诸位背一首吧，伙计们。我给这首诗起的名字是《爱神与死神》。”

这个墨西哥小伙斜靠在一把椅子上，眼望屋顶，开始背诵起来。

[1] 阿尔希拉·索斯特·斯卡弗（Alcira Soust Scaffo, 1924—1997），乌拉圭女诗人，在墨西哥定居二十余年。1968年曾参与抵抗军队占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运动。她也是作者另一部作品《护身符》的主人公奥克里西奥的原型。

[2]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美国诗人，诗作内容多贴近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并融入对宇宙人生的思索。

[3] 博尼法斯·努尼奥（Bonifaz Nuño, 1923—2013），墨西哥诗人、古典文学研究者。

[4] 让-克拉伦斯·兰伯特（Jean-Clarence Lambert, 1930— ），法国诗人、艺术评论家。

“研究院的负责人是个精力充沛的家伙。他在研究院的二楼过夜，到村子里的一户人家吃饭。每次出门他都会骑上那辆自行车。晚上他就在煤气炉上随便做点吃的，一旁的收音机还会播放民谣。吃完饭后他习惯喝杯茶，抽支烟。这些都做完后他才会去在麦克风前开始工作。他的直播节目不是很有趣，都是些关于如何让马铃薯产量翻两倍或三倍的指导建议，还有如何用一百种不同方法烹饪马铃薯，例如马铃薯汤啊，马铃薯酱啊，当然还有如何储存马铃薯五年甚至十年，等等。他的语速很和缓，语气有些严肃，尽管缺乏激情，但是完美的男声能让听众们感到信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他的节目。应该不会太多。那片地区没有听众摸底调查。不过如果有人认真听的话，肯定早晚能察觉到他的声音不仅缺乏激情、有点懒洋洋的，甚至是非常冰冷的。节目结束后他会再吸支烟，然后在类似日志的本子上记录下当天的观测结果。之后他会打开录音机，磁带开始静静地转动，他坐着睡去，或者说让人觉得他是在睡觉。”

“磁带是在外放还是在录音？”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那个男人只是在假装睡觉，其实是在听声音。那幢如谷仓般的建筑整晚都在吱嘎作响，每次受到强风的拍击，它都会发出轻微又奇特的呻吟声，那个男人一直仔细听着所有这些声音，直到他感到无聊为止。有时他会梦到鲍里斯。”

“他不是听一整晚吗？”

“不是，他会觉得无聊，然后就去睡觉。当然了，磁带还会继续转动。负责人大概早晨八点钟会醒来，那时候他才去按停止键，然后倒带。对，研究院的生活并不那么有趣。风景很美，空气也很有益健康，但是生活很无趣，而且负责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做那些作用存疑的工作。在他的诸多工作里，我们不妨挑出其中的三项：在晚上讲授关于马铃薯的知识，静静地录音，使用那组无线电收发设备。这最后一项工作甚至比前两项更加无趣。简单地说，就是在各个波段里搜索一条从未收到的信息。但是，他有无限的耐心，每天每隔八小时他就发出这样一条信息：HWK，能听到吗？HWK，能听到吗？这里是马铃薯研究院，HWK，这里是马铃薯研究院，这里是马铃薯研究院.....”

“没人应答。”

“没有。负责人在寻找某人，但却无人应答。也有几次他听到了点遥远的声音，可能是其他的无线电收发设备发出的，都是些只言片语。而多数时候他只能听到电流声。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好吧.....”

“非常有意思。这个可怜的负责人操着地道的智利口音。想象一下他用如笛声般的嗓音自言自语道：HWK，能听到吗？HWK，能听到吗？哈哈.....真够沉得住气的.....”

亲爱的福斯特·J.阿克曼^[1]：

梦到特娅·冯·哈堡^[2]，睡半小时就够了。我睁开眼睛，对她说我很冷，我从未想过在这个纬度还会感到冷。（在某个地方放着条毯子，但我没办法伸手把它够过来。）她靠着门站着，旁边是张雷莫刚带回来没多久的海报。我又闭上了眼睛，对她说：告诉我，我到底是在哪儿呢。从窗户透进来几丝光亮，远处建筑的影子也投了进来，又或者是特卡特^[3]的霓虹广告牌闪烁了一整晚。我孤独吗？我问她，她笑了，没从门边走开，她的眸子大而深邃，死死地盯着屋中一角，我正在那个角落里瑟瑟发抖。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样子保持了多久。在某个时刻我记起了些什么，然后就开始哭泣。我看了看她的脸，对她说，你看我被冻哭了，我的毯子死到哪里去了。我特别难过，不停地抱怨。我不知道我想让她做些什么，打开门回到属于她的那片云彩上去，还是走过来擦干我的眼泪。我冲她笑了。她的颧骨闪着亮光，她就像是尊盐制雕塑。特娅·冯·哈堡，我对她说道，告诉我，我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战争已经开始了吗？我们都完蛋了吗？她没回答我，但那种局面没有持续很久。我看了看雷莫的闹钟，凌晨三点。（我的脸倒映在闹钟的玻璃屏上。）我在三点十分时醒来了，还给自己泡了杯茶。现在四点钟，我边给您写这封信边等待天亮。我从没读过您写的东西，阿克曼先生，我只读过那篇可怕的序言，害人不浅的编辑在那篇文字中称呼您为“科幻先生”。我的这封信是要寄到Ace出版公司的，也许甚至您也已经去世了，可能那家公司压根儿都记不得您了。不过由于我猜您还继续深爱着特娅·冯·哈堡，所以我还是决定写这封信。我梦中的她长什么样子？一头金发。眼睛很大。她穿了身“一战”时期的蕾丝连衣裙。她的皮肤发着光，我也不知道，我感觉那光会把人刺伤。梦里的我觉得那皮肤很可能无法复原了。说实话，要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可真不是件容易事。

一个拥抱，
扬·史瑞拉

[1] 福斯特·J.阿克曼（Forrest J. Ackerman, 1916—2008），美国杂志编辑，早期科幻圈代表人物，有“头号科幻迷”之称。

[2] 特娅·冯·哈堡（Thea von Harbou, 1888—1954），德国作家、导演、演员。1963年Ace出版公司出版了哈堡的科幻小说《大都会》（*Metropolis*），阿克曼为之撰写了序言。

[3] 特卡特（Tecate），墨西哥知名啤酒品牌，以酒精含量低、容易饮用著称，是墨西哥市场上销量最高的啤酒品牌之一，后被喜力国际收购。

“在讲更重要的事情之前，我想是时候跟您谈谈瓦乔费欧博士了。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也不能不提，谈谈他是件锦上添花的事。他就像横梁上的油漆一般。我不知道我没有说清楚。他就像是一线光，对我们的努力而言就像是袖珍版的何塞利托……”

“您似乎有些激动？您这么年轻，也还记得何塞利托？”

“记得，不过您也别太在意。最好还是问问我，研究院的档案柜中都放了些什么。”

“请吧，请讲讲吧。”

“里面放的都是关于马铃薯的课程材料，负责人要么通过电台传授了相关知识，要么就是在还有学生去研究院上课时曾把它们分发给学生。材料全都没有标注日期，也没有署名，只是所教授课程的内容，按学期归档，要上满三年。从这些材料来看，这位老负责人还要给一些以马铃薯相关事务为生的专家授课。”

“我不喜欢土豆，吃多了容易发胖。”

“问问我研究院里有哪些藏书。”

“请讲吧。”

“如果不算课本和练习册，也不算所有那些和马铃薯有关的书籍的话，那就只剩下一本了，佩德罗·瓦乔费欧写的《荒谬拉美史》。这位作者最早学的是经济学，后来成了兽医学博士，两个学位都是在比奥比奥省的洛斯安赫莱斯大学得的。那是本有五百页的大厚书，里面还配有大量作者本人画的插图，那本书讲述了无数奇闻轶事，其中一半都不是在拉丁美洲发生的。”

“这作者的名字我听着有点耳熟。”

“我得告诉您，瓦乔费欧是一个富有的大庄园主家族的继承人之一，可是后来没能继承家族财产，最后在南部一家妓院里发生的斗殴中被人打死了。”

“啊，到处都是暴力，还有大男子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总是一碰跟性有关的事物就招致厄运呢？”

“您错了。瓦乔费欧去那里只是为了获得一条信息。他的联络人没有现身，这个可怜人又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和皮条客聊天，还喝了点美味的酸葡萄酒。他只是运气不好。”

“好吧。那么那个负责人肯定是瓦乔费欧的朋友喽。”

“不，是崇拜者。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负责人看作瓦乔费欧作品的深入研究者。他认为《荒谬拉美史》中的东拉西扯和审慎思索实际上恰恰是全书的关键所在。不过咱们还是让瓦乔费欧博士安息吧。因为您之后肯定会发现那本书里到处都是关键信息。我给您讲这些是因为故去作者的灵魂就隐藏在那本书中，书里还隐藏着其他许多在研究院里游荡的鬼魂。要注意，那是研究院里唯一一本非专业研究用书。它甚至算得上是研究院的守护神之一。就这样吧。马铃薯研究院就是这么回事。那里就是鲍里斯上学的地方。”

“我要再来杯伏特加。”

“顺便帮我捎一杯龙舌兰酒吧，或者其他酒也行。”

“没问题。您现在看上去更开心了。”

《爱神与死神》的作者名叫何塞·阿尔科。当晚我们就交上了朋友。讲堂里的小伙子们邀请我去喝咖啡，何塞·阿尔科也一起来了。我坐在其中一位诗人的车里，而他则骑着一辆黑色的本田摩托跟在后面——有时会和我们并排，也有时会超过我们。这让我有些吃惊，在那个时期，摩托车在诗歌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但却没有几个诗人会真的去骑摩托，更不用说在真实的街道上飞驰了，而且从我坐的车子望出去，他的驾驶技术可谓炉火纯青。他不是那种面无表情的骑手，而是不停地挥舞手臂和我们打招呼，还叫来叫去的，他似乎不仅能看清夜色中的风景，我发誓，他肯定还能看到墨西哥城老城区里游荡的鬼魂，他们有的躲在树后，有的飘在破败的小径上，若隐若现。晚些时候，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他和我还在继续吃吃喝喝，那时他对我说其实他的摩托已经坏了，而这却让他打心眼儿里高兴，因为他真正喜欢的是步行。在我们离开酒吧前我什么都没问他。那辆摩托确实已经发动不起来了，于是我们决定把它留在看着最顺眼的一栋房子旁边。实际上，是他给我指了几栋房屋，问我是否喜欢其中某栋的外表，那些房子并非他随机挑选的，他乞求我说实话，不要随便选。我选了第四栋。特蕾莎就住在那里，他笑着说道。那条街道，何塞·阿尔科，摩托车，我本人，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奇怪的整体，我们的影子，黑得过分，长长地延伸到了一棵叶子几乎都已掉光的老栎树下，时不时会从远处传来几句歌声。我高兴地嘟囔道：特蕾莎是谁？

“一个朋友。”

“咱们去找她，告诉她咱们把车子留在这里了。”

“不，”何塞·阿尔科说道，“她明天睡醒后自然就会发现的。”

“那就给她打个电话。”

“不要，太晚了，咱们走吧。”

很容易就能明白他恋爱了，那辆被留在屋前的摩托就像是某种献祭。我什么也没说，我们继续慢慢走着。我选择了他在这个街区认识的唯一一个人所住的房屋，这让我感到异常满足。我们所在的科约阿坎区和我住的阁楼之间隔着无数街区，所以我们有大把可以用来攀谈的时间。何塞·阿尔科其实并不是个很健谈的人，或者说他算是半个健谈的人，他总是含糊糊地嘟囔些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会假设你完全理解他在说些什么，他不擅长解释，就好像绝望和幸福是一回事，是同一个领域的东西，而他的语言学校和他的祖国也是同理。就这样，通过那次漫步以及之后的几次漫步，我逐渐拼凑出了他的生活样貌。我俩同龄，都是二十一岁。他学的是社会学和语言文学，但哪个都没学完。他是因病退学的，但是这方面他不愿多谈。他住了四个月的院。一天早上，一个医生对他说他本应在十五天前就死掉的。何塞·阿尔科对我说他当时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又用右手打了医生一拳，那是他第一次打人。回到学校后，他的同学们已经上大二了，他们对他说了些让他很失望的话，他们以为这段时间他都在山里，成了穷人组织的游击队中的一员。他忍耐了两天，后来就再没回到系里去了。那段时期他是和母亲及弟弟古斯塔维托一起生活的，古斯塔维托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大男孩，他们住在卫星城中的一所别墅里。关于他的母亲我得晚些时候再说。关于古斯塔维托我能说的也不多，我认为他想学法律，也可能已经当了律师，尽管何塞曾不止一次试图说服他，让他相信自己是重量级拳击界的希望，是要为“拇指”拉莫斯[1]复仇的人，墨西哥，尤其是卫星城，都希望他能战胜——而且是出其不意地战胜——特比托黑市和本多西托区的那些家伙。他的弟弟只是和善地笑着，始终保持着只有超过九十公斤的成年人才有的耐心，任他去说。我觉得何塞·阿尔科要比表面看上去更爱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从未出现在他的讲述中。）后来他又在哲学系注册了，然后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他和许多人一样喜欢去电影俱乐部和为那时的英雄人物们举办的派对。他在一

家出版社找了份排版校对员的工作，再就不去上课了。这次，大学和他算是彻底缘尽了。他十九岁或者差不多二十岁时就离开了母亲的住处，混迹在墨西哥城了，他整天盘算着要干些非同寻常的事情，细致地幻想着一个个场景，可是很快就感到虚脱难过了，只得猛地把摩托车停在随便什么地方，还得握紧把手，这样才不至于摔落下来。认识他以后，我见识到了圣胡安-德莱特兰站附近的流氓聚集点，加里波第广场附近的居民区，我们在那里赊账售卖带瓜达卢佩圣母像的小灯，还见识了佩拉维略区的地下住房，罗梅罗卢比奥站附近的那些满是灰尘的房屋，秘密大道上的地下摄影作坊，特佩雅山后方的客栈，我们是在太阳升起并照亮墨西哥城一侧后，骑摩托出发前往的，喜悦又疯狂，在那些为我们上玉米肉汤的女士的眼里，我们肯定也显得喜悦又疯狂。他就像是青蛙国王，而我是老鼠大使，我们的友谊和生意一直顺风顺水。我们也和扬一起在我们的阁楼里待过许多个夜晚，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就和扬成了好朋友。有时他来得很晚，大概凌晨三四点才来，用一声极长的尖叫吓醒我们，那叫声就像狼一样，扬会立刻从他的床垫上跳起来，从窗户探出身子，说道：是何塞·阿尔科。还有些时候，他到来时我们都还醒着，在读书或是写东西，他会带一瓶龙舌兰酒和三块火腿玉米饼上来，还会带来几张波萨达^[2]和雷梅迪奥斯·瓦罗^[3]的画作卡片，因为扬喜欢收藏那些东西，当然有时也会带来诗集和小杂志，还会给我们讲关于云朵的事情，说云之眼只盯向墨西哥城。你别吓我，我说道。扬笑了，他很喜欢何塞·阿尔科的到访。他就那么往地上一躺，问我最近在给“洋娃娃”写什么文章，然后再跟扬聊聊科幻的事情。食品纸包着的玉米饼很大，里面什么都有：豆子、番茄、生菜、酱、牛油果、辣椒和两片甜火腿。那一小瓶龙舌兰酒很快就喝完了，饼倒还没吃完，我们习惯再喝点茶来收尾，再把收音机打开，音量调小，我们互相读诗，扬读的是达尼埃尔·比加^[4]和马克·绍洛坚科^[5]被翻译过来的句子，何塞·阿尔科会在多年之后认识他们本人，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六点半或七点的时候他会告别离开，他一阶一阶地走下楼梯，骑上本田摩托，消失在起义者大道上。我俩则躺回到各自的床垫上，开始睡觉，有时我会梦到何塞·阿尔科骑着摩托在一条结冰的道路上打滑，他压根儿就不去看遍布在道路上的冰柱，可是却冻得直打哆嗦，直到突然之间，在同样惨白寒冷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道深红色的闪电，房屋和道路分裂开来，一阵泥飓风卷过，我的朋友就无影无踪了。通常来说，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头会非常疼。

[1] 曼努埃尔·拉莫斯（Manuel Ramos, 1942—1999），墨西哥著名拳击手。

[2] 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José Guadalupe Posada, 1852—1913），墨西哥版画家、雕刻家。他的作品因讽刺性和社会参与性影响了众多拉美艺术家。

[3] 雷梅迪奥斯·瓦罗（Remedios Varo, 1908—1963），出生于西班牙的墨西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4] 达尼埃尔·比加（Daniel Biga, 1940— ），法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作家。

[5] 马克·绍洛坚科（Marc Cholodenko, 1950— ），法国诗人、小说家、编剧。

“昨天我梦到了特娅·冯·哈堡……我是被吓醒的……不过后来我想会梦到她是因为不久前刚读过一本小说……那本小说并不奇怪，但是我感觉作者似乎隐藏了些什么……做过那个梦后我终于明白了……”

“哪本小说？”

“吉恩·沃尔夫^[1]的《影子》。”

“……”

“我给你讲讲？”

“好啊，等我准备早餐的时候。”

“刚才你睡觉时我喝了杯茶。”

“我头疼。你还想再喝杯茶吗？”

“想。”

“你讲吧，虽然我背对着你，但是我正在听呢。”

“故事讲的是一艘航行了很久的宇宙飞船想要找到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最后找到了一个，但是已经航行了太久，人们苦恼的事情都变了，所有人的年纪都变大了，不过你得清楚，在旅途开始时大家都还很年轻……他们的信仰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教会、秘密社团、巫师俱乐部……飞船也进入了耗损严重的阶段，有的电脑已经不运转了，有的灯也已经坏了，但是没人愿意费心维修它们，还有损坏的寝舱……后来，在找到新星球后，任务结束了，他们本应带着那个消息回地球，但却没人愿意回去了……旅途将会蚕食掉他们剩下的生命，而且哪怕回去了，他们将要面对的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因为地球上已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了，你懂的，他们几乎是以光速前进的……那时的地球只会是个人口过剩、饥饿问题严重的星球……甚至有人认为地球上可能已经没有生命存在了……主人公乔安也是这么想的……乔安是个很保守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热爱那艘飞船的人……身高中规中矩……身高是和身份等级有密切联系的，例如飞船的女舰长个子就很高，而那些没有官阶的机组成员就长得很矮……乔安是个上校，他一辈子也没交太多朋友，只想着完成任务，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也是个很严谨的人，甚至有些无聊……直到他们来到那颗陌生的星球……那时乔安发现他的影子变得更深了……像外太空一样深邃的黑色……你能想象得出，那不像是他的影子，更像是隐蔽起来的另一个人，只是在模仿他影子的动作……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从那颗星球？从外太空？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不过这也并没有多么重要……后来就能看到，影子的能力很强，但却和乔安一样保守……与此同时，教会在筹划发起暴动……有一群人试图说服乔安加入他们，他们对他说是被选定的人之一，还说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在那颗星球上创造些新的东西出来……有的人看起来很疯狂，另一些人看起来很危险……乔安什么也没答应……于是影子把他传送到了那颗星球上……那里有无垠的丛林、无垠的荒漠、无垠的沙滩……乔安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像个提洛尔人，在植物间行走……他感觉到影子在推他的右脚，于是迈开右脚，然后是左脚，轻轻地，等待着……绝对的黑暗……但是影子在引导着他，就好像他还是个孩子……他回来后，起义爆发了……绝对的混乱……乔安十分谨慎，脱掉了制服……突然他遇见了赫尔姆斯，女舰长的心头好，也是起义军的领袖之一，赫尔姆斯想杀掉他，但是影子冲了上去，把赫尔姆斯闷死了……乔安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迈开大步走向桥梁，女舰长和其他官员都在那里，他们从电脑屏幕上看到赫尔姆斯和其他叛乱者架了尊激光炮……乔安说服他们相信他们已经输了，当务之急是逃到那颗星球上去……但是他自己却在最后时刻留了下来……他回到舰桥里，切断了电脑上显示的虚假画面，向叛军发去最后通牒……放下武器的人会被宽

怨，如若不然就会被处死……乔安很懂得制造幻想、操纵人心的那套把戏……而且他还有警察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他们都是在冬眠状态下进行此次航行的——他知道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了……在通牒的最后他表示自己已经是新任舰长了……然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航线，放弃了那颗星球……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梦到了特娅·冯·哈堡，于是我意识到那艘飞船是属于纳粹千年帝国的……所有船员都是德国人……全都对熵着迷……许多事情很奇怪，很不寻常……有一个女孩，就是和乔安睡觉次数最多的那个，在毒品的刺激下回忆起了一些让她痛苦的往事，她哭着说自己叫若安……那个女孩真正的名字叫格丽特，所以乔安觉得可能她妈妈在她小时候叫她若安……都是些不再时髦的很有年代感的名字了……心理学家也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

“可能那个女孩想说她也叫乔安。”

“可能吧。事实上乔安是个操蛋的机会主义者。”

“他为什么不留在那颗星球上呢？”

“我不知道。远离那颗星球，却又不是为了返回地球，这看上去就像是选择了死亡，不是吗？也可能影子说服了他，让他觉得不应该殖民那颗星球。不管怎么说，女舰长和其他一群人还是留在那里了。你看，你应该读读那本小说，写得很好……我现在觉得纳粹万字符是来自梦境，跟吉恩·沃尔夫没什么关系……可是谁知道呢……”

“所以你梦到了特娅·冯·哈堡……”

“对，她是个金发女孩。”

“可是你曾经见过她的照片吗？”

“没有。”

“你怎么知道你梦里的女孩就是特娅·冯·哈堡呢？”

“我不知道，我猜的。就像是玛琳·黛德丽^[2]演唱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你明白吗？让人感觉很奇怪，毛骨悚然，但是又十分亲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总之就是十分亲切。”

“也就是说纳粹控制了地球，然后派出宇宙飞船去寻找新的星球。”

“对。特娅·冯·哈堡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他们遇到了影子。那不是一篇德国故事吗？”

“是影子的故事，或是丢失影子的故事？好吧，我也搞不清楚。”

“所有这些都是特娅·冯·哈堡告诉你的？”

“乔安认为有生物居住的星球，或者说适宜生物居住的星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很特殊的存在……他还曾提到古德里安^[3]的坦克大军横扫了莫斯科……”

[1] 吉恩·沃尔夫（Gene Wolfe，1931—2019），美国科幻及奇幻文学作家。

[2]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歌手。其冷艳的气质深受希特勒的喜爱。1936年，戈培尔曾力邀她回国，希望她成为纳粹德国艺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但遭到拒绝。

[3] 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1888—1954），“二战”时期的著名德军将领。在他的推动下，德国建立起一支极具作战效率的装甲部队，于“二战”初期以闪电战的新方式屡屡击败敌军。

“鲍里斯·勒热纳？”

“是的。那个声音打断了早餐，它就像是久候终至的炸弹一样，尽管迟早会来，但它引起惊讶和恐惧的能力却丝毫没有减弱。负责人吓了一跳，脸色苍白，茶杯掉到了地上。然后他试图起身，可是他坐的小凳子却绊住了他的脚。他被绊倒在地，眼神中充满渴望，他爬到正静静转动的磁带旁边。等待。他咬了咬嘴唇，确认刚才传来的声音并非幻觉。最后，像是对他的坚持的褒奖，尽管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什么褒奖，他又听到了扩音器中传来的声音，那个遥远的声音在不断重复一个名字，他立刻接通了机器。骑兵中尉鲍里斯·勒热纳。然后他听到一阵笑声。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在研究院的三楼扩散开来，传到二楼，又传到一楼，最后消失在院子里，在那里，有个小女孩正悄悄移动。她叫卡门，大概七岁左右。她的胳膊下夹着几根从研究院废物堆里‘偷来’的管子。她最开始是想逃跑的，但是那阵声音稳住了她，她想跑，可又不敢动……”

“这就完了？”

“您还期望有什么？”

“那个声音就只说了‘我是鲍里斯·勒热纳中尉’？”

“骑兵中尉。”

“就这？”

“还有一阵笑声。是一个小伙子的爽朗笑声，但是带着股讽刺劲儿。请允许我笑一会儿，他说道，现在好了，我是骑兵中尉鲍里斯·勒热纳，课程将在几分钟后开始，这对我而言还是件新鲜事，要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什么错误，还请见谅，制服很漂亮，这我同意，可是外面太冷了，课程现在开始，我的军团驻扎在一片土豆田旁边。”

“那来自阴间的声音肯定把负责人吓了一跳。”

“也不一定。”

“那个女孩还待在院子里吗？”

“小姑娘压抑不住好奇心，把门推开一条缝，偷窥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了，一楼没有人，所以她没太费劲就爬上了楼梯。”

“与此同时，鲍里斯·勒热纳正凝视着一片土豆田。”

“或说马铃薯田，都是一回事。勒热纳凝视马铃薯田的时候，负责人忙着变换接头、开启录音机、在小本子上做记录、调试音量等。都是些徒劳无用的工作，只能证明这位老负责人心中的恐惧，因为就像中尉说的那样，课程已经开始了。另一边，那个女孩已经上到三楼，她从楼梯的一处孔洞中惊讶地窥视着那些场景。天空开始风云变幻，不久之后呈现出一片灰白相间的景象，还夹杂着许多不规则的几何图案。不过在穿越马铃薯田之前，抬头观察天空并陷入沉思的人就只有那位骑兵中尉。小女孩完全被那些从未见过的机器吸引了。负责人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连接点。勒热纳深吸一口气，然后迈开他穿着军靴的双脚踏上了黑色的土地，走向支在马铃薯田另一侧的帐篷。军营里一片混乱。路过医务点的时候他看到了最先死掉的几个人，于是他不再吹口哨了。一个班长给他指了指长官们的帐篷。朝那些帐篷走去的时候，他留意到军人们正在整理营地。他们的动作十分缓慢，所以很难判断是在安营扎寨还是准备拔营撤退。终于见到长官们之后，勒热纳询问自己该做些什么。您是什么人？将军声若洪钟。小女孩在楼梯上猛地缩起身子。负责人咽了口唾沫。勒热纳回答道：我是鲍里斯·勒热纳中尉，是从土豆田的另一侧来的，我的将军，我刚刚才到。来得很是时候，将军说了一句，然后立刻忘掉了他。谈话很快就变成了没人能

懂的叫喊。勒热纳记住了荣誉、祖国、羞耻、伟大、秩序等词，然后才离开帐篷。小女孩笑了。负责人晃了晃脑袋，好像是在说，这很合理，我都懂了。随着时间流逝，军营里逐渐升起一股挫败和恐惧的情绪。勒热纳又穿过了马铃薯田，继续等待。天黑前，军营里响起一阵让人紧张的嗡嗡声。和勒热纳在一起的几个士兵喊道：我们现在掉进一个大口袋里了，德国人会狠狠地搞我们的。勒热纳笑了，说道：好吧，咱们的课程开始得迟了，但现在就开始。太好了，太好了，好呀啊呀啊呀，负责人喊道。小女孩后退了几步，因为她突然发现天已经黑了。一小时后炮火声就响了起来。”

那个时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说出好几个原因来）墨西哥城会出现那样多的文学讲堂，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何塞·阿尔科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可能是开国元勋们从另一个世界指引人们搞出来的现象，或者是教育部门的某个办公室出于攀比心搞出来的，又或者是其他事物肉眼可见的表征，又或者是飓风发出的信号，我的这位朋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不管怎么说，数字是不会撒谎的：根据《我的优雅花园》杂志——年老的诗人、政治家、米却肯人乌瓦尔多·桑切斯是它的主编、出版人和主要读者——的统计，只算墨西哥城，当年出版的各色诗歌杂志就达到了惊人的125种之多，这个纪录在当时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诗歌杂志数量自那时起开始直线下降，但很快又上升了，从去年的32种直接升到了今年的661种，这种增殖状况，堂乌瓦尔多补充道，还远未结束，只是在当前的月份……到年底时，诗歌杂志的种数将达到惊人的1000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90%都会消失，或者改换名字，又或者改变选题方向。这怎么可能呢？堂乌瓦尔多自问道，在这样一个文盲率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的城市里，诗歌杂志的数量怎么可能不断上升呢？同时，根据《民生文化周报》的统计，文学讲堂的数量去年是54，而今年已经超过了2000。当然了，这些数字从未出现在发行量大的报纸上。事实上，《民生文化周报》（就像刊物名字指出的那样，这是份每周印刷一次的单页小报，只有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工作的人才会看，还随刊分发三升牛奶）对墨西哥城中文学讲堂数量的统计数字是让人生疑的。我和何塞·阿尔科试图一起查清此事，或者说，他想查清此事，而我则陪他一起查，我坐在他那辆本田摩托车不牢靠的后座上，顺道熟悉这座城市。《我的优雅花园》的那位诗人主编住在米斯科克区列奥纳多·达·芬奇街上的一处房屋里。他很开心地接待了我们，他问我对刚刚在我的祖国发生的操蛋事情有些什么看法，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永远都不能信任那些军人，再然后他送给了我们零散的几期《我的优雅花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份杂志已经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共出了十八期，编辑得有好有坏，但是没有任何一期超过十五页，从那些杂志的内容看，堂乌瓦尔多可能已经跟墨西哥的所有作家都吵过架了）。就在他要到厨房寻一瓶杜松子酒和家庭装可口可乐的时候，他大吼一声，要我们把准备好的诗歌交给他。何塞·阿尔科微微一笑，掏出一首写好的诗，放到了桌子上。您的呢？堂乌瓦尔多说道。我回头给您寄一首。我撒了谎。（离开他家后，我责备了我的朋友，说他不挑地方随便发表自己的诗作。）第三杯酒下肚后，我们问他661种杂志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非常希望，何塞·阿尔科说道，您能把所有那些杂志的名字和杂志社地址告诉我们。堂乌瓦尔多眯着眼睛盯着他。天黑了，屋里没开灯。这个问题冒犯到我了，年轻人，那位老人说道，显而易见，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至少他们对那个名字已经听着耳熟了。他们听着耳熟？我嘟囔道。那些新杂志的主编们，让那些杂志流通起来的负责人们，他们肯定一听到我的杂志的名字就觉得耳熟，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是具有先锋性的，当然了，由于您刚刚才来到这个国家，您不知道这些也情有可原。伙计，当然了，这一点非常清楚，何塞·阿尔科说道，但是您在文章里突出强调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很难想象，所有那些新杂志的编辑们都熟悉《我的优雅花园》，您不这么认为吗？堂乌瓦尔多缓缓点了点头，然后打开书桌上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份绿页杂志，薄薄一本，上面印刷的文字给人一种要跳出纸面的感觉。年轻人，您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他紧接着向我们解释说，他在今年收到了180份诗歌杂志，其中25份是去年就有的，那155份新刊中就包括我们此时手上拿着的这本，而他就是从这本杂志中获知其他480种杂志存在的消息的，再加上《我的优雅花园》，一共661种。我相信这份杂志提供的信息，因为我很熟悉卡瓦哈尔博士。卡瓦哈尔博士？就是这份杂志的主编，小伙子们。我们手上的这份杂志叫《墨西哥及其文学》，只有五页。封面和内页一样都是绿色的，封面上用大大的印刷体写着杂志的名字（是用奥利韦蒂·莱泰拉25型打字机打的，扬后来为我们确认了这一信息），就在靠上的中间位置，而且还画了两条线来进行强调。再往下一点的括号里，这次

只画了一条着重线，写着：墨西哥城诗歌手册。再往下，这次没有着重线了，写着主编的名字：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我们抬起头来，发现堂乌瓦尔多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街道上的灯光从房间唯一的一扇窗户照射进来，照到他的脸上，他就像是石雕的魔鬼。博士是诗人吗？何塞·阿尔科第一次把犹豫的情绪表现了出来，迅速弥漫的黑暗几乎吞没了他的声音。《我的优雅花园》的主编大笑一声：还从来都没人敢把卡瓦哈尔博士称作诗人呢，婊子养的，倒是有人这么称呼过他，此外还有废物、上帝的羔羊、叛徒隐士，尽管他的阅读量比咱们三个人加起来还大，小伙子们。我不无警觉地发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乌瓦尔多·桑切斯越来越像狼外婆了，与之对应，我们则理应化身成两个小红帽。我翻过一页，内页有一些精简的介绍性文字，紧接着就是诗歌杂志的名字和杂志社地址了，尽管只有个别刊物信息齐全。封底上写着“待注册”三个字，没什么意义。我突然想到也感觉到这本小杂志在灼烧我的手指肚。能开下灯吗，老师？何塞·阿尔科的声音最后又响了起来。堂乌瓦尔多似乎有些烦躁。他说了些我听不明白的话，然后慢慢站了起来。灯光尽管微弱，可已经足够我们看清这个房间了，遍地都是散落的纸张和书本，它们似乎正在交战。我发现在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一尊印第安战士半身像，墙上贴着黑白或彩色的杂志图片，它们正尝试与墙纸和平共处。您方便告诉我们卡瓦哈尔博士的住址吗？老人点了点头。好的，何塞·阿尔科说道，我希望我们可以带走这本杂志。如您所愿，堂乌瓦尔多答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看到堂乌瓦尔多的写字桌上放着张皱皱巴巴的老照片：一群骑马的军人，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望着照相机镜头，远处停着两辆1920年代款的福特汽车，它们在尘土中若隐若现，就好像只是两个幻影。

他给我们打开门时，雨已经开始下了。小伙子们，这座狗屎一样的城市最近可以说是异常活跃啊，我想您二位肯定也注意到这点了。没错，何塞·阿尔科答道，我们注意到了。这是为什么呢？老人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没能继续跟随何塞·阿尔科踏上旅程，因此当他再次在我们的阁楼出现时，无论是扬还是我本人都乞求他给我们讲讲他的调查进展。我们朋友讲述的故事有些让人失望，也有些扑朔迷离，姑且待我复述出来：有一位诗人，他是《飞翔的北方》杂志的赞助人，也在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的那份报告中榜上有名，同时还是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工作的公务员，具体职务不太清楚——我不记得是看门人、坐办公室的还是打字员了——他是何塞·阿尔科到那时为止唯一找到的信息源。他通过此人得知

《民生文化周报》很少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的管理人员中间发放，相反你可以在由该组织管辖的遍布墨西哥城各个区域的廉价超市的售货柜上找到它。说在每家廉价超市的售货柜上都能找到它有些夸大，因为我的朋友很快就弄明白了：有的超市从来就没进过那份周报，而在其他一些超市，负责人可能会在杂乱的纸堆中翻找出五六个月前的周报。何塞·阿尔科总共搞到了四份《民生文化周报》，包括之前就有的那份在内。《飞翔的北方》的那位诗人相信编辑和出版《民生文化周报》的肯定是文化部的某个人，不过遗憾的是，他在文化部一个人也不认识。根据印刷和纸张的质量来看，很明显《民生文化周报》肯定获得了资金支持。至于它为何是在超市里流通则无关紧要，那个假想中的文化部办公室的工作方式肯定也跟其他那些办公室的工作方式一样。不过何塞·阿尔科的那位朋友也强调说，可能那个办公室压根儿就不存在。因此，想找到解释的尝试只会是徒劳，倒不如归因于偶然。那场对话结束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们把未发表的作品投稿给《飞翔的北方》。后来何塞·阿尔科骑着他的本田摩托车逛了十家或十五家廉价超市，最后才收集了四份《民生文化周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把已经读过的那份放在一旁，剩下三份的主题分别是：（1）城市之旅；（2）墨西哥城中的墨西哥女诗人与外国女诗人（这期的内容简直不可思议，姑且不提那些女诗人的作品，就连她们的名字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3）墨西哥城中的涂鸦——隐形的艺术还是没落的艺术？这就是到目

前为止找到的所有线索了。何塞·阿尔科认为，不管怎么说——就他此时的想法来看——应当去结识一下给这份杂志写文章的人或人们，尽管他们从来都不在文章上署名。那都会是些什么人呢？也许是真正的先锋诗人，又也许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国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社里可是发生过更奇怪的事呢。当然了，我们还应该去跟卡瓦哈尔博士聊聊。

“也许他就是写稿子的人。”我推测道。

“有这个可能，但我看应该不是。”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到第一份《民生文化周报》的，就是讲诗歌讲堂的那份，尽管……你看，比较来看的话，讲女诗人和涂鸦的那两份要更好一些。”扬说道。

“这中间的来龙去脉可有趣极了，”何塞·阿尔科说道，“是埃斯特蕾伊塔给我的，回头看看怎么让你们认识一下她。”

“埃斯特蕾伊塔？”

“哈瓦那之魂。”何塞·阿尔科说道。

亲爱的罗伯特·西尔弗伯格^[1]：

您是美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科幻作家协会的成员吗？如果您不是的话，我给您个建议：加入进去，成为会员，与他们合作，把分会设在圣迭戈、洛杉矶、西雅图和奥克兰，设在你去做讲座的大学里，设在三星级酒店的吧台。如果您在进行创作之余还有精力的话，我建议您进入协会管理层，加速推动协会建设。您可以把我当作您那位瞎了眼的双胞胎妹妹，所以尽可以相信我。我认为您绝对有能力为那家协会注入活力，推动那些最不可思议的项目开展下去。我看只有你和其他很少的几个人有能力凝视协会精神体那如水的双眸，而不会像疯子一样号叫着跑开。除此之外，您那位瞎了眼的妹妹还想对您说：冲吧，罗伯特，去展示自己，让人看看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旅途后，你不仅学会了写作，也能参与到美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科幻作家协会的工作中去。唐纳德·沃尔海姆^[2]肯定也想入伙。我想也许萨根教授^[3]在某场噩梦中也想过要加入进来。（再仔细想想，唐纳德·沃尔海姆还是算了吧。）但是您现在就可以去做，把您爱写作的那些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都拉进去，让独自待在旧金山办公室里百无聊赖的秘书长开开心心吧。先给他打个电话，那部黑色电话机会响起来，他会用颤抖的手接起电话。哈兰·埃里森^[4]入伙了吗？菲利普·何塞·法默^[5]呢？他是参与进来了，还是正在某个屋顶平台上手淫？在那些通往最好的屋顶平台的螺旋形楼梯消失前——先变成幻梦，然后即是空无——赶紧支持一下协会吧。空荡的房间，肮脏的窗户，破旧的地毯，威士忌酒杯倒在桌上，钟表，起皱的枕头，所有这些都毫无用处。亲爱的罗伯特，情境是这样的：一个土狗色的清晨，飞船出现在群山的轮廓之上，智利开始随着整个拉丁美洲一起沉没下去，我们变成了逃亡者，而你们则是追杀者。画面并非静止不动，不是什么“永恒”，也不是什么无畏的英雄梦，画面是动态的，而且向着多个方向移动！明天以逃亡者和追杀者的身份缠斗的人们，到了后天可能会一起携手迎接虚无，不是吗？我很喜欢读您写的东西……我希望咱们两个都能活下去，而且能够碰面……穿越界限……无拘无束……假装我们全都相信协会的石头眼睛只是小贝贝·法默^[6]的玩笑……太棒了！问候您！

您的朋友，
扬·史瑞拉

^[1]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1935—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

^[2] 唐纳德·沃尔海姆（Donald Wollheim，1914—1990），美国科幻编辑、出版商、作家。

^[3] 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科幻作家，也是享誉全球的科普作家。

^[4] 哈兰·埃里森（Harlan Ellison，1934—2018），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星际迷航》最初的创作者之一。

^[5] 菲利普·何塞·法默（Philip José Farmer，1918—2009），美国著名科幻与奇幻作家。

^[6] 在西班牙语中，贝贝（Pepe）通常是对人名何塞（José）的昵称，这里使用了表示亲近的指小词形式小贝贝（Pepito）。

“在炮火与无序之中，勒热纳设法和一个上校以及一个巴黎新兵逃了出来。您怎么看这一切呢，上校？勒热纳提问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奔跑。上校不想又或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中尉又向来自巴黎的新兵问了同样的问题。一坨狗屎，我们的长官们要为此负全责，我们被出卖了，新兵说道。闭上嘴，赶紧跑，上校下了命令。最后，三人在一座小山丘上停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到坦克军和在德军后方开始形成的囚犯队伍的行进路线。上校有些筋疲力尽了，他掏出根烟，点着了，吞吐了两次烟雾，最后用燃着的烟头指着新兵说道：你应该为刚才的话感到羞愧，我保证会让你因违抗命令和缺乏尊重的罪名接受审判。新兵耸了耸肩。我保证，上校说道，会让我们的人或德国人把你枪毙的，谁来行刑都无所谓了。您怎么看这一切呢，您要如何应对呢？勒热纳问新兵道。新兵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掏出枪指向上校的胸口，开枪。勒热纳又把第一个问题重复了一遍。新兵说他也毫无头绪，这种局面不会迅速结束。上校的身体在阴暗的草丛上抽动着。勒热纳弯下腰，问上校如何才能最好地抵御敌人的进攻。秩序，面色苍白的上校回答道。然后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再然后他就死了。囚犯队伍开始移动了。新兵掏空了上校的衣服口袋，拿走了香烟、钱和手表，然后走下小山丘，走进了囚犯的队伍里。勒热纳坐在地上。上校的尸体旁边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莫妮克和微风。圣西尔。’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那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后来他觉得累了，于是就躺了下去，就那样躺着，望着天空中涌动的群星。研究院负责人那时突然想到瓦乔费欧在他的《荒谬拉美史》里写到过类似的场景。”

“那个小女孩呢？”

“那个小女孩已经悄悄沿着楼梯下楼了，她走出那栋建筑，回到家里，还吃掉了桌上留的一盘菜豆，她脱了鞋，和妈妈一起上了床。负责人吃了个煎蛋，喝了杯茶，躺在床垫上，那上面还放着两条羊驼毛毯。鲍里斯·勒热纳中尉望了会儿星星，也睡着了。”

“梦到飓风了吗？”

“可能吧。第二天早上勒热纳做了很多事情：他和甘末林将军^[1]、吉罗将军^[2]、戴高乐将军、魏刚将军^[3]、布朗夏尔将军^[4]以及陆军元帅戈特子爵^[5]合影，欣赏阿拉斯或伊珀尔的风景，在里尔、日韦和色当的街道上，在默兹河的岸边以及敦刻尔克的沙丘上行走。与此相反，负责人还是和平常一样起床，他快速而简单地吃了早餐，然后就开始工作了。小女孩发着烧醒来。她梦到了核爆炸，我认为那是美国军方在洛杉矶装载的两枚中子弹。飓风刮到了比奥比奥河边，核弹爆炸后，飓风也开始发威了，就像电影大片一样，飓风的中心位置有家叫庞贝的工厂，工厂是制造摩托车的。贝纳利摩托。不久之后从工厂里冲出来一辆摩托，然后一辆接着一辆地涌了出来，这是来自智利南部的共青团摩托战队，他们决心消灭美国人，又或者被美国人消灭。而后，负责人开始察觉到课程所需的所有材料都快送到圣塔芭芭拉了，或者至少已经在路上了。小女孩的妈妈用在醋里浸过的土豆片来给她降温。鲍里斯·勒热纳爬上停在阿布维尔市铁路边的法国坦克拍照。”

[1] 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 1872—1958），法国将军，“二战”开始后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英国远征军指挥，是投降政策的拥护者之一，对1940年法国被德军占领负有责任。

[2] 亨利·吉罗（Henri Honoré Girard, 1879—1949），法国陆军上将，“二战”期间主要在法国北方指挥作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逃脱后前往北非，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

[3] 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 1867—1965），法国陆军上将，曾短暂担任维希法国的国防部部长。

[4] 乔治·布朗夏尔（Georges Blanchard, 1877—1954），法国将军，“二战”时任法国第一集团军指挥。

[5] 第六代戈特子爵约翰·维里克（John Vereker, 1886—1946），英国陆军将领，1940年被派往法国执行敦刻尔克撤退行动。

嗯嗯嗯，何塞·阿尔科说道，他的手里拿着根火柴，这就是那头公牛的签名了，就像个带嘴巴的三角形。我又划了一根火柴。这操蛋的灯怎么会坏了呢。两天前就坏了，你瞧，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玩意儿。我靠近了一点，黏黏的地面上升起一股屎尿味。这就是？对，何塞·阿尔科说道。他又划了根火柴。好吧，但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所以说那是个山洞？你再靠近点，我一次划两根火柴，你也划两根，然后再看。在四根火柴的帮助下我看到了线条勾勒出的山洞轮廓，有几根线条很粗，其他的在白色细地砖上几乎看不清楚。事实上，与其说是山洞，不如说那更像是用斧头砍过的甜甜圈。甜甜圈的里面依稀可见两个人的轮廓或阴影，还有只正在拉屎的狗和一团蘑菇云。怎么样，现在看明白没有？我点了点头。很清楚了，是吧？很可怕，我回答道。那只狗有三条尾巴，你看得出来吗？对，当然了，那是因为它正在摇尾巴啊。那两个人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拉着手的，但是现在我又不确定了，而且你再好好看看，我觉得那不是人的身体，更像是两团影子。柏拉图洞穴之影？啊呀，我可没说得那么高深，不过从蘑菇云的大小来判断，那也更像是影子。或者是他们正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看到的则是他们映在洞穴底部的影子。不对，他们是背对我们的，他们是望向洞穴口的，因为在极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团蘑菇云。可能是吧，那么狗呢？为什么宠物会在洞穴里面拉屎呢？嘿嘿，奇怪的细节，不是吗？啊，不对，我认为它是被吓出屎来的，可怜的任丁丁^[1]。害怕的话它就不会摇尾巴了，我小时候养过狗，我很确定狗害怕的时候不会摇尾巴，你知道吗？我从没养过狗，这么说来你应该是认识的人里第一个承认自己养过狗的。快得了吧。嘘嘘嘘，小心点，有人来了。我关上了卫生间的门。过了一会儿就听到门外传来打火机的噼啪响声和液体落入小便池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那人关门走了。火柴在我手指间燃尽了，我这才发现拇指和食指的指肚都被熏黑了。何塞·阿尔科又划了根火柴。这签名真是特别，他冷静地说道，一个带嘴巴的三角形，嘴唇还挺厚——他几乎是半喊叫着说出这句话——肯定是借鉴了滚石乐队的标志，只不过还带着点狂野的立体派风格。好了好了，已经看过了，我说道，咱们走吧。你看仔细没？我不知道，我说道，这地方搞得我想吐。我在想是不是搞这些图案的人把灯弄坏的，何塞·阿尔科说道。从里面出来后，咖啡馆的亮光照得我们有些头晕，我们只好加快了步伐。这情况无可避免，我们避开众多桌子的动作就像是在跳舞，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座位上，大家的拿铁咖啡还摆在桌子上。

何塞·阿尔科把这些走访——意外的相遇和无意义的远足——笼统地称作调查。总的来看，这些行动无非是想查证《民生文化周报》和卡瓦哈尔博士的那份杂志中记录的情况，然后在调查中逐渐发现新的线索。很快，我们走访了各种各样的诗歌讲堂，还搞到了许多杂志，那些杂志每期的发行量大概都不会超过十册。我们还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涂鸦——隐形的艺术还是没落的艺术？——这也是《民生文化周报》提醒我们的。毫无疑问，运气站在了我们这边，很快我们的许多线索就指向了同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哈瓦那咖啡馆，何塞·阿尔科在那里找到了带嘴巴的三角形涂鸦或者说正在笑的三角形涂鸦，在调查开始前的几天里，我的朋友就曾去过那个地方，尽管当时他还不像后来这么有毅力。在哈瓦那咖啡馆，一个普通的午后，在和一群朋友交谈的时候，埃斯特蕾伊塔让他请她喝杯咖啡，然后送了他一期《民生文化周报》。只送给了他，再没送给别人。几天后，他在布卡莱利大道附近四处找她，但是没能找到，不过在咖啡馆卫生间里发现了涂画的洞穴。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我们寻找埃斯特蕾伊塔的同时，哈瓦那咖啡馆也变成了我们的大本营，后来那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在晚上十一点过后的聚集地。我们发现布卡莱利大道，尤其是从哈瓦那咖啡馆往中国钟去的那片街区，不仅有圣殿的特质，这是我们凭直觉感觉到的，而且还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餐饮要求：一名前亚特兰特足球队队员在街角支了个玉米饼摊位；位于另一个街角的哈瓦那咖啡馆则出售这片街区最经济美味的辣汤烩玉米饼；在它们中间还有家特别便宜的比萨店，那里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吃，是和墨西哥姑

娘结婚的美国男人开的，所有人都叫他杰瑞·刘易斯，尽管他长得和那个演员^[2]一点儿也不像；在街道的另一边还有个卖塔可卷饼和辣汤烩玉米饼的摊位，摊主是一对皮肤黝黑的姐妹，她们第一次见我时就说我有金色头发，我对她们说可是我不是金发啊，而她们说怎么不是呢，然后我坚持说我不是金发，我们就这样争执着，一直到何塞·阿尔科来了才解决了争议——你当然长着金发啊；还有个卖煮嫩玉米的人，指不定出现在街道两旁的什么位置，玉米煮得很烂，还配着黄油或蛋黄酱或奶油，再撒上奶酪粉或辣椒粉，摊主是个独眼龙娘娘腔，他一直强调布卡莱利电影院是品尝他的玉米的最佳地点。布卡莱利电影院毫无疑问是这片街区最耀眼的去处，它就像是位仁慈又和善的国王，愿意接纳一切无处安睡者，它是黑暗的迪士尼乐园，有时甚至是唯一庇护我们的教堂。

直到我们遇见埃斯特蕾伊塔。

何塞·阿尔科给我指了指一张桌子。她在那儿，直挺挺地坐着，她旁边还坐着两个姑娘。左边那位就是特蕾莎，我的朋友略带苦涩地说道。另一个呢？啊，那是安赫莉卡·托伦特，咱们到另一边去吧。你在说什么啊？我跳了起来。埃斯特蕾伊塔就在那儿啊，咱们这段时间发疯似的在找她，现在难道要白白放走她？别犯傻了！何塞·阿尔科没有回答。我一边猛烈摇晃他，一边用余光透过玻璃观察那三个女人。埃斯特蕾伊塔已经很老了，她的长脸上满是皱纹。她没脱外套。她正在喝着什么东西，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时不时地交替望向两位同伴。而另外两人则在交谈、大笑，可能是有对比的缘故，她们两人显得格外年轻，还格外有活力，咖啡馆黄色的灯光照在她们身上，像是给她们蒙了层纱，又像是穹顶一样把她们罩了起来。太有活力了，太漂亮了，我想道。

最后，我几乎是拖着何塞·阿尔科走进咖啡馆的。

埃斯特蕾伊塔似乎没发现我们走到了桌边。不过特蕾莎和安赫莉卡·托伦特则不同，她们不得不突然变换话题，这好像让她们有些不快。何塞·阿尔科显然有些拘谨（我这才发现我的这位朋友在他喜欢的姑娘面前是多么羞涩！），但他还是带着打断她们谈话的歉意把我介绍给了她们。大家好，我说道。何塞·阿尔科咳嗽了几声，问了下时间。我忙赶在他跑走前拉了两把椅子过来，硬是拉着他坐了下来。

“这么说你就是特蕾莎啦，”何塞·阿尔科的眼神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绝望，“之前有一天我们把摩托车留在你家门口了，你看到它了吗？”

“看到了。”又一个发现，尽管特蕾莎正处在十九或二十岁青春似火的年纪，却表现得异常冰冷。

安赫莉卡·托伦特看上去更加外向、和善。

“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呀？”她说道。

“我？……从智利……”

两个姑娘都笑了。埃斯特蕾伊塔脸上的笑容也更加明显了。我也笑了。哈哈。对，我是智利人。

安赫莉卡·托伦特十七岁，已经获得过面向年轻诗人评奖的“埃洛伊莎·拉米雷斯奖”了。（埃洛伊莎·拉米雷斯是大约十五年前去世的，当时她马上就要成年了，她在墨西哥城留下了大量文字和一对悲伤的父母，他们遵从她的想法，每年拿出可观的奖金来为最佳诗集颁奖，诗集的作者必须是不满二十或二十一岁或差不多年纪的诗人。）安赫莉卡·托伦特的魅力如电流，如强酸。她说话时的样子就像是立在能俯瞰一切的浪尖之上，而且丝毫不在意之后的疾速与坠落。她确实非常美丽，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美丽了。我不知道她的那种笑容是不是她那个年纪的姑娘特有的，不过总而言之，那是种哪怕她甩了你你也会

永远印刻在记忆中的笑容。那是她的专属签名，她的火漆封缄，她的锋利武器。她笑得开怀，笑得奔放，笑得幸福，听到她的笑声，看到她的表情，任谁都忍不住要做悸动的梦，要变得偏执疯狂，要目无一切地冲向那块红布，哪怕最终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

特蕾莎则不同，不仅看上去更加严肃，而且一直都是那副样子。作为女诗人的特蕾莎也和安赫莉卡不一样，和其他那些我很快将会结识的女诗人也不一样，她是个打字员，与此同时还在上第二学期的医学课。她没和父母住在一起。她已经开始在个别杂志上崭露头角了——个别但不错的杂志——如果要出一本墨西哥年轻诗人诗选的话，肯定要把她的作品收录进去。抛开表面现象来看，她和何塞·阿尔科的关系有些不正常。我永远都不知道，也没去问过，他俩是不是一起睡过觉。可能睡过，也可能没睡过。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大家都知道特蕾莎后来很憎恨何塞·阿尔科，我由此推想，她应该是爱过他。还有个关于她的情况是必须提到的：她从不往外借书，如果你冒失地借给她一本书——这种事何塞·阿尔科至少干过上千次——你就要做好永远都不会再看到它的准备，或者哪怕能看到，也是在她那带纹路的亮木书柜上，那个柜子很漂亮，也很精致。

坐在两位姑娘中间的埃斯特蕾伊塔就像是咖啡碟中的一粒沙子。

“我们一直在找你，埃斯特蕾伊塔。”何塞·阿尔科说道。

埃斯特蕾伊塔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说了句啊。她的目光从我朋友身边穿过，望向更远处，然后又深呼吸了一次，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微笑。

“我们找你是因为你那天给我的那份报纸。”

“啊……”

“你还记得吗？《民生文化周报》，讲诗歌讲堂的那期，埃斯特蕾伊塔……”

“啊，啊……”埃斯特蕾伊塔望向远处的另一个目标，在她的大衣里缩了缩身子。

“你还记得吗？那里面有份诗歌讲堂目录，在墨西哥城里办的诗歌讲堂。”

“你在说什么呢？”安赫莉卡说道。

“一份很奇怪的出版物，也许是一起阴谋。”我说道。

“对，对……”埃斯特蕾伊塔说道，“你喜欢吗？”

“很喜欢。”

“啊，太好了……”

“我想知道你从哪儿搞到它的……谁给你的……”

埃斯特蕾伊塔笑了。她的嘴里连一颗牙都没了。

“啊，那是个奇特又美丽的故事……”

“讲讲吧。”何塞·阿尔科和特蕾莎说道。

可是老妇人面露难色，她那双亮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桌子表面。我们等待着。当时正是休息时间，哈瓦那咖啡馆里十分嘈杂，人声如埃斯特蕾伊塔的大衣般包裹住了我们。很美。安赫莉卡·托伦特是我们当中行动力最强的，她展现了这一特点。

“你还想再来杯拿铁吗？”

“好……”

很少有人知道埃斯特蕾伊塔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总是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独立天使纪念碑^[3]和《自由引导人民》^[4]的破旧复制品。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尽管与此相关的猜想有很多——也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如果有人问她的话，她有时会说她叫卡门，有时又叫阿黛拉，还有时候叫艾薇塔，但她也说过自己叫埃斯特蕾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自杀身亡的西班牙老男人给她起的别名，但据她本人所言是她的真名。哈瓦那咖啡馆里的人都认为她是诗人，尽管就我所知，没人真的读过她写的诗。她说从她发表最后一首十四行诗算来，她已经又在无数条墨河中徜徉过了，甚至称之为墨海也不为过。她有一个儿子。当地的几个对艺术不甚了解的老记者坚称她的儿子曾是个出色的画家。实际上，人们亲眼所见的埃斯特蕾伊塔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一桌接一桌地推销她儿子画作的复制品。有人说吸毒葬送了他的艺术生涯，最让人难过的是他到现在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些画作很迷幻，有些利奥诺拉·卡林顿^[5]的影子，蜘蛛网、多重月亮、长着大胡子的女人、侏儒，总之都是些不好的东西。一共有大约二十幅画，可能更少，复制品倒是有上千份，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埃斯特蕾伊塔一直在卖那些复制品，从来就没断货过。是谁决定印刷这么多复制品的呢？是她儿子本人吗？从纸张的情况来看印刷时间至少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埃斯特蕾伊塔把那些复制品看作一种恩赐，也许确实如此，靠售卖它们，她既养活了自己，又养活了她那年过四十的儿子，他吃母亲藏在宽敞的大衣口袋里的甜面包，而她则喜欢喝拿铁咖啡，大杯的，超大杯的，为了不沾湿手指，她还会使用一根超长的勺子来进行搅拌，咖啡是她的能量之源。

“小心烫嘴。”安赫莉卡说道。

埃斯特蕾伊塔啜了口咖啡，回味了一下，然后往里加了三杯量的糖。

“啊，太好喝了。”她说道。

“你喜欢喝这么甜的咖啡啊？”安赫莉卡说道。

“对……”

“埃斯特蕾伊塔，你会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搞到那份报纸的吧？”

“会的，会的……”

“哪里？”

“一个超市……”

何塞·阿尔科睁大眼睛，笑了。

“当然了，”他说道，“我怎么这么蠢啊。”

“我去买一条公主裙……”

“……”

“还有酸奶……”

“……”

“他们就送给我了，免费……”

“非常感谢，埃斯特蕾伊塔。”我的朋友说道。

“你们还有什么安排吗？”安赫莉卡·托伦特在半小时后说道，那时我们已经做完了那些在她看来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没有。”我说道。

“我家里会办场聚会，你们愿意来吗？”

“十分乐意。”我说道。

[1] 任丁丁（Rin-Tin-Tin），拍摄了二十七部好莱坞电影的明星德牧犬。

[2] 指美国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1926—2017）。

[3] Ángel de la Independencia，墨西哥城的著名地标，1910年为庆祝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而建。整体为圆柱形，碑顶是一座展翅欲飞的镀金胜利女神铜像，她右手托着象征自由和平的橄榄枝桂冠，左手拿着一节锁链，象征殖民统治的枷锁被彻底斩断。

[4] La Libertad guiando al Pueblo，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一幅油画。

[5] 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1917—2011），英国出生的墨西哥裔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亲爱的弗里兹·雷伯^[1]：

我认为您肯定很熟悉这样的故事。就像一见钟情一样，但是得把情去掉，然后就剩下真正的相遇了，身体的所有器官都既接收信息，又发送信息，有机雷达在拉丁美洲某个城市的街道上乱窜，喝上几杯，再坐几次每人一比索的出租车，冲着空无挤眉弄眼。在栏杆的另一侧，类人猿突然发现那个奇怪的生物也同样对画在墙上的那些图形感兴趣。从那一刻开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变得慢了下来。两个生物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相遇了，夹杂着水下特效，种种场景被混到了一起，肮脏的电影院洗手间、1940年被封的小酒馆、摇滚俱乐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的过山车、阴暗冷清的公园。只有一个场景是不断重复的：地球考察队员和外星人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在龙舌兰酒吧的内部花园相遇。从禁止通行的地方走出来时，地球人发现外星人正在一个角落里呕吐。地球人保持冷静，举起相机把那一幕拍了下来。外星人感受到的不是相机发出的咔嚓声，而是某种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追寻它的东西。它转过身，月亮藏到了屋顶后。酒吧女主人说她听到了喊叫声、水溅声、辱骂声和歌声。真是些和善的神使，这是她的原话。那天晚上，在花园坚硬的地面上，她发现了几摊血迹。传说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每年二月中旬，那个天外来客和那位本地居民还是会在天空上打架。我觉得真相是那次他们俩都死了。有哪所美国大学愿意资助某支考察队来揭开这个神话的谜底吗？或者，也许会有某家私人基金会愿意做这事？这事是真的，我担心的是它同时还是个预言。我想你和我都对它感兴趣，等等，等等，因为我们都需要继续存在下去，等等，等等。

谢谢您，向您致敬，

扬·史瑞拉

^[1] 弗里兹·雷伯（Fritz Leiber，1910—1992），美国奇幻、科幻、恐怖故事作家。

“咱们来聊聊您的那部旷世巨著吧，但是要严肃地聊。”

“我的著作，正如您所说，开始于马铃薯研究院或土豆研究院的三楼，这家研究院坐落于古老的圣塔芭芭拉城里，旁边就是安第斯山。它讲的是胡安·贡萨雷斯儿子鲍里斯的故事，他是未知大学的学生助教。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伙子。”

“等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干扰这次访谈。您没留意到有什么奇怪的噪音吗？”

“可能是那些喝醉了的人的喊叫声吧。我从没想过知识分子、声名远播的文化人（愿上帝在他们头上拉屎）竟然也会这么吵闹，甚至连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也在像狗熊一样打呼噜。”

“可他们正在庆祝您的成就，年轻的朋友。”

“您瞧瞧那边那个老头，他正在咬他老婆的屁股呢。”

“那不是他老婆。无所谓了。他一辈子都在找寻完美的词藻和宁静的氛围。与此不同的是，此刻他感受到了恐惧，但同时又很幸福。他之所以感到幸福都是因为您，因为您和您的那些美妙诗句。”

“我感觉在这文学共和国的狂欢日里唯一克制的人就是我自己。亲爱的记者，连您也喝了够多的伏特加了。很明显，我能出现在这里靠的并非是那些‘美妙的’诗句。”

“总之，咱们还是回到您的大作上吧。后来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她还发烧吗？”

“不烧了。现在村子里在举行节日活动，小女孩正头戴花冠在街道上溜达。人们聚集在武器广场上，然后开始沿着村子里的各条街道行进。他们边走边唱。人数不多，我已经对您说过这个村子不大，那首歌也没有歌词，人们只是在啊嗷啊嗷咿呀咿呀地哼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印第安人的那种哭哭啼啼的声音。”

“他们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从土豆研究院门前经过。”

“没错。负责人透过窗户观察着他们。行进队伍一直走到加尔瓦里诺街的尽头才停下来，他们又拐上了瓦尔迪维亚街，然后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街道中央就只剩下那个小女孩了，这次那位负责人终于留意到了她的存在。当然了，天空也突然黑了下来。”

“小女孩会觉得那是女巫住的房子吗？”

“不会。她太小了，还不懂那些。相反，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进了研究院。负责人从窗户上看到小女孩的影子消失在了院子里，然后听到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这位老人放松了下来。啊，他想到，啊，啊，啊。女朋友。未婚妻。那双能够带着爱意望向鲍里斯的眼睛。那个正在爬楼梯的纯洁女孩以为没人看到她。然后，当然了，他又开始摆弄起电线和磁带。还有时间，还不到广播节目的时候。位于加尔瓦里诺街800号的这幢建筑的电费是整个圣塔芭芭拉城里最高的。很可能某一天厄运就会因为这一细节而降临到他的头上。我认为丹·米特廖内^[1]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教会警察如何通过电表数字甄别左翼人士了。所有那些用电过多或过少的房屋，那些用水过多或过少的房屋，里面都有可能藏着左翼人士。另一方面，游行队伍在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广场上，然后逐渐散开。街道再次陷入沉寂。负责人很感激这种沉寂，他可以忍受工作被打断，也可以忍受充满好奇心的小姑娘，却忍受不了欢闹与喧嚣，那会让他想起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悲惨生活，进而忧伤难过。但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这些情况。因为负责人也会喝醉酒，也会跳舞。他的节日是面向未来的。他不明白枯燥乏味是什么感觉。辣土豆饼的食谱就是他的专属财产。这没什么不好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生活，我是指他的生活，年轻的朋友，似乎有点太……可悲了。”

“事实是，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是在脏乱无序的电影院和图书馆里度过的。更糟糕的是，我的女朋友总是会离我而去。”

“现在好了。您拥有了美好的未来。”

“您这么说是因为我得了奖？”

“是因为这个奖所包含的意义。”

“啊，亲爱的或天真的记者。首先，您把这个隐没在不知道是哪片丛林中央的大厅和立于山巅的水晶宫搞混了。其次，您还认为艺术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您没有发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捕鼠夹。真见鬼，您认为我是谁啊？席德·维瑟斯^[2]？”

^[1] 丹·米特廖内（Dan Mitrione, 1920—1970），美国官员，审讯、刑讯逼供专家，后在乌拉圭被图帕马罗运动组织抓捕并处决。

^[2] 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 1957—1979），英国著名朋克摇滚乐队性手枪的贝斯手。

等我去回忆的时候才发现，在安赫莉卡·托伦特家发生的事情都只是一种背景画面，是门铃响起的前奏，有人来了，所有人都挤在罗拉·托伦特的房间里。我去开，来了来了，开门。

不过有的事情我记忆犹新，目光和唱片（我指的是闪光的黑色唱片本身，而非音乐），以及让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比安赫莉卡大两岁的罗拉·托伦特，她的皮肤要比她的妹妹黑得多，骨架也更大，无法用苗条这种词来形容她，她的笑容属于典型的另一种墨西哥，它偶尔在某个黎明显露真身，一半是疯狂的求生欲望，另一半是献祭的石台。我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在一个小时前爱上了安赫莉卡，也可以大方证实那份爱在午夜零点时已经逐渐褪去了，直至在酒精和香烟的作用下烟消云散，别碰马拉美，混蛋，去你妈的。那份伟大的柏拉图式的爱恋之所以会迅速出现然后消亡，很可能与罗拉·托伦特密切相关。我不是说——尽管人们天性喜新厌旧——随着聚会的进行我的爱从那个姑娘身上转移到了她的姐姐那里，而是说，首先（让我们诚实一点吧），安赫莉卡压根儿不接招，其次，由于我是唯一一个不认识所有在场之人的人，所以我做得更多的是观察（尽管，很不幸，我也得开口说话），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发现那两姐妹之间存在着某种镜像结构，那些镜面先把她们的形象扭曲，然后再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来，所以有时候其中一位接收到的形象是安静的、无害的，而另一位接收到的则只是颗躺在床下的小玻璃球，尽管大多数时候那些镜面反射出来的都是杀伤力十足的激光。聚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安赫莉卡，最强大的阴影则是罗拉。这一切，再加上安赫莉卡掌控全局时的那种自信（但尤其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她对我表现出的冷漠态度），把我推到了舞台之外，使我满足于做一个观察者。除此之外，安赫莉卡并不缺乏追求者，不过我得承认罗拉的追求者也不少，尽管她的追求者们（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但却是个不错的小伙）完全不像追求她妹妹的那群人一样擅长甜言蜜语。在熟悉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尼加拉瓜小伙佩佩·科里纳看来，两姐妹最大的差别是安赫莉卡还是处女，而罗拉已经不是了，至少有一百或两百人知道这一情况。我先是狠狠地瞪他，有些事是不应该说出来的，然后我又问他这么私密的事情怎么会有两百人知道。都是靠我这种大嘴巴的宣传，尼加拉瓜人这样答道。虽然这种想法让我有些不适，但我还是推测佩佩·科里纳已经和罗拉·托伦特睡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对儿，我想道，矮个子的保守男，目光短浅，强壮的女性，还很独立。我点了根烟，假装满不在乎。我感觉自己勃起了。于是我钻进洗手间，把烟抽完了。在某个时刻我望向镜中的自己，然后低声笑了起来。从洗手间出去的时候我差点儿和罗拉·托伦特撞个满怀。她有点喝醉了。她的眼睛深邃又明亮。她微笑着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然后她就关上了洗手间的门。我知道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

因为高兴，我几乎是跳着——毫不夸张——回到厅里的。何塞·阿尔科在干什么呢？一群性格内向、长得不好看、舞也跳得烂的人正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当今的秘鲁诗坛、零点团体^[1]、马丁·阿丹^[2]的银刀、奥根托·德阿玛特^[3]，都是些当时墨西哥的年轻诗人一无所知的东西，当然他也讲别的——真真假假，就像人生一样——例如说他骑着本田摩托在墨西哥西部的公路和小径上飞驰，一直骑到雄鹰峰巅，也就是巴尔多梅罗·利略^[4]称为“炙热马铃薯之中心”的地方，然后再以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千米的时速从他口中的那些崎岖山路上疾驰而下。

那天晚上的故事里始终没出现墨西哥城的影子，连跟墨西哥城有关的事物也没出现，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塞·阿尔科讲起他来到了一片冷清的沙滩，在那里遇见了一只小狗。那里没有渔民，没有房屋，什么都没有，那里只停着他的摩托，只有何塞·阿尔科，只有那只小狗。除此以外，剩下的就是天堂了。我的朋友在沙滩上写下“我的妈妈养育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字。他喝了几罐变质的牛奶，还吃了点金枪鱼罐头。小狗一

直陪着他。一天下午突然出现了一条船。何塞·阿尔科把摩托骑上了陡峭的海岸（在他的讲述中，如果你的心灵澄纯的话，你就可以骑着那辆黑色本田摩托去任何地方），当然还带着那条小狗。船上的人看到了他，和他打招呼。何塞·阿尔科也向他们打招呼。我们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船上的人向他喊道。啊，何塞·阿尔科低声说了一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谁？你是怎么把摩托骑上去的？这附近有路吗？船上的人提出的这一堆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应。船长说他马上下船。何塞·阿尔科和船长在沙滩上会面了。在他们握手时那条小狗咬了这个搞生态保护的家伙。快滚，船员全都下船来保护他们的船长，他们先是去踢那条狗，后来连何塞·阿尔科也踢了。五人大战一人一狗。再后来他们又为他治疗，给他和狗上了药，还连声抱歉，他们建议他收养那条受了伤的爱叫的小狗。船员们在天黑前又回到了船上，走了。饱受摧残的何塞·阿尔科倚在棕榈树上目送他们远去，狗趴在他的脚边，摩托离他五步远。船长、男船员们和女船员们在海平面上冲他招手。狗吠了几声，我的朋友也咒骂了几句，但就在那时，就在船即将在他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他跳上了摩托，全速骑到了海岸最高点。狗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他从那里还能望见远去的船只。

特蕾莎：“让我相信这个还不如让我去死。”

安赫莉卡：“你后来又做了什么？”

佩佩·科里纳（点了根大麻烟，然后又把它递给了安赫莉卡）：“兄弟，我唯一知道的搞生态保护的水手就是亚哈船长^[5]，他是个真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家伙。”

雷吉娜·卡斯特罗（三十岁的女诗人，还没有作品出版，负责给她那些年轻的同行提供避孕药，一个平庸却活得很体面的诗人）：“告诉我后来那条小狗怎么样了？”

罗拉：“绿色和平组织是什么玩意儿？”

埃克托·戈麦斯（罗拉·托伦特的追求者之一，二十七岁，哈瓦那咖啡馆的老客，小学教师）：“一个和平运动组织，罗拉……实话告诉你吧，贝贝，我很难相信你给我们讲的这些。”

何塞·阿尔科：“别叫我贝贝。”

特蕾莎（冲着埃克托·戈麦斯微微一笑，因为后者给她递去一杯伏特加）：“这绝对都是编出来的，因为何塞一点儿也不喜欢沙滩，他不可能会在没人的地方连续待三天。”

何塞·阿尔科：“可我确实在那儿。”

两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们相信您，诗人。”

雷吉娜·卡斯特罗：“那条狗呢？你把它收养了吗？”

何塞·阿尔科：“没有，它还在那儿。”

佩佩·科里纳：“或者约拿也可以算一个，如果我们能叫他船员的话。生态保护者，我觉得可以，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能算是生态保护者，但是船员……”

安赫莉卡：“它没跟着你？这太奇怪了。”

安东尼奥·门多萨（无产阶级诗人，二十岁，在政府机构做校对员）：“这是因为何塞家容不下那条狗。”

安赫莉卡（亲密地望着安东尼奥）：“什么？”

安东尼奥·门多萨：“何塞的家里养不了更多的狗了。”

罗拉：“我不知道他家里已经有条狗了。”

安赫莉卡：“谁是狗，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门多萨：“我，我有时当狗。”

何塞·阿尔科：“你在说什么胡话啊？”

安东尼奥·门多萨：“有时他也会当狗。”

佩佩·科里纳：“嗯嗯嗯，他绝对是喝高了。（他笑了。）都是些小孩子。除非你是在开玩笑，伙计，不过这玩笑完全不好笑，还很蠢。”

埃克托·戈麦斯（对着罗拉）：“咱们出去透透气怎么样？”

佩佩·科里纳（在埃克托和罗拉走后）：“咱们所有人都该出去透透气……”

安东尼奥·门多萨（突然放松了下来）：“他们到花园里打炮去了。”

特蕾莎：“你能闭上嘴吗，蠢货？”

安东尼奥·门多萨：“你嫉妒了？”

特蕾莎：“我？你放屁……”

两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们这两瓶酒还没开呢……太棒了，太棒了……”

安赫莉卡：“不许再喝酒了！”

安东尼奥·门多萨（一只手搭在她的腰上）：“喂，安赫莉卡……”

安赫莉卡：“别碰我姐姐！”

安东尼奥·门多萨：“我可从来没有……”

雷吉娜·卡斯特罗（没提高音量，却已威严十足）：“你快闭嘴吧，给我坐下。我本来想给你们念首诗，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特蕾莎：“啊，没事，念吧。”

佩佩·科里纳：“大师，我洗耳恭听。”

两个哲学系的学生（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倒了酒）：“等我们都准备好再开始啊。”

埃斯特蕾伊塔（从厨房门后探出头来）：“啊，诗歌，太棒了……”

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趁着没人注意溜到了阳台。那首诗听上去会长度惊人，因为它讲的是雷吉娜·卡斯特罗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出场的还有她的家人、玩偶、教会学校、课间休息、支持卡兰萨^[6]的外公、摇椅、连衣裙、衣箱、地下室、雷吉娜和她姐姐的嘴唇、鞋跟、洛佩斯·维拉尔^[7]的诗句。与屋内的情况不同，室外的夜色很透亮，其他公寓的灯光暗示着在我们头上十米的地方也有聚会，而在我们脚下五米的房间里则有场平静的交谈，也许在十五米开外，和我们肋骨一样高的地方，一对老夫妇正在听古典音乐。我感到很幸福，我猜当时时间还不是很晚，不过哪怕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只剩下我和我手中的烟留在那神奇的阳台上，那种美的享受和短暂又可怕的平静感也绝不会消散。月亮似乎正骑在现实头顶吱嘎作响。隔着厚重的建筑，我还能听到马路上的车流声从背后传来。有时候，如果我保持安静，连手中的烟也不动一下的话，我还可以听到灯光一闪一闪的噼啪声，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嗡嗡声，其中还夹杂着驶下大学大道的车辆发出的声音。三层楼下就是铺满碎石的院子和花园，它们被几条黑土小路连接起来，周围是高大的树木和花坛。从阳台俯瞰下去，花园就像是一个倒下的大写字母B，就像这样：

B。在它的内部，在其中一个半圆里面，有一处倾斜的小广场，有点像中国人的眼睛，里面放着三条长椅、两架秋千、一个跷跷板，还有一块大大的石头，可能是个雕塑。花园后方有条如蛇般扭曲的黑线，可能是条沟渠，再往后半米是堵墙，把它和另外那个半圆隔开了。就在那里，在那条被灌木和墙壁遮掩起来的沟渠里，有两个人，我从阳台上可以很清楚地望见他们，她就像一直在等待着我出现似的，罗拉·托伦特把埃克托·戈麦斯的那玩意儿含在嘴里，正在帮他口交。

但是，好吧，那不是场普通的口交：圣殿突然被照亮，很快就只能看到罗拉的手了，一只搭在阴茎旁，另一只伸到了埃克托的两腿之间，埃克托的手指埋在她的头发里——她那头美丽、强韧的黑发——罗拉的嘴巴、肩膀、膝盖贴近那片黑色草地，或者说黑土地，再或者说阴影之地，她时不时就会露出那不是微笑的微笑，极尽殷勤。

毫无疑问，那里就是隐秘的巴厘岛剧院。

回到客厅后，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以为是我喝多了，于是我坐了下来，抓起桌子上的一本书。从某个房间传来一些声响，好像有人在争论着什么，然后我听到了笑声，没出什么大事。我闭上了眼睛：亡者之路上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我记起了扬给我讲的鲍里斯的故事。我从未相信过。是真的，扬说道。你会变成疯子的，我说。不，不，不，不。丛林，外面就是丛林，我想道。鲍里斯，多大年纪，差不多十五岁？不，不，不。我站了起来，走向厨房。

我总因冰箱里依然塞满食物而感到惊奇。

我拿了杯牛奶回到厅里，又坐了下来。我慢慢喝着。我现在的样子肯定很蠢，坐在那里，双腿交叉，泪眼婆娑。可这是为什么呢？扬的独白声回荡在巴厘岛剧院内。我已经给你讲了无数遍了，雷莫，可你还是不明白。一盘不可理解的国际象棋棋局中的那些命运攸关的棋子。我只能大概描绘出，我说道，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在房间里跳着舞。你应该感到幸福啊。一个十三岁的年轻人？在他的卧室里跳舞。现在他转过身来了，我能看清他的脸了，鲍里斯的脸？然后房间又一片漆黑了，整个社区都断电了，只能听到他的喘息声，还有他在黑暗中安静跳舞的声音。我把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的那条腿开始抖动，就像是隐身博士正用他的钢锤检查我的应激反应。停下，我说道，安静，咱们走，小任丁，停下，嘿嘿，乖狗狗。

就在那时那著名的门铃声响起了，叮咚，铃铃铃，叮叮叮，我发誓我记不清旋律是怎样的了，咿叽叽，吱嗡嗡，哒哒哒，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因为我猜到或者我感觉到，隆隆咚，这里与绝对的幸福之间，乒乒乓，沙沙沙，只有一百万或两百万或三百万步的距离，从我坐的地方走到门边的那几米路我绝对需要走这么多步，啪啪啪，我把门打开了。门外站着个栗色头发的姑娘。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让人反感的——也非常丑陋的——男人，他头发的颜色和她一样。

[1] 零点团体（Hora Zero），1970年代活跃于秘鲁的前卫诗歌团体。

[2] 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诗人，诗作以哲学反思和隐喻性见长。

[3] 奥根托·德阿玛特（Oquendo de Amat，1905—1936），秘鲁前卫派诗人。

[4] 巴尔多梅罗·利略（Baldomero Lillo，1867—1923），智利自然主义作家。

[5] 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主人公。

[6] 指在1914年至1920年任墨西哥总统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1859—1920）。

[7] 洛佩斯·维拉尔（Ló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诗人，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

亲爱的厄休拉·勒古恩^[1]：

当那个时刻到来，我们这些睽嗤^[2]能做些什么呢？压倒性的人数就是我们的武器吗？把入侵者看作毒蛇就是我们的武器吗？译读亡灵语言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武器吗？为生存而抱有的盲聋哑式的信仰就是我们的武器吗？勇猛无畏就是我们的武器吗？像梦境一般，或像梦境的零散片段一般，我们用手中的弓箭射击直升机，这就是我们的武器吗？残酷无情就是我们的武器吗？喝醉酒、骑着马、不停地向坦克军射击的黄金城神人就是我们的武器吗？几乎要完全被人遗忘的阿古斯丁·拉腊^[3]的旧唱片呢？在安第斯山脉起飞降落的那些飞碟呢？我们的睽嗤身份呢？快速交流的技艺呢？伪装的技巧呢？定期的肛门爆裂呢？纯粹的凶残呢？您会给我们什么建议？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出抵抗、取得胜利呢？永远都别再遥望月亮？一次又一次地学习把古德里安的坦克大军拦在莫斯科外的策略？我们应该亲吻谁来打破魔咒并将之唤醒呢？吻恶女巫还是睡美人呢？吻恶女巫还是睡美人呢？

一千个吻，
扬·史瑞拉

[1] 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1929—2018），美国著名科幻、奇幻、女性主义与儿童文学作家。

[2] 厄休拉·勒古恩的小说《世界的词语是森林》（*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中地球殖民者对殖民星球原住民的蔑称。

[3] 阿古斯丁·拉腊（Agustín Lara，1897—1970），墨西哥作曲家。

“啊，夜晚引人生出梦想，您不这么觉得吗？能有多少年轻人家里有这么大的窗户呢……不用工作、没有任务压在身上的感觉可真是太好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陪您到屋顶平台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不要了，还是继续吧，但要严肃地聊。我这么说是为了您好，为了您未来的创作生涯着想。您说的话可都正在被录音呢。”

“咱们聊到哪儿了？”

“我也忘了。”

“那么，不妨就回到鲍里斯·勒热纳在马铃薯田里监视敌军行动的那个夜晚吧。”

“一个和善又……爱做梦的小伙子。”

“没错，他喜欢自言自语。”

“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我的一位社会纪实版面的女同事随时都在自言自语。我感觉大家都认为她疯了，她很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她整天都在嘀嘀咕咕。有时候她还会流利地背诵那些最有名的时装设计师的名字。可能是背给自己听的，也可能是背给某个别人看不到但可以与她交流的人听的……”

“鲍里斯·勒热纳说，小心，小心……”

“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吗？还是说连他自己也没发觉他的嘴唇正在开合并发出了那些凌乱的声音？”

“反正鲍里斯·勒热纳就是那么说的，小心，小心，R35、H35、H39、FCM36、D2、B1、FT17、S35、AMR、AMC等型号的坦克都失败了。自言自语是我们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内战已经无可避免了，勒热纳说道，只是……就像在背诵一样……如同给失去的朋友们发去的特殊信息，瓦谢与尼赞终于和都德与莫拉斯并驾齐驱了……上帝是不存在的……人类受到了诅咒……操他妈的臭狗屎……诸如此类……在马铃薯田的另一侧，灯光像是从外星球来的生物一样闪烁。”

“我有点冷。这个角落挺冷的。后来呢？”

“后来，简略来看，一切都发生得更加迅速了。小女孩绕着圣塔芭芭拉城郊散步。负责人骑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研究院的设备保持运转，静静地，不分昼夜，连吵闹声和跺脚声都会被录下来。画面开始稳定，而每一个画面都被瓦乔费欧博士在《荒谬拉美史》中用超凡的想象力加实在的腕力记录了下来。第一幕：一个囚犯从巴黎某监狱越狱成功，正试图前往德国集中营。在一个临时车站上，放他上车前，有人按流程询问他的名字。去你妈的吧，那个囚犯这样答道。用的还是西班牙语。什么？德国士兵或法国宪兵说道。鲍里斯·古铁雷斯，囚犯说道。第二幕：一架喷火式战斗机正在南安普顿郊外坠落。基地工作人员从地面观察到了这一过程。为什么不跳伞呢？是谁在驾驶那架飞机？他们试图通过无线电与飞机上的人员取得联系，但是没人应答。机毁人亡似乎不可避免，飞机马上就要坠地了。通讯员还在坚持：跳伞，跳伞，跳伞，机上有人吗？突然，一个异常遥远的声音答道：我是鲍里斯·麦克马努斯，我快不行了……第三幕：一群游击队员正在接近乌日策的地区撤退。新的一天刚刚开始，他们碰到了一名受伤的同伴，此人的双腿间还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小伙子。伤者解释说是这个陌生小伙把他带到那里的。游击队员们观察了尸体，死者胸口和头部多处受伤。不可能是他把你带来的，长官说道，他至少已经死了二十四小时了。我发誓昨晚正是他把我从枪林弹雨中救了下来，还带我来到了这里！我昏厥了好几

次，浑身都疼，我俩还说了话，他还讲故事逗我乐，他对我说他很喜欢马，还说……游击队员们不得不承认靠伤者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到达那个位置的。他们从死者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张纸：鲍里斯·沃伊里诺维奇，机械艺术与航天学院学生，萨拉热窝，未知大学附属学院。”

扬警惕地睁开眼睛，像是在问我发生了什么见鬼的事情。我笑了笑，用尽量平静的语气给他解释说来了几位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说道。与此同时其他朋友们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钻进屋里来了，他已经没有穿衣服或是把散乱在地的纸张、剪报、科幻书籍、地图和词典收起来的时间了，这些东西组成的垃圾箱图书馆已经在他的床垫周围堆得越来越高。这是我的朋友，扬，我低声说道。只有安赫莉卡和埃斯特蕾伊塔听到了我的话。在最后一位朋友进来时，扬一下子跳了起来，他那干瘦的屁股露了出来，两颗金球闪闪发光，他背对着大家飞速做了两三个动作，把他的那些书纸塞到了床垫下面，然后又躺了下去，再然后他捋了捋头发，冷漠地望着众位来客。我觉得我们这间屋子里从来都没挤入过这么多人。

“扬，”我说道，“这位是安赫莉卡，这位是罗拉，她的姐姐，这位是科里纳，这是安东尼奥，这是埃斯特蕾伊塔夫人，咱们聊起过她……”

“叫我埃斯特蕾伊塔就好。”埃斯特蕾伊塔说道。

“很高兴认识大家。”扬说道。

“这位是埃克托，这是塞萨尔，这位是……劳拉。”

“啊呀呀。”扬说道。

我脸红了。

“这位是扬，我的好朋友，好同伴。”

“你好。”大家都笑了。

“晚上好。”扬的语气丝毫谈不上友善。

“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埃斯特蕾伊塔说道，“身上还长了两颗金球。”

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确实如此。”我说道。

“这证明他注定是要干大事的人。长着金球的小伙子都是有能力做出……丰功伟绩的人。”

“实际上，它们倒也不是金色的。”扬说道。

“得了。她看到它们是金色的，我也一样。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也看到了。”安赫莉卡说道。

“那么注定要干大事的女人有什么标志呢，埃斯特蕾伊塔？”罗拉问道。

“来杯葡萄酒？”

“杯子在哪儿？”

“那就复杂得多了，小可爱，”埃斯特蕾伊塔在窗户下方的地上坐了下来，连外套也没脱，“微笑，笑容。尽管尤妮斯说是眼神，但我觉得……那个标志应该是笑容。”

“可是咱们来瞧瞧，深肤色的人，古铜色种族的人全都在忍受命运的折磨，更别提黑人。”

“只有五个杯子，两把椅子。咱们得共用杯子了。”

“你懂什么睾丸啊……你这辈子见过几颗蛋蛋？”

“不多，确实如此，”科里纳承认道，“大概十五颗吧。”

“身份的标志有很多种，小科里纳，”埃斯特蕾伊塔说道，“对于深肤色的人来说，他们留下的痕迹、记忆和晕眩感就是标志。”

“埃斯特蕾伊塔今晚话可真多。”

“可能是因为爬了五层楼，这儿没有电梯。”

“大家坐到地上吧。”

“她很习惯爬楼和熬夜。”

“这儿就只有这一个房间吗？”塞萨尔说道。

“房子就这样，很小。”

“你把什么藏到床垫下面了？”

“没什么！”

“你和我得共用这个杯子了。”安赫莉卡坐到了扬身边的床垫边缘。

“好。”扬说道。

“你真的从来都不出门吗？”

“谁给你说的？”

“你的好兄弟雷莫和何塞·阿尔科。”

“他们骗你的。我每天都出门。我喜欢沿着起义者大道散步。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就像德意志国防军的士兵一样。”

“像什么一样？”

“像德意志国防军士兵，”扬说道，“你没注意楼体的颜色吗？”

“没有，天太黑了。”安赫莉卡微微一笑。她看上去比在哈瓦那咖啡馆或她家时更漂亮了。

“是灰绿色的。就像纳粹军服的颜色。”

“你怎么知道纳粹军服是那个颜色的？”

“我在书上看到的。军服的照片。和这幢大楼的外墙颜色一模一样。”

“真不吉利。”安赫莉卡说道。

“你得过一个诗歌奖，是吗？”

“对。谁给你说的？雷莫还是何塞·阿尔科？”

“没人告诉我，我自己在书上看到的。”

两人互相打量了一会儿，都没有笑，就像是两条在真空中游动的食人鱼。后来扬先开了口：

“我想读读你写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在盯着劳拉看，她坐在我对面，在房间的另一端，靠在罗拉·托伦特身边，两人正在低声交谈。我和她的目光时常交汇，接着我俩就会互致微笑，当然这些不像当时发生的，而像是几个世纪那么久以后才发生，是在我们吃着何塞·阿尔科从只有他

知道的地方买来的玉米饼时发生的，也许那时我们互致微笑也不是因为对对方有好感，至少还没有公开的好感，而是因为在房间的狭小空间里，扬和安赫莉卡散发出的能量越来越大了，他们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脸红得像是新婚夫妇，而我们其他人就像光合作用那样吸收到了能量，又或者那本就是我们的天性，再或者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我们不可能做出别的举动，我发誓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们开始互致微笑了，我们每一对都开始变得像是新婚夫妇，一起不急不慢地吃吃喝喝，同时等待着黎明被送上埃斯特蕾伊塔正在下方睡觉的那扇窗户。

半小时后，我提议到屋顶平台上去继续我们的狂欢——确实是场狂欢——或者出门去搭辆涂画有几何图案、广播里播放民歌的出租车，欣赏墨西哥城的夜景。还有墨西哥的黎明！观察其他车子的车窗中那些若有所思、若隐若现的面庞，车子突然驶入隧道，像是在拍电影，又像是敢死队，可是从隧道另一头出来时，天空已粉饰妥当，人们只须感受它的温柔就好。不过所有这些打算都随着托伦特姐妹的父母的到来而化为泡影了。唯一真实（我想说的是，绝对的真实）的是坐在房间另一端的劳拉的笑容，陨石般的笑容，浅浅的笑容，暗示性的笑容，友好的笑容，烟雾缭绕的笑容，笑里藏刀的笑容，充满哲思的笑容，和我的笑容不期而遇的笑容，就是现在，毫无预兆的交汇——相遇的笑容，互相找寻的笑容。

不过，恐怕最有耐心的读者也想象不出那一系列的表情具体是怎样的。是上帝把我从那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展现出这么多种笑容的姑娘手里解救出来的。不对。所有的笑容都只是一种。坠入爱河之人的眼睛会变成苍蝇的复眼，所以说那种笑容都只不过是劳拉的嘴唇和牙齿活动的多重投射而已。

不过哪怕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劳拉不会慢慢变得和一切人或物一样吗？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母亲，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阿兹特克公主，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特佩雅克山上的那位妇人^[1]，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哭泣女人^[2]，就像注定要忍受折磨的完美无瑕的玛丽亚·菲利克斯^[3]的幽灵……

我猛地跳了起来。我觉得有点头晕。

我说我要下楼，去两个街区外的中国食品店去买点甜面包。我问有谁愿意陪我一起去。我立刻想到何塞·阿尔科很可能会自告奋勇，我正要纠正自己的表态，这时劳拉说，我陪你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她是对谁说她会很快就会回来的？对塞萨尔说的吗？

我在数大家递给我的钱时手一直在抖，还不停地在脑海里哼歌。

“这里就像是玩偶的房子，我也想有这样一个住处。”我们出门后她说道。

从屋顶平台望去，云朵似乎正在吮吸这座城市的电光，它好像伸出了胳膊，把最高的建筑都搂在了怀中。

“要下雨了。”劳拉说道。

我们房门口挂着的小灯照亮了她的面庞，在某个时刻我似乎感觉她的脸变得透明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她那银质的面孔上唯一依然具有活力、属于尘世的就是那对栗色的眼睛。

“你知道我给你起了个什么名字吗？”我们下楼梯时我对她说道。

“给我？”在路过鲁瓦尔卡瓦先生家门前时她笑了。

“对，对。”

“你怎么会想着要给我再起个名字呢？你不喜欢我现在的名字吗？”我们走到楼下门厅，我开门时，她问道。

“我很喜欢你的名字。与此无关，是我突发奇想。不过不要紧。忘了这事吧。”

“现在你不告诉我都不行了。”

“不，还是忘了这事吧。”

“什么名字？”

“你保证你不会生气。”

“那可不一定。说吧。”

“哎呀，说真的，你永远都不要跟我生气，不然我会很难受的。”我像只兔子那样傻笑起来，不过我说的却也都是真心话。

“到底是什么名字？我可不能保证什么。”

“阿兹特克公主。”

劳拉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事实上，我当时就像个傻子一样，也跟着笑了。上帝啊，我真是个怂包，我说道。对，对，劳拉附和道。我们离开了起义者大道。和设想的一样，中国食品店还在营业。

（几天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塞·阿尔科。太巧了，他说道，有辆贝纳利牌的摩托车就叫阿兹特克公主，那辆车是栗色的，很大，还挺新，油箱上嵌着车名，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为什么，我说道。那是辆偷来的车，他们肯定可以便宜卖给你。不要，我说道，忘了这事吧，我不会骑摩托，也对它不感兴趣。车子现在在一个诗人手里，何塞·阿尔科说道，他叫莫弗莱斯，你肯定会乐意认识他的。可是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说道，而且我还没有驾照，再加上我也不喜欢骑摩托，我可不要那些破烂玩意儿。好吧，好吧，何塞·阿尔科说道。）

“有时候，”我对劳拉说道，“它整晚都营业，有的时候下午六点就关门了，这都不准。没有个稳定的营业时间。”

“这地方真美啊，虽然看上去有点脏乱。”

“这家店叫伊拉普阿托^[4]之花。我想店主大概并不在意店铺的外观。”

“为什么不叫北京之花或上海之花呢？”

“因为店主是在伊拉普阿托出生的。只有他家里那让人肃然起敬的爷爷辈的人是在中国出生的，我觉得是广东，但也可能是我搞错了。”

“是他告诉你的吗？”

“埃米利奥·黄，他是店主、厨师和头号服务生。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喝杯拿铁再回去。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营业时间如此错乱。”

“你这儿的营业时间为什么那么奇怪呢？是雷莫告诉我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

“实际上并不奇怪，”埃米利奥·黄说道，“营业时间是弹性的，有时候可能是临时起意，但是并不奇怪。”

“他烤的饼干也很棒。”我说道。

“雷莫对我说有时候你会营业到天亮才关门。”

“嘿嘿，应该是我失眠的时候才会开那么久。”

“我还没告诉你埃米利奥·黄每次失眠都会写诗呢。不过你可别求他给咱们读诗。他想再过上几年就把铺子卖掉，然后到巴西去。”

“坐卡车去。”埃米利奥说道。

“为什么你不愿意让他给咱们读诗呢？”

“你没猜到？因为他是坎波斯兄弟的追随者。”

“坎波斯兄弟又是谁啊？”吧台上方的灯发出沙黄色的光芒，照在劳拉的脸上。吧台另一边，埃米利奥·黄皱了皱眉头，表示同情。我感觉我已经找到终生所爱了。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劳拉，可是埃米利奥和她突然笑了起来。中国人讲了些关于怎么写旅行笔记的事情，也可能是劳拉先开口问他的，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她也想那样。去巴西？坐卡车旅行？当中国食品店的老板？我也想开这样一家食品店，我说道。劳拉的面庞忽明忽暗，不是由于灯光的缘故。有时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有时又是栗色的，有时她看我的眼神非常平静，尽管镜子里她的目光就像是缓慢飞行的箭矢，那些箭很遥远，很伤感。我问自己为什么她那双深邃美丽的眼睛会给我这样的感觉，与此同时站在吧台另一侧的那人正在讲述曾经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黄家人的故事，广东的黄家人，旧金山的黄家人，洛杉矶的黄家人，蒂华纳的黄家人，穿越边境一直往南走的黄家人，对于在旧金山定居的中国夫妇而言，南下的选择并不常见，他一直讲到他的先人们在伊拉普阿托艰难地做起了生意，然后死去。劳拉站在我们中间，时而感到同情，时而表现出惊讶。当埃米利奥解释说他的爷爷奶奶有足够的理由离开旧金山时，她点了点头。他说厨子和洗衣工中也有黑帮分子存在，想想看，在烟雾缭绕的厨房和洗衣店里死去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种烟雾要比开膛手杰克时期的伦敦大雾还要糟糕。她对炸猪肉、炸蛇肉和烤草莓的做法很感兴趣，还对埃米利奥说他的店铺很漂亮，很有特色，还说，我肯定会再来的，你放心吧，然后她乞求他不要把铺子卖掉，或者在他准备好要去巴西时把铺子租给她也行。

“坎波斯兄弟……抱歉，只是个愚蠢的笑话。”

“没关系，”劳拉说道，“我原谅你了。”

我们喝完了拿铁咖啡。埃米利奥把甜面包用食品纸包好了。

“好了，我们走吧。”

“不知为何，我感觉把埃米利奥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太好。”我说道。

“那就让他跟我们一起走吧。”

“噢，不必了，我已经习惯了，你怎么会有那种感觉呢？”埃米利奥说道。

离开中国食品店后，劳拉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了。她之前的热情都烟消云散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上楼梯时，她说道：

“我得提醒你，雷莫，我不是什么好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楼梯间很黑，我感觉她好像笑了。

“我不相信。”

劳拉停下了脚步。

“是真的，我很坏，一些小事使我感到难过，我会转头把气撒到别人身上。还有时我觉得自己有成为女杀手的潜质，或者我可能正在变疯。”

“你是在开玩笑。”说这话时，我把脸向她凑近过去，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下去。

我从没像想吻劳拉一样想吻别的女人。

“你看见了吗？我想要你亲我，虽然我知道如果我把这话告诉塞萨尔，他肯定会觉得受伤。”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呢？”

“肯定不是今晚。”

“那还好。”

劳拉的眼睛又开始发光了，就像是在伊拉普阿托之花时一样。站在楼梯上的我既感到幸福，又觉得晕头转向的。楼梯之前平平无奇，此时却变成了具有非凡意义的东西，一半是毒蛇，一半是悬崖。

“我从没爱过谁。”我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你爱上我啦？”

“我想是的，但是你不必担心。之前没谈情说爱只怪我接受的教育。现在我是真的、深深地爱上了你。”

劳拉有些难过地微笑了一下。在那短暂的时刻里我们两人似乎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了，而变成了两个动画人物。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她：我觉得此时的你和我就像是被扔在真实背景中的两个动画人物，不过可能连背景也不是那么真实。

“就像韩塞尔与格蕾特？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劳拉问道。

“我不知道。我想摸摸你的乳房来确认一下。”

“好，摸吧。”

我摸了摸她的右侧乳房，然后又摸了左侧的，再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傻傻地笑了起来，嘿嘿嘿，没错，这边是继母，这边是她的魔镜。

“我看你就像是兔子兄弟^[5]。”劳拉边吻我边说道。

楼梯似乎旋转了起来。我们处在黑暗之中，可是我们的头顶上却出现了一丝亮光，尽管距离很远还照不到我们。劳拉问我在看什么。我给她指了指那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的光亮。

“楼梯好像正在倾斜。”她说道。

确实如此，那是因为灯光已经几乎照到我们头顶了。

“你的嘴唇很美味。”我说道。

“你的也是，咸咸的。”

我舔了舔她的嘴唇，有青草和羊奶的味道（埃米利奥·黄是用什么奶给我们做咖啡的？），但是我没有告诉她。

“你真的爱上我了吗？”

“千真万确。”

“可是为什么呢？我今天感觉很不好。我去找罗拉也是因为我情绪很糟，能看出来，不是吗？”

“给你开门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你了。你那时可真严肃。”

“可怜的塞萨尔不想来。我花了一整天工夫，最后才把他拖了过去。我想我就是想坐坐他的车。”

“你真是个诚实又现实的姑娘。”我满怀敬意地说道。

劳拉满意地笑了，然后又吻了我一下。我们拥抱在了一起，就好像以后也不会见面了似的。

“我们可以在这儿做爱，没人会知道的，这幢楼可真是奇怪。”她说道。

“扬说这里是德意志国防军的图腾，”我答道，“我感觉我不行。”

“你不行？你是说你不能在这里做？”

“对。我不行。我没勃起。我总是这样。”

“你没勃起？”

“没有。我可以勃起，但是现在不行，此刻对我来说，怎么给你解释呢，是很特殊的，也很有氛围，但我的确没勃起。你瞧，你摸摸看。”

我抓着她的手，放到了我的裤裆上。

“是真的，你没硬，”劳拉笑了，但是声音很小，“对于一个小伙子而言，这情况还真是罕见。可能因为这里是楼梯间。”

“和楼梯间没什么关系。”劳拉还没把手移开。

“你是害怕吗？”

“有一点。”

“你不会还是处男吧？”我差点儿没听清她的话，她是伴着短促的笑声提出这个问题的，灯光在楼梯平台上散开，远不如她的笑声引人注目。

“差不多吧。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可聊的故事。但是我发誓我并不想到死还是个处男。”我说道。

“啊哈。”

她移开了手，呆立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

“我和你那位中国朋友挺聊得来的。现在严肃地谈谈吧，告诉我，他也是诗人吗？”

“对，我的天呐，我希望你别因为我没能硬起来而讨厌我。”

“没有，没有。”

“啊，啊呀，我以为你讨厌我了。”

“没有，傻瓜，真没有。让我有点心烦的是你说你爱上我了。就这样吧。咱们上去吧，他们可能以为咱们出什么意外了。”

回到屋顶平台时，我发现天空依然和我们离开时一样黑。又厚又黑的云朵中间不时夹杂着几丝深紫色的云。雨声从远处传来，不过这片区域连一滴雨都还没有落下。进入房间前劳拉转过身来，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当她的身体正要离开时，我抓住了她的肩膀。我们听到朋友们的声音从门内传来。我想继续和你说话，我对她说道。可是我说话时破了音。我俩都笑了，但笑的原因肯定不同。希望下场大雨，我心想。

“阿兹特克公主。真有意思，”她嘀咕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

“我给你说过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进到屋里。扬正在大声吆喝。他举起杯子招呼我们。他已经酩酊大醉了。我坐到地上，很快手里就多了个杯子。

[1] 指瓜达卢佩圣母。

[2] 源自墨西哥民间传说。根据传说，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由于过度悲伤愤怒，她在投河自尽前淹死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受到诅咒的女人的鬼魂只得在当地游荡，为自己和孩子的遭遇而哭泣，据说她的哭声会带来不幸和死亡。该传说曾在1933年和2019年被改编为电影。

[3] 玛丽亚·菲利克斯（María Félix，1914—2002），墨西哥女演员，曾被誉为西班牙语影坛最美女星。

[4] 伊拉普阿托（Irapuato），墨西哥中南部瓜纳华托州城市。

[5] 迪士尼电影《南方之歌》中的角色。

“你真的认为这是正常的？我想说的是，在墨西哥搞这样的艺术家聚会是正常的吗？我愈发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很让人伤感，又很阴暗。”

“没错。人们喝了很多酒。他们不懂得克制，一高兴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总是这样。”

“还好有人跟我说话。要是我一个人的话，肯定早就走了。”

“那可不好办。他们是不会允许获奖者那样子离开的，这聚会就是为您而办的呀……”

“真让人害怕。”

“我可怜的朋友啊，别拉着脸啦。咱们继续聊您的作品吧。为什么书里会有那么多场景设定在欧洲呢？您难道不知道真正的大学都建在特殊的地方吗？例如偏僻的村落？”

“请别用这种腔调和我交谈，您这样子就像是塔维亚尼兄弟^[1]失散多年的姐妹。我这么说不是推卸责任，实际上，在我这部处女作里根本就没有设定在欧洲的场景。里面提到了一些我童年时期阅读过的书籍，略带乡愁，又有些绝望。我记得还提到了一些杂志，《U-2》《敢死队》《喷火式战斗机》，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叫别的名字吧……里面还有些部分可以被视作对瓦乔费欧传授的知识的诠释：通过那些推断，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拦在面前的墙壁变成了敞开的大门……这话很像南方人说的，很有康塞普西翁^[2]特色……不过还是请您提问吧，我不想让您觉得无聊。”

“我不无聊。我只是起了鸡皮疙瘩。您刚才是不是说过我们现在正身处丛林中央的一片空地之上？”

“咱们到屋顶平台去吧，您可以亲眼看看。或者咱们打开窗，我认为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的。”

“不，别那么做。回头咱们再一起出去透气，我会挽着您的胳膊跟您一起去的。我觉得如果现在出去的话，我肯定会生病的。您还是给我讲点儿什么吧，随便什么，例如墨西哥新诗。”

“天啊。我还是坚持认为，既然您感觉不舒服，咱们就应该离开这地方，至少去喝杯咖啡也行啊。这里到处都是精液和淫水的味道！”

“确实如此。而且还是老家伙们的精液和淫水。”

“我得再补充一句，是知识分子老家伙们。”

“再跟我聊聊您的书吧，我担心这样聊下去的话，我会被辞退的。”

“您不会缺少工作机会的。您是个特别和善的记者。”

“谢谢。”

“而且还很，怎么说呢，很有牺牲精神。”

“谢谢。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咱们还是回归正题吧。”

亲爱的厄休拉·勒古恩：

[1] 指保罗·塔维亚尼（Paolo Taviani，1931— ）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Vittorio Taviani，1929—2018）两兄弟，是意大利著名的导演组合。

[2] 康塞普西翁（Concepcion），智利城市。

我之前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过还好没给您寄去，那封信很浮夸，里面全是在您的那些美妙作品中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今年十七岁，智利人，不过现在住在墨西哥城的一个阁楼里，从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非凡的黎明美景。阁楼上有好几个房间，不过只有五间住了人。我和一位是不是智利人还存疑的朋友住在其中一间。在另一个房间里，不妨就叫它二号房吧，尽管这种排序没什么道理可讲，那里面住着一位家政妇女，也叫用人或仆人或干活的或打扫卫生的，和她一起住的还有她的四个年纪非常小的孩子。三号房里的住客在鲁瓦尔卡瓦先生的几间公寓中的一间里当女佣。四号房里住着个姓埃斯佩霍的老头，他很少出门，不过我出门的次数也不多，所以这事儿咱们就不讨论了。五号房里住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很会打扮，气质优雅，每天一大早就消失不见了，直到晚上十点以后才回来。在我们称为阁楼中央走廊的两边摆放着许多花草，它们营造出了令人愉快的热带氛围，走廊上还有三间浴室和两个卫生间，全都很小，不过还算舒适，都装着厚重的木门。两间浴室只有凉水，一间有热水，靠烧木屑运转的锅炉给水加热，可惜那是那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妈妈的私人浴室，她还上了锁，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也算不上什么难题，只有在特别冷的日子问题才会显现，在那种时候想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在走廊边的洗衣池里洗脸洗手。这幢楼一共八层，我们的房间朝着马路，透过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倒确实很大）可以望到街道上的状况，街道又长又亮，我每次朝下看时都觉得心旷神怡。我的床垫是直接放在地上的，我朋友的也一样，地上铺的是奇特的芥末黄色地砖，我就是趴在砖上写信的，我也是这样写我的书稿的，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它能成为一本科幻小说。当然了，这可不容易。我试过去学习、钻研、观察，但总是会回到原点，我生活在拉丁美洲，这不容易，我是拉丁美洲人，这不容易，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我是智利人，这不容易，尽管乌戈·科雷亚^[1]（您熟悉这个名字吗？）可能会反驳我。至于我写的那些信，全都是写给美国科幻作家的，我只写给那些我认为还在世的作家，而且还得我喜欢他们的作品才行，例如小詹姆斯·蒂普垂^[2]、西奥多·斯特金^[3]、雷·布拉德伯里^[4]、R.A.拉弗蒂^[5]、弗里兹·雷伯和阿尔弗雷德·贝斯特^[6]。（啊，如果我能跟亡者交流的话，我肯定会给菲利普·K.迪克写信。）我不认为我写的信大多能到达收信人的手里，但我会用所有的力量来等待，然后继续写信寄信，这是我的责任。作家们的地址我都是在科幻杂志上看到的，有的信我直接寄到了散落在美国各地的科幻杂志社，我希望杂志主编们能把我的信转交给我喜爱的作家们。还有的信被寄到了出版社或是一些文学代理公司（尤其是有名的斯皮德曼兄弟开的那家），当然我也会直接寄到作家家里去，只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对您说这些是想让您明白这事并不容易。事实上也不难，不过我可以让人相信它很难。就这样，简单来说，我甚至可以告诉您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写信，而且收信人都是那些我很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的人。这很有趣，就像是可视通信设备被发明出来之前先用无线电设备进行交流一样，嘿嘿。成年累月地等待，就是为了接收到某些神秘的回复。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不适用于分析你和我之间的通信，哪怕适用的话，咱们也不要让它过于戏剧化。啊，亲爱的厄休拉，事实上，可以支配自己所有的时间，不断写信，这本身是件很让人放松的事情，我想通过信件说服他们接受一些事情，但我却从没见过他们本人，我只能做些奇怪的梦，不过那些梦也是很安宁的……尽管它们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了。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说每十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梦到过核武器划破天际。也许实际人数会更多，也许很多人更容易把前一晚做的噩梦忘掉。不过我担心的是在拉丁美洲，梦境会和其他邪恶的事情产生联系。每二十个拉丁美洲人里就有一个曾梦到过自己看到上了山的亚伯拉罕和以撒。^[7]每十个拉丁美洲人里就有一个梦到过逃出埃及。每五个拉丁美洲人里就有一个梦见过“Quo Vadis?”^[8]和维克多·迈彻^[9]。但其实随着第一缕晨光射出或是第一声闹钟响

起，所有的被统计者就都把最可怕的噩梦忘掉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回答说他们曾经至少一次受到过那最可怕的噩梦的折磨，但却没人记得那种噩梦的内容。阴影，虚无的身躯，难以理解的言语，当你醒来时，你只会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长出了第三个肺或是在漫长夜里丢失了一个肺，到底肺是多了还是少了，那感觉是说不准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所有事情。我就写到这儿吧，已经早上八点了，大伙在我们家搞了场很棒的聚会，不过现在我困了。一切都混乱无序！我现在独自一人。我会去某个小水池刷牙，然后找块黑布遮住窗户，再然后就该睡觉了……你问我为什么要一直写信？可能只是因为心烦，或者是因为不心烦……又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疯了，毕竟我读了那么多科幻小说……也许这些信就是我的NAFAL飞船^[10]……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请您接受我无尽的谢意。

一个拥抱，
扬·史瑞拉

[1] 乌戈·科雷亚（Hugo Correa, 1926—2008），智利记者、科幻作家。他也是最早在美国出版作品的拉美科幻作家之一。

[2] 即本书第一封信中出现的爱丽丝·谢尔登。

[3] 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 1918—1985），美国科幻作家，现代科幻小说奠基人之一。

[4] 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 1920—2012），美国科幻作家，被视为将现代科幻领入主流文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5] R.A. 拉弗蒂（R.A. Lafferty, 1914—2002），美国科幻作家。

[6]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 1913—1987），美国科幻作家、电视和广播剧编剧，并参与漫画剧本编写。

[7] 见《旧约·创世记》第22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8] 拉丁语，意为：“你往何处去？”传说圣彼得在尼禄迫害基督徒时逃出罗马，在路上遇见耶稣。圣彼得问耶稣道：“主，你往何处去？”耶稣回答说他要返回罗马，再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圣彼得受到鼓舞，回到罗马，并最终殉道。

[9] 维克多·迈彻（Victor Mature, 1913—1999），美国演员。

[10] 出自厄休拉·勒古恩的小说，NAFAL是nearly as fast as light（近乎光速）的缩写。

我试着喝酒。我试着嘲笑那些并不好笑的言谈。我把埃斯特蕾伊塔从她那平和的、远离这个阁楼和众人的胜利宣言的美梦中叫醒，在再次进入梦乡之前，埃斯特蕾伊塔微笑着喝了杯茶。（我感觉很糟糕。）我想让自己看上去像是在沉思，像是很冷淡，像是隐形人，于是我开始在喧闹中翻阅一本文学评论集，事实上我希望所有人都赶紧离开，把灯关上，把我留下，我好躺到床垫上去。在某个时刻，他们真的开始消失了。扬穿好了衣服，和何塞·阿尔科及托伦特姐妹一起走到了走廊上。接下来佩佩·科里纳也消失了。直到劳拉和塞萨尔也离开之后，我才回过神来，塞萨尔看上去比我醉得更厉害。我不想移动身体，就只想静静地待着，等待着。失落轻柔地变成了焦虑。空间突然变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了埃克托、埃斯特蕾伊塔和我。然后他们对我说安赫莉卡觉得不舒服，他们把她带出去了，让她在屋顶平台上散散步。就像侦探电影一样，不可能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很长时间：扬和安赫莉卡钻进了一间卫生间，何塞·阿尔科和罗拉在晾衣服的架子旁抽烟，很快佩佩·科里纳也加入了进去。我不记得门再次被打开是多久之后的事情了，所有人又一个接一个地重新现身。在最后一人进来之前我猛地跳了起来，我无法接受劳拉不在其中的可能。但其实她在，当我俩再次对视时，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是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结果了。而尽管那个夜晚看上去永无尽头，实际上却已经在某个时刻结束了。

我应该问问别人的感觉，或是查查某本日历，因为我有时会感到那是那一年中最漫长的夜晚。不止如此，有时我甚至坚信那个夜晚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它和其他所有的夜晚都不一样，其他的夜晚在结束时要么是一口把黑夜吞掉，要么是细嚼慢咽不断反刍，最后才慢慢迎来黎明。我说的那个夜晚——如穿着一百千米长的靴子的九命神猫般的夜晚——是在一些非同寻常的时刻消失或离去的，就像用镜子做游戏一样，在夜褪去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始终不愿离开，这也就意味着它并未完全消散。它是最和善的九头蛇，它在早晨六点半时又恢复到了凌晨三点四十五分时的样子，尽管只持续了五分钟，而且很多人可能对此心生厌恶，可是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恩赐，是真正的宽恕，是天空在倒带。

“我梦到的那个俄罗斯宇航员.....我想我现在知道他是谁了.....”

“啊，是吗？”

“别利亚耶夫.....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

“你在说什么俄罗斯宇航员啊？”

“他靠近了我待的那个像是牢房又像等候室的地方.....一个浅灰色、软塌塌的地方.....他和我之间隔了张网，我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看到网另一边的情况，我能看到别利亚耶夫是从怎样的环境中过来的。”

“我浑身酸痛.....几点了？”

“六点，下午六点。”

“啊呀，还有点恶心.....你还待在床上干什么？”

“我一个小时后才睡下，因为太无聊了，也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节奏保持一致.....”

“好吧，哈哈.....我回来的时候你睡得很死，躺在那里活像截树干。”

“我睡了一阵子，后来醒了。我做了饭，冲了澡，工作了一会儿，然后又睡了.....为什么你不把窗户上的黑布取下来呢？.....好了，现在你听好：网后面有个机场.....”

“当然。”

“机场另一边，往远处去，在平原的尽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座山的轮廓.....在梦的开头我俩都望着那个方向，但是后来他走了过来，一直走到我站的地方，他微笑着介绍了自己，还做了些高雅的动作.....他是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完全不知道，扬。”

“他是个科幻作家。”

“我想也是.....你读过托尔斯泰和布尔加科夫写的东西吗？”

“很少.....”

“我想也是.....你得读读其他俄语作家的作品，或者说其他种类的文学作品。你不能一辈子只读关于宇宙飞船和外星人的故事啊。”

“别干扰我，继续听我说，这很有意思：实际上那座机场就像是个网球场，而那两座山则像是纤维灰浆做的金字塔.....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那儿的景色的话，你就会发现些东西，一种不真实的光芒洒在所有东西的周围，别利亚耶夫知道此事，他希望我也发现这一点.....他的眼睛被宇航头盔的面罩遮住了，所以看上去有些模糊不清，不过透过它们我还是感觉到了那里有其他人存在，尽管我看不到.....一个隐形的团体.....一片充满能量的地区.....”

“什么.....”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对他说道，我的物理知识很匮乏，在学校里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写诗了。那种无力感让我有些想哭.....在梦里，当泪水涌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昏暗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清亮了起来，清亮得变成了极致的白.....于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动动停停，尽管声音似乎是从其他地方传来的，就好像现场有许多个隐藏的扩音器一样：我是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他说道，苏联公民，未知大学

的教授……”

“未知大学是什么？”

“一所没人知道的大学，这显而易见。阿尔弗雷德·贝斯特曾经在一则故事中提到过它。至于别利亚耶夫，你肯定不知道他是1884年出生在斯摩棱斯克，1942年1月在列宁格勒被饿死的。”

“真操蛋……”

“后来别利亚耶夫拍了拍我的背，然后就不见了。平原上先是刮起一阵强风，然后一片黑云压过来，不过我觉得那种颜色才是真正的鲜活，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我觉得那也许就是死亡的模样。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明信片里，可与此矛盾的是周围的风景开始逐渐离我远去。直到最后连网球场上的那张网也绷断了。太奇怪了。它是突然间绷断的，然后就像片羽毛那样落到了地上。我肯定再也没人会去那里打球了。然后我就醒了。我醒的时候你正在说梦话。”

“啊，是吗？”

“对，你和劳拉怎么样了？”

“挺好。这边的情况呢？”

“像是一桩丑闻。我想我不会再邀请那些人来这里了。他们喝了酒之后就变得特别有侵略性，塞萨尔和何塞·阿尔科挥拳打了起来。还好他没抓我当替罪羊。”

“扬，那事和替罪羊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最后谁赢了？”

“当然是咱们的朋友，但是他借助了点外力。”

“不会是好几个人一起打可怜的塞萨尔吧？”

“准确地说，我们其他人只是死死地抓住了他，动手打他的只有何塞·阿尔科一人。”

“真是群懦夫。你听好，我真不敢相信你们做了那么一档子事出来。”

“嘿嘿嘿……”

“这样的话，你后来梦到别利亚耶夫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是你那糟糕的潜意识在作怪。”

“最好还是把那看作自卫。你的情敌可不是什么善茬。反正如果换成我的话，在那种事上肯定会谨慎行事。他在离开之前还扬言说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何塞·阿尔科打他的每一拳他都要在你身上加倍奉还。不过天地良心，何塞·阿尔科倒也没打他很多拳。”

“劳拉会怎么想呢？”

“他也说了些和劳拉有关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复述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要在那个点和劳拉一起外出。塞萨尔很绝望，他还去屋顶平台上找了你们半天。也许他觉得你俩肯定是藏到某个卫生间里去了，这不是很常见的传统吗，这方面我可是挺有经验的。后来他没找到你们，自己回来了，然后就爆发了。顺便问一句，你俩当时藏到哪里去了？”

“我们一直走到了查普特佩克，边走路边聊天。然后一起吃了早餐，再后来我就把她送上地铁了。”

“你瞧，塞萨尔肯定认为你俩跑到某个廉价宾馆干那种事去了。”

“他真是个混蛋。”

“还好我们亲爱的何塞·阿尔科最后拿拳头说话了，他写的东西不见得多么棒，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不错的棒球强击手。此外，你还得注意，你的那位情敌在打斗的时候还试图尽可能地毁掉咱们这间简陋房屋中的家当。而何塞·阿尔科则不同，他更担心咱们的杯子和书，他用手保护地面上东西的次数比护脸的次数还多。”

“总有一天，无私精神会要了他的命。”

“咱们还是敲敲木头吧，别让恶语成真……无论如何，事情的结局还是好的。安赫莉卡和我一起压制住了那个失落的男人。他连一滴血也没流。埃斯特蕾伊塔直到要离开时才醒过来。科里纳和门多萨提议我和他们一起找家已经开了门的餐厅吃早餐，但是我拒绝了。这可便宜了那个门多萨，他在出门时直接把手搂到安赫莉卡的腰上去了。当时已经早上七点了，大伙都一晚没睡，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的那个动作可能也是出于好心，但我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罗拉和埃克托在打架之前就走了。何塞·阿尔科留下和我又待了一会儿，我俩一起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不过我俩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像疯子一样一起嘲笑你的那位塞萨尔老兄，嘲笑所有人。最后他也走了，我直接躺到了床垫上。不过我没睡着，我给厄休拉·勒古恩写了封信。你今天能帮我信寄出去吗？”

“当然可以。你给她说了什么了？”

“我给她讲了我做的梦，还有革命的事情。”

“你没跟她提未知大学？”

“没有……”

“你怎么不问问她是否知道未知大学在什么地方呢？”

[1]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Alexander Belyaev, 1884—1942），苏联科幻作家，被誉为“苏联科幻之父”。1941年起，纳粹军队展开围攻列宁格勒的行动，导致该地区陷入严重饥荒，别利亚耶夫也因此而死于饥饿。

在很多人看来，接下来的几天，或者也许应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异常甜美的。在那之前我只是墨西哥城里的看客，一个自负的新人，二十一岁的蹩脚诗人。我必须说，这座城市不在意我，而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就只是卖弄学问和对文字的刻意雕琢。（啊呀，如果当时什么事都没发生，或者至少扬和何塞·阿尔科当时没开口说话，那么我就不会待在现在待的地方了，而是会去拉丁美洲文人的天堂，也就是说到美国的大学里教书，或者哪怕是最差的情况也会到一家不怎么好的出版社改稿子，安逸的停留，无尽的愿望。）不过那些日子确实很甜美，异常甜美。扬和何塞·阿尔科沉迷于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猜测和数据分析。我继续做我的看客，但是又有些不同：我观察事物的眼睛可以随时重现看过的街道和物体的样子，这也许就是有的人（夏多布里昂？十字路口的先知？）所说的干性高潮吧。在阿兹特克公主的召唤下，所有的克制、计划、诗歌和口袋本爱情故事书都被我抛在脑后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我抛在脑后了，除了墨西哥城（每个夜晚都任我欢度）和刘易斯·卡罗尔。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很快就被打乱了：一边是突然出现的爱情约会，另一边则是迷宫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带来的刺激。何塞·阿尔科成功搞到了和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见面的机会。佩佩·科里纳在那个夜晚听我们讲过《民生文化周报》的事情后，给我们要来了一个叫莱昂纳多·迪亚斯的人的住址，那人是个诗人，特别痴迷种种怪诞的文学想法。扬往美国寄的信越来越多了。在我的梦里，劳拉对我说前进，还要我去寻找飓风的踪影，梦中的场景是一座高山，劳拉头发闪亮，充满活力。在现实生活中劳拉说了我爱你，我们会非常幸福的。还得当好人！我补充道。我们要做善良仁慈的人，劳拉，我们要做慷慨仁爱的人！劳拉笑了，但我是认真的。一天下午——那个午后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在乘坐地铁站内的电梯时，我跳了段踢踏舞。就是这样。我之前从未试过跳踢踏舞，可那次真的跳得特别完美。劳拉对我说你跳得可真好啊，就和弗雷德·阿斯泰尔^[1]一样。我很惊讶。我耸了耸肩，眼眶里满是热泪。

“你为什么难过啊？”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被什么东西撕成了碎片。”

“就因为你跳了支踢踏舞？小可怜，来让我抱抱你吧。”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抱在一起吧，你愿意吗？”

“可是我们会妨碍出去的人。”

“好吧，那我们也出去吧，但是要慢一点。”

再重复一遍：我们要做善良仁慈的人，劳拉，我们要做慷慨仁爱的人！然后劳拉笑了，当然了，我也笑了，但我笑得不是那么自然。

至于扬，我已经提到过他往美国寄的信越来越多了。实际上他几乎整天都在写信，要么就是在读何塞·阿尔科和我给他带回来的大量科幻类图书。那些书几乎全都是偷来的，和何塞·阿尔科一起到书店去并不难，干起这事来他乐此不疲。真正难的是满足扬的要求，找到他列出的所有作家和书目，其中很多都没有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我们不得不转战那些卖英文原版书的书店，可是在墨西哥城里这样的书店并不多见，最糟糕的是，不止一家书店安装了可以媲美恶魔岛监狱图书馆的监控系统。不过，尽管经历了一些有惊无险的波折，我们还是给扬搞到了所有他指定的书。他在这些书上画线，做标记，然后再画线，那些书堆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简直避无可避。晚上迷迷糊糊不开灯出去撒尿是很危险的，一枚E.E.史密斯^[2]炸弹，或一只奥拉夫·斯特普尔顿^[3]小老鼠，或菲利普·K.迪克的几乎整套全集随时都可能像巨石一样把你绊倒。从噩梦中醒来时发现布莱恩·奥尔迪斯^[4]或斯特鲁伽茨基兄弟^[5]的某部作品被你夹在两腿之间，这绝对算不上什么怪事，当然了，去

研究那本书怎么会跑到那里去也只是无用功，不过我倒也确实承认我们不经常整理床铺。（我可以毫不夸张又不无自恋地承认，有一次我是被自己的惊叫声吓醒的：我没有踢到哪本书，而是有本书的书页夹在了我一只脚的脚趾中间，它就像猴子一样抓着我，更糟糕的是，我的一只脚安静地睡着，另一只脚却有违常理地夹住书页不肯放开。）直到扬决定整理这个银河系垃圾桶，事情才有所好转。一天中午，书被靠墙堆放在了一起，不过事实上那堆书这样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书，而像武器广场上的长椅。从那堆偷来的书里散发出的气息、反射的光线就和武器广场给人的感觉一样，只不过缺少了树木和鸽子罢了。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那恰恰是扬刻意为之的结果。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惊讶地问道。

“靠耐心。”扬的表情有点奇怪，他看上去很兴奋，皮肤近乎透明。

“这让我想起了……洛杉矶莱斯的武器广场上的长椅。”

“真理：永远不要瞧不起口袋书。”

第二天长椅消失了，或者说长椅变成了四十厘米高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桌子，它的内部是实心的，不过在桌子五个表面中的两个上，都有两条内部中空的通道，它们在中心点交汇成一条通道，又从远端的表面穿出，这侧的表面都是书页。为了把这个玩笑开得更大，扬还在桌子中间约翰·瓦利^[6]的作品封面上摆了一杯水，里面插着一枝花。

“这朵康乃馨是埃斯特拉太太的女儿送我的。”

“太美了，扬，太美了……”

“嗯嗯，没错，还不赖……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可以用它吃饭，它很结实，但是咱们得先铺个桌布，是吧？我可不想让任何一本书被弄脏。”

“算了吧，伙计，咱们还是在真正的桌子上吃饭吧，你别乱搞了。”

“你说什么呢，你摸摸，摸摸，它很结实啊，做工很好，操。”

我们就拿它当饭桌了，当然在那之前我们先铺了块好布，然后才在上面吃了晚饭。何塞·阿尔科也和我们一起吃饭，刚开始他还不相信，我们只得把桌布掀开，用这书堆的桌子让他开了开眼。晚上，在睡觉前，扬还提议说我可以那桌子上写字。我立刻拒绝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你在书椅上坐过吗？”

扬闭着眼，似乎已经睡着了，但后来他用十分清晰的嗓音回答了我的问题。

“没有。”

“你怕书椅承受不住你的重量？”

“不是，跟那个没关系。”

“操，那你为什么不坐坐看呢？或者你为什么不让我在上面坐坐呢？”

“我有点……害怕……不对，不是害怕，是遗憾，而且是深深的遗憾。妈的，这话就像是歌词。”

“不，像是博莱罗舞曲的配词……嘿嘿嘿……晚安吧，扬，愿你做个好梦。”

“晚安，雷莫，愿你写出好东西来。”

于是开始害怕的人变成了我。不是遗憾也并非不安，而是害怕。就在那里，我的嘴边

夹着一支烟，整个房间只靠我的小台灯照亮，我的朋友很快就会开始打鼾，然后真正开始休息（上帝爱他），整座城市则在窗外继续运转。

不过最后天亮了，恐惧消散了。黎明对我说，你们好，你们好，臭小子，胆小鬼，你们好，你们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推开窗玻璃，我们的影子投到了墙上。当然了，我说道。五分钟后，依然睡意蒙眬且用床单盖着头的扬也说了句：当然了。你是非凡的黎明，你答应每隔三天就会来探望我们一次。没错，没错，黎明说道。于是我们哈欠连连，泡了茶，今早感觉有点沉重啊，不是吗？我们又吸了烟，然后给彼此讲述了前一天晚上的梦境。你们好，你们好，呀呼，我是永远会战胜死神的墨西哥的黎明^[7]。

“当然了。”扬有点讥讽地说道。

“没错，没错。”我嘀咕道。

[1]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 1899—1987），美国演员、舞蹈家。

[2] E.E.史密斯（Edward Elmer Smith, 1890—1965），美国科幻作家，太空冒险题材科幻小说的开拓者。

[3] 奥拉夫·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 1886—1950），英国哲学家、科幻作家。其作品深刻影响了阿瑟·克拉克、斯塔尼斯瓦夫·莱姆等著名科幻作家。

[4] 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 1925—2017），英国科幻作家、科幻文学研究者。

[5] 指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Arkady Natanovich Strugatsky, 1925—1991）和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Boris Natanovich Strugatsky, 1933—2012）兄弟，苏联科幻作家。两人从1957年开始联袂创作，凭借《路边野餐》一书享誉科幻文坛。

[6] 约翰·瓦利（John Varley, 1947— ），美国科幻作家。

[7] 与墨西哥人的信仰有关，他们认为昼夜交替实际上是善神和恶神在交战，而每天黎明到来则意味着善神永远能驱走黑暗，成为胜利的一方。这一信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有体现，如女诗人索尔·胡安娜的长诗《初梦》等。

伊雷内奥·卡瓦哈尔博士的家位于平民区一幢建于1950年代的楼房的四层，楼里住了许多小孩——从噪声的情况来判断，五楼大概是家托儿所——我和何塞·阿尔科都觉得《墨西哥城诗册》主编的居住环境既不安静又缺乏神秘感。博士与我们见面时穿了件到腿肚子那么长的雪茄色晨衣，当时天气炎热，穿这么长的衣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很瘦，面部棱角分明，上面长着不少对称的皱纹，看不出他具体有多大年纪，应该是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他的举止表明他属于受教育程度高又有忧郁气质的那种人。他的衣领透露出他是个慵懒又贫穷的人，可这与他住所中的摆设显示出的信息相反，这间屋子很干净，很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不喜欢盯着别人的眼睛看，在听我们说话时一直保持安静，目光仿佛钉在地面上，或者说看着某个椅子腿，在何塞·阿尔科解释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就开始咬嘴唇了，而且这个动作越来越频繁，似乎我们的到访突然之间给他带来了苦闷，乃至于是他最终开始说话时我以为他只是要告诉我们出口的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年轻人们，”他说道，“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这事感兴趣，在我看来这没什么特别的啊。”

“在墨西哥城竟然有超过六百种文学刊物，难道您连一点点好奇的感觉也没有吗？”

卡瓦哈尔博士仁慈地笑了笑。

“咱们也不必过分夸大那个数字。我尊敬的朋友乌瓦尔多太实诚了，他有些过分看重我给出的数字了。六百种文学杂志？这得看我们怎么去定义杂志和文学。那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杂志实际上只是些散页，先印出来，然后用订书机订起来，印刷数总共也不会超过二十册，有的印数可能更少。文学？对，对我而言那就是文学。不过……举个例子，对于奥克塔维奥·帕斯而言，那可是不叫文学。草纸，影子，生活记录，如电话簿一样神秘的语句。对于大学教授而言，那只能算是些尾迹云，是陌生人士失败的痕迹。对于警察而言，那些东西甚至连蛊惑人心的作用也起不到。这么说吧，不管由谁来看，那些东西都不会被记录到文学史里去。当然了，嘿嘿，官方出版的杂志另说。”

“不好意思，我依然觉得这是件非同一般的事情，或者换个词，是让人躁动的事情。堂乌瓦尔多对我们说，他认为去年墨西哥城的文学刊物数量不会超过二百种。”

我补充道：“他在《我的优雅花园》里确认说到年底时这一数字将会超过一千，都可以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这是有可能的，”卡瓦哈尔博士耸了耸肩，“但哪怕是这样，我依然不明白诸位为何对此感兴趣……是想验证一项纪录？想做一本奇怪文章选集？恐怕你们会失望了，那里面没有奇怪的文章，悲惨的和耀眼的文章倒是有几篇，但是没有奇怪的。”

“我们确实很感兴趣，就像是患了病一样。”

“什么病？”

何塞·阿尔科没有回答。我猜想我的朋友在想着飓风的事。卡瓦哈尔博士站了起来，脸上挂着谜一般的微笑，而后离开了客厅。等到他回来时，手里多了几本杂志。

“影印散页，滚筒油印机印的，还有些是纯手抄的，都是各种各样不成体系的诗歌讲堂搞的，还有几本关于现代音乐的杂志，有的是抄录歌词，还有部用诗体写成的关于夸乌特莫克^[1]之死的戏剧，这些文字里有很多拼写错误，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世界的中心……啊，也就是墨西哥……”

杂志被散乱地丢在隔开我们的座椅和房主木椅的小桌子上，每本杂志都很薄，瘦得像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一样。就像那些人一样，我是说，就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些囚徒

的样子，眼睛很大，眼窝深陷，而且那些照片也是黑白的。我想道：这些杂志也有眼睛，它们正盯着我们看。接着，我突然失去了冷静，说道：

“是的，它们看上去很可怜。”我立刻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我们患的是革新病。”何塞·阿尔科的语气和我的刚好相反，听上去异常坚毅，尽管我看得出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啊，你们太自大了！”博士喊道，“不过其中几本杂志的创办者听到这话也许是会感到高兴的。不过对我而言，你们患的只是忧郁病。我来给你们讲个类似的故事吧，也许会有点启发。这个故事出自恰帕斯州的神父萨维诺·古铁雷斯所著的《在非洲的十年》一书。古铁雷斯神父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杜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是二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咱们的这位神父只去过那里两次，第一次是拜访他的朋友法国传教士皮埃尔·勒克莱尔，第二次则是为了把花放在这位传教士的墓前。两次到访都很短暂。在两次行程之间，古铁雷斯走遍了刚果东南部，一直走到了姆韦鲁湖，不过他没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只是像个痴迷旅行的人一样激动地游逛，后来他又到安哥拉待了八个月，然后就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那些事，我觉得它们和文学杂志的现象有些联系，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讲述让你们看到那个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某些东西。在继续讲述之前我得提醒你们，古铁雷斯神父已经在非洲待了许多年了，尽管从未说明原因，他一直在四处走动，所以已经不会轻易为某事感到惊讶了。然而在金杜港附近的那个村子里，有些东西却唤醒了他的好奇心：当地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手工技能，他们做木匠活的能力是他前所未见的。又也许真正让他感到好奇的不是那些人的技术，而是他们的激情，或者说那种氛围。在书中某页，他用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了在勒克莱尔的陪伴下唯一一次在那个村子里漫步的经历。他是在罗马认识勒克莱尔的，从那之后他就感觉二人之间建立起了真正深厚的友谊，尽管两人的性格是那么不同（萨维诺·古铁雷斯很世俗，有教养，很引人瞩目，在加丹加省沉迷于修订自己对品达^[2]诗作的翻译；勒克莱尔则是个善良爱笑的人，对奢华生活和世俗虚荣毫不在意）。在一起漫步时，他们经过了许多茅屋或说草房，随你们怎么叫吧，古铁雷斯不断观察着，愈发感到惊讶，当地人的木工活竟然能做得如此之好，越走下去，他看到的木制艺术品就越多。在被问及此事时，勒克莱尔却没有表现得和他的朋友一样惊诧，当地人做木工活所用的许多工具还是他介绍过来的呢，他觉得让那些人做做手工活是件好事，还有益健康，他不明白古铁雷斯为何会感到诧异。后者没再问下去，不过到了晚上，也就是他在那里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他梦到了椅子、凳子、衣柜、抽屉柜、所有尺寸的桌子——大多是小桌子——脚凳、狗舍或玩具屋，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物件，不过大多可以被归为三类：上述类型的家具；玩具或欧洲先进物件的仿制品，例如火车、汽车、步枪等；还有些难以归类的东西或是艺术品，例如满是孔洞的熨板、带齿的圆盘和巨大的圆柱体。第二天，在离开前，勒克莱尔把让他神魂颠倒的众多木制品中的一件送给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用鲜嫩的软木雕成的，有十厘米高，整体是黑色的，带有黄色纹路。我们的这位旅人开心地接受了，那物件自然相当不错。其余的文字记录的就是两位神父之间的亲切言辞了，他们还约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见面。几个月后，身在罗安达的萨维诺·古铁雷斯收到了他这位朋友的来信，信中长长的附录部分又让古铁雷斯想起了那些村民做的木匠活。勒克莱尔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除了很少几个地方之外，整个村子都被占满了。农民们不种地了，牧民们也对他们的牲口失去了兴趣。勒克莱尔和另外两位行医的嬷嬷开始担心起来。不过情况还远谈不上严重，事实上法国人是用诙谐的语气讲述那件事的，甚至还说那些东西拿到利奥波德维尔^[3]去卖也卖不掉。从那时开始，每当给他的朋友写信时，萨维诺·古铁雷斯总会询问当地那些木匠的情况。这种局面持续了半年时间。后来勒克莱尔一封新的信件成了警示信号。对木匠活的狂热情绪在整个村子里弥漫，

而且似乎很具有传染性：在一些邻近的村子里也有许多男人、女人和小孩开始用全村唯一一把公用手锯锯木头了，他们还用两把公用锤子捶打木头，还动用了仅有的几颗钉子，他们锉、嵌、粘。工具匮乏就用想象力和当地的土办法来弥补。做成的物品被摆放在茅屋上或院子里，然后整个村子都疯狂起来了。勒克莱尔和年纪最大的几个村民聊过。他获得的唯一回答，或者说那群巫师给出的诊断结果，就是忧郁和兴奋的病毒占领了村子。他很惊讶，他不得不承认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忧郁和兴奋，这可能是弥漫在村子里的那种情绪的畸形反映。接下来的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内容十分简练，用萨维诺的话来说，那封信有德·维尼^[4]的简约文风，还有魏尔伦^[5]（嘿嘿，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批评能力和如今的评论家们相比也差不了多少）的绝望感和宗教性。我们可以假设对勒克莱尔而言，所有那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村子里的每条街道上散落着没人用也不会有人再用的木制农具。当地的木匠们和从其他地方来的木匠使团进行秘密会晤。几乎再也没人去做弥撒了。为了早做防范，神父命令两位嬷嬷先撤到金杜港去。在接下来几天紧张又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勒克莱尔专心雕刻着耶稣受难像，他甚至要求古铁雷斯把他上次送出的基督像扔掉，因为‘那些村民的狂热亵渎了神像’，他还许诺说‘会把手头正在做的基督像送他作为补偿’或是‘再送他尊安达卢西亚银制基督像’。他为村子当下的局面感到遗憾。他问村中的孩子们未来该何去何从。这么多年的传教成果让他难过。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所担心的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不过他确实提到了死亡，有白人移民被杀死，在一处锡矿出现了类似游行示威的情况，不过其他也就再没什么了。据说他所担心的就只有那一个村子而已，至于村子外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都缺乏真实性。他感觉自己应该对这一局面的出现负一定责任。我们不能忘记他才是最主要的木匠，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有群成年人在他的院子里放了个奇怪的木制浴盆，可他已经生不出恐惧的感觉了。离别很快到来。嬷嬷们走了，把信也带走了。只留下了勒克莱尔一人。几个月后古铁雷斯才得知他的死讯。他十分震惊，在罗安达做了几次徒劳无功的调查之后，我们的这位神父动用所有关系帮他回到刚果，回到他朋友的埋骨之处。最后他成功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比利时当局同意他的此次到访，因为在X村发生的事情被视作机密。在多番坚持后，古铁雷斯得知勒克莱尔之死并非意外。他的朋友是在一场黑人骚乱中被杀的。与此相关的官方解释十分含糊，也许是两个邻近部落之间的冲突，也许是巫师煽动导致出现了大量伤亡的情况。到达金杜港后，古铁雷斯过的完全是异教徒的生活。他最终获得了进入那个村子的许可，不过要在一个当地官员和一位医生的陪同下前往。到达那里后，他发现只有寥寥数座茅屋还屹立不倒，当地建了一家新的诊疗所，几个大活人藏在阴暗的门后观察他们，整个氛围都透着不祥。墓地被精心整修过，很多十字架是新立起来的。古铁雷斯经过询问得知之前的传教士都返回欧洲了。当然了，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全村疯狂做木匠活的那段日子，现在那里跟木匠活相关的东西连影子都看不到了。我们的这位神父感到非常愤怒，他决定独自到朋友的坟墓那里去。就在那时，他发现勒克莱尔要求他扔掉的那个基督像就放在衣服兜里。他取了出来，最后一次观察它。耶稣的样子很奇怪，庄严又强壮，甚至从某个角度看过去，还会觉得他在微笑。他把它扔进了草丛。然后立刻察觉到此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先是听到了声响，然后就看到一个老人从树后闪出，在他抛弃圣像的草丛里摸索了起来。古铁雷斯被吓呆了，站在原地没有动弹。找了一会儿后，老人站了起来，却没有向他走来，而是保持原来的距离对他说起了话。他说他叫马塔拉·穆卡迪，还说他要告诉古铁雷斯真相。勒克莱尔是被白人杀死的，还有三百个土著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果去看看那些还没有被焚烧的尸体的话，肯定还能在骨头里找到白人射出的子弹。可这是为什么呢？古铁雷斯问道。因为反抗，整个村子都造反了，矿工也造反了，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就像是个奇迹，白人以惯用的方式镇压了起义，女人死了，小孩死了，老人也死了，那些逃到法国传教士那里避难的人就在教堂里被杀了，然后白人把半个村子都烧掉了，还

封锁了整片区域，白人手里有枪，可当地人只有木制步枪和木制手枪。他们为什么要杀掉勒克莱尔呢？古铁雷斯问道。他希望老人回答说，因为他的朋友是那次木匠起义的领头人。然而老人斩钉截铁地说：是误杀，那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屠杀，当然了。黑人举起一只手来，手里抓着那个木头基督像。与巫术有关？古铁雷斯在那人转身离去前问道。没有，黑人说道，这神像也穿着村子里的衣服。我们的神父明白他说‘村子’这个词的时候指的要么是愤怒，要么是梦幻。两人没再交流，那次见面结束了。比起白人所说的版本来，古铁雷斯更相信那个黑人的话，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再待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了。两年后他离开了非洲，然后又永远离开了欧洲。他回到了恰帕斯州，在那里开始写回忆录和宗教主题的散文，直到去世。如果我们能够信得过他的编辑（另一位神父）的话，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地过着平静的日子。这就是我想说的故事……”

卡瓦哈尔博士陷入沉默，落日的最后几缕余晖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在他的脸上，使之就像被一层皮膜直接覆盖的头骨。不过他的头颅依然给人以某种强健的感觉。

“我试图告诉你们的是，”最后他补充道，“六百种文学杂志真的算不上什么大事。”

“要来的总是会来的，是这个意思吗？”何塞·阿尔科打断了他。

“没错，年轻人，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欣赏那些事情爆发，当然了，还得保持一定距离。”

“对我来说这些杂志所做的事情，”我翻着一本叫《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四页杂志说道，“也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是被烈火烤炙的艺术家们该做的事情，”卡瓦哈尔博士纠正我道，“是心怀不满的失业废物艺术家们做的事情，而不是知识分子。”

“对，”何塞·阿尔科说道，“是偷摩托的贼做的事情。”

卡瓦哈尔博士满意地笑了，在内心深处，他其实也是电影俱乐部里的那种新现实主义者。

“做这些事的人都是受害者，”他虽然在笑，但是声音听上去却很恐怖，“是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演员，而他们演的东西我是肯定不会去看的。或者也可能不是这样，那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集合，而且缺乏实际意义。美国人现在就喜欢搞那些电子的东西，我这里是有统计数据的，而伦敦的年轻人们则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竞争当歌星。当然了，那也没什么不好。咱们这边的情况可想而知，我们追寻的是毒品，是那些更廉价也更痛苦的业余爱好，例如诗歌，或者是读诗歌杂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里毕竟是坎丁弗拉斯^[6]和阿古斯丁·拉腊的故乡啊。”

我差点儿就要告诉他他刚才的表态是错误的：在那些年里，甚至到今时今日，诗歌对我而言都是拉丁美洲成就最大的文体。要是有人说巴列霍的坏话，不了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作，或是把维多夫罗和勒韦迪搞混的话，我肯定会先晕头转向，再怒火中烧的。如果说我们这些贫穷的国家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诗歌，它甚至可以算是我这个每周化身一次酒鬼的年轻人最大的骄傲了。但我当时什么都没说。相反，我想起了在扬保存的那些书中读到的一些东西，我立刻把它和我们当时的谈话内容联系到了一起。

“我不认为那些‘电子的东西’是美国人的毒品，尽管我不是很确定你指的是玩电子游戏还是拍电影。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那里的人现在还有一种新的乐趣：军事游戏。玩的方式有许多种，但基本而言是两种。一种是兵棋（现在也有电脑上可以玩的版本了），有一张由六角格构成的棋盘，还有些被称作算子的带标记的卡牌。另一种是实战模拟游戏，或者叫周末实战游戏，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打闹游戏，只不过现在美国人付钱玩

了，把它做成了生意。第一种，也就是用六角格棋盘当战场的那种，玩家可以扮演指挥官或战略家（也可以叫战术家），例如《步兵班长》^[7]系列，每个算子（有超过一千张算子）可以代表大约十个兵士。一般来说这种游戏可以玩上超过五个小时，甚至可以连玩二十或三十小时。我认为这种游戏来源于德国的克里斯皮尔棋，在上个世纪，真正的战争爆发前人们都习惯先用这种兵棋进行推演，不过它也可能是从国际象棋演变过来的，国际象棋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兵棋。在另一种玩法里，玩家会像演话剧一样扮演兵士的角色。那种军事游戏会持续一整天或是一个周末。玩家会被训练使用各种武器，听越战老兵演讲，参加模拟战役，甚至有的组织还会给会员提供跳伞服务。在这两种玩法里，模拟的战争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它们不是发生在虚拟地点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场景，背景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预言式的未来或想象中的未来。越南、伊朗、利比亚、古巴、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甚至墨西哥，这些都是模拟战争最常用的地点。还有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有很多战斗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他们的假想敌是黑人或墨西哥裔移民组成的游击队。桌游里的战争大多是“二战”时的战役，不过也有些在不久之后的未来发生的战争，从在地中海进行无差别射杀的第六舰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你甚至可以用上原子弹。不过大部分还是“二战”中的战役，而且游戏中出现的人物和机构总是与纳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个例子，在广告宣传中他们会说如果未来的玩家玩得好而且运气不错的话，巴巴罗萨行动^[8]就可以以胜利告终，隆美尔的坦克军可以到达开罗，阿登战役也可以迎来光荣的停战协定。这两种消遣方式，桌游和周末实战，都拥有不止一本与之相关的杂志，还有一条只可能在美国存在的地下产业链。对了，推出兵棋游戏的公司也已经做出了电脑游戏。我认为这项产业会蓬勃发展下去。”

“可是玩这些游戏的都是什么人呢？”卡瓦哈尔博士说道。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我本来以为玩实战游戏的只会是些受挫的杀人犯和三K党人，但实际上很多工人、家庭主妇、雅皮士和讨厌慢跑的人都爱玩。兵棋吸引的则更多是懒惰的法西斯主义者、军事历史爱好者、内向青年，以及（甚至是）前职业国际象棋选手，据说鲍比·费舍尔^[9]从两年多以前就一直在玩葛底斯堡战役。不过他不和别人玩，就只和自己玩。”

卡瓦哈尔博士露出了天使般冷峻的笑容，点了点头。

“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他嘟囔道，“我总觉得那些细密画画家是魔鬼的仆人。我这辈子一直相信魔鬼在露面之前肯定都在以微小的形态操练着。事实上，和那些恋物癖美国人喜欢的东西相比，我们的这些杂志就和它们表面看上去差不多：只是些受伤的昆虫罢了。”

“但却是活的。”何塞·阿尔科强调道，然后他又低声问了我一句，“你是从哪儿看到那些的？”

我告诉他我是在扬搜集的那些书中看到的。

“据他所言，与《命运士兵》杂志的那伙人相比，约翰·伯奇协会就是收留慈祥老人的养老院，那群人不仅是贪婪的商人，还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表演艺术或即兴表演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同样的话也可以送给那些做兵棋游戏的厂家。例如阿瓦隆山公司就曾推出过一本杂志，改天你应该翻翻看，杂志名叫《将军》，那是本关于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其他德军元帅的口袋版百科全书。”

“扬跟我提到过一次古德里安。”

卡瓦哈尔博士茫然地望着我们。

“扬是我们的朋友，”我解释道，“他说……必须要阻击古德里安的坦克军很多次，我觉得做那事可能得用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尽管我也不知道这跟我们在谈论的话题有什么联系。”

“血腥的抒情诗。”博士嘟囔了一句，然后做了个手势，似乎是想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聊任何我们想聊的东西，他并不介意。

何塞·阿尔科一向喜欢跟他对着干，这次却没开口。我则说了几句蠢话，那些话都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们的这位东道主又讲了些关于医生诗人和公务员诗人们的事情，他似乎觉得那些人都很有名，可是我俩从未听说过。太可悲了，一个让人清醒或害怕的念头一闪而过，有朝一日我也会讲述关于蠢货诗人们的故事，听我讲故事的人们也会问自己那些不幸的人到底是谁。最后，我朋友固执的沉默开始让我有些生气了，于是我提出想借阅几本杂志，不超过十本，卡瓦哈尔博士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你们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吗？”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撒了谎：当然想。“那么就试着只在无可避免时夸夸其谈吧。”我们两个都笑了。何塞·阿尔科开始挑书了。

我们离开那里走上街后，我的朋友说道：

“可怜的笨蛋，他什么都不明白。”

夜空清亮，在那片区域抬头看月亮，会发现月亮不像是月亮，而更像是块铺在天空等风吹干的床单。和往常一样，摩托车又坏了，我们只得轮流推着它前行，每走两个街区换一次人。

“请给我解释一下吧，因为我也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我真想杀人。”

又过了好一阵子，他补充道：

“我想在胳膊上搞个文身。”

此时是我在推摩托。

“什么样的文身？”

“镰刀锤子。”他说那话时表现得满不在乎，又像是在说梦话。我想这么做是正确的，这样的夜晚就适合做梦，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笑了。

“算了吧，伙计，不如文一个‘我将永远被记住’。怎么样？”

“妈的，太奇怪了吧。从那个无能之辈家里出来后我觉得很压抑，但又觉得很幸福。”

我对他说我能理解他的心情，然后我们再没说话，直到该轮到他推摩托的时候。

“要不然就文面墨西哥国旗，再配上镰刀锤子。”他说道。

我点了根烟。不用推着摩托走路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们走进了一个遍布窄街的社区，这里树木稀疏，房子最高也不超过三层。

“我真想赶紧离开这里，”何塞·阿尔科说道，“骑上我的摩托，带着我的墨西哥国旗。”

“给我说说卡瓦哈尔博士哪里惹你厌了。”

“他那像骷髅一样的脸，”他怀着某种盲目的信仰逐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他自己就活像是亡灵节骷髅，还去给可怜的青年诗人们把脉。”

“没错，”我说道，“你这么一说……”

“他就是亡灵节骷髅，臭狗屎，边跳舞边给这个国家把脉。”

我突然感到何塞·阿尔科的话中隐藏着某些千真万确的东西。我尝试着回忆卡瓦哈尔博士的面庞、他的会客室、里面摆放的东西、他和我们打招呼以及起身找杂志的方式、他那在我们交谈时似乎在调查别的什么东西或什么地点的眼神。

“我是在你讲美国人玩的那些游戏时发觉的。而他没有发觉我已经发觉了。”

“发觉什么啊？”

“他看我们的眼神，看你的眼神，就好像你讲的所有那些事情对他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没错，那个混蛋什么都知道……”

我们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天空此时已面貌大变，墨西哥城的某片区域正在下雨，从雷声和闪电来判断，要不了多久雨水就会落在我俩头顶了。我的朋友笑了，他坐在摩托车座位上，似乎是在等待着大雨降临。

“只是想想一想我都会感觉害怕。”我对他说道。

“也没那么夸张。好像就要下雨了。”

“他长了张骷髅一样的脸，你说得没错。”我说道。

“好吧，后来我又觉得他并非什么都知道，只不过是是因为他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罢了。”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

“这种人到处都是。他们管自己叫墨西哥革命之子。表面看他们很有趣，可实际上他们都只是臭婊子之子，而非革命之子。”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我边说边望着深沉的天空，深沉，极黑，“咱们要被淋成落汤鸡了。”

“我不讨厌他们，恰恰相反，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忍受孤独的，”何塞·阿尔科摊开手，把手向上举起，“以一种非常，非常扭曲的方式，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成为这个国家的无名父辈。我已经感觉到一滴雨了。”他把手掌凑到鼻子跟前，嗅了嗅，就好像雨水有不只一种味道似的（的确如此）。

“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呢……这辆臭狗屎摩托，咱俩肯定要被淋透了……”

“我不能。”

“你不能什么……？”雨滴已经开始猛烈敲击一辆停在我们跟前的五十年代老款福特车的车顶了，在那之前我俩都没有留意到那辆车的存在，那是这条空荡的街道上停着的唯一一辆汽车。

“我不能忍受那种孤独，太静谧了，一切都太井然有序了，连生命的终点都已经完全被安排好了，请原谅我这么说。”

“妈的……”

何塞·阿尔科的脸上露出了舒心又耀眼的笑容。

“咱们走吧，我有位朋友的车库就在附近。咱们去看看他能不能修好这辆摩托，再让他请咱们喝杯咖啡。”

[1] 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约1495—1525），阿兹特克末代首领，曾领导阿兹特克人对抗西班牙人，战败后被绞

死。

[2] 品达（Pindaro，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诗作以风格庄重、辞藻华丽、形式完美著称。

[3] 利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前称。

[4] 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浪漫派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5] 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6] 坎丁弗拉斯（Cantinflas，1911—1993），在世界影坛上享有盛誉的墨西哥喜剧演员，标志性角色是一位用智慧和好运迎战贫民窟生活的受压迫者。

[7] 《步兵班长》（Squad Leader），1977年由阿瓦隆山公司推出的回合制兵棋，模拟“二战”欧洲战场的步兵作战。

[8] 巴巴罗萨行动（Operación Barbarroja），德国在“二战”中入侵苏联行动的代号，名称取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巴巴罗萨行动开启了长达四年的苏德战争。

[9] 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1943—2008），美国著名国际象棋棋手。

亲爱的小詹姆斯·蒂普垂：

雨水可以教会我们一些东西。现在是晚上，外面在下雨，城市正像一个闪亮的陀螺一样旋转着，不过有些区域更加昏暗、更加空荡，它们就像是间歇出现的斑点。城市在暴雨中欢快地旋转，斑点时隐时现，从我这里望去它们就像是病人的太阳穴一样不断鼓大，或者像是漆黑的肺，哪怕大雨淋过也无法恢复光泽。有时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交织到了一起：雨水，闪电，一个昏暗的圆圈努力触碰到了另一个昏暗的圆圈。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它们突然急剧收缩，不过依然闪动着。也许对它们而言，只是互相触碰就已经足够了，也许不管信息是怎样的，都已经被成功传递出去了。就这样，几个小时或是几分钟，只要雨还在下，就会一直是这幅场景。我觉得今晚是个快乐的夜晚。我阅读，我写作，我学习，我吃了饼干还喝了茶。然后我还到平台上活动了腿脚，所谓平台，其实就是我们住的阁楼顶上，我上去的时候自然打了伞，我还带了望远镜，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我就是那时候想起您的——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想起您的原因是什么了——也想起了我在许多天以前给您寄去的那封信（且不谈您收没收到的事，我当时把信寄到了斯皮德曼兄弟的公司）。好吧，关于那第一封信，我只想对您说，我称呼您作“爱丽丝·谢尔登”，我真心希望您不要因此感觉被冒犯，或是被激怒。我发誓我不是故意辜负您的信任的。那只不过是我和您现在的许多读者不同，我很久之前就读过您写的东西了，当时所有人都说小詹姆斯·蒂普垂只是个很晚才开始搞创作的退休老头。不过我在那时就很喜欢读您写的东西了。当然了，后来在我得知那实际上只是心理学家爱丽丝·谢尔登的笔名后——在许多情况下，那不仅是个笔名，还是您的代名词——我自然十分惊讶。您看，就只是因为欺骗性的信息太多了。我觉得爱丽丝·谢尔登这个名字更美，也更让人觉得温暖。就是这样。

（有时我会想象那位退休的蒂普垂先生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座小房子里写作的场景。为什么是亚利桑那州？我也不知道。我可能在哪里读到过相关的东西吧。也许弗雷德里克·布朗^[1]曾经到亚利桑那州住过几年，当然他当时差不多也是退休状态，退休这个词具有的流放性和平衡感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话说回来，和退休的美国人保持往来难道不比与科幻作家保持联系更好吗？您能说服他们给白宫写信，停止推行对拉丁美洲的侵略政策吗？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可能性，不过我们自然要冷静处理此事。）雨下个不停。我刚才在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其他楼房黑暗的屋顶平台时，脑子里忽然涌出一个问题：巴拉圭人写过多部科幻文学作品呢？乍一看这是个很蠢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和它出现的时机配合得天衣无缝，所以尽管它很蠢，我还是要坚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像那些大家都在唱的流行歌曲一样。墨西哥城那一扇扇关闭的窗户就是巴拉圭吗？我用望远镜望见的屋顶平台和暴风雨就是巴拉圭的科幻文学吗？（在方圆一千米的范围内，有灯光从窗户透出的住家很少，大概只有十到十五户左右，而且都分布在起义者大道南段附近，然而我没有望见任何一个屋顶平台上有灯光。）我那时觉得这个问题太可怕了。现在我觉得没那么可怕了。但现在我是坐在家里的，没有站在外面淋雨。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随信给您寄去一张墨西哥城的明信片。那张照片是从拉美塔上拍的，可以看到全城的景色。照片是在白天拍的，大概下午两点左右吧，不过那张照片或说那张明信片有个缺点：画面有点模糊。那种模糊感，再加上阴暗的色彩，就是我今晚的感觉了。我会再给您写信的。

您的朋友，
扬·史瑞拉

^[1] 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ric Brown，1906—1972），美国科幻作家。

修理摩托的车库是间六米长三米宽的屋子。屋子的尽头是扇半开的门，通向堆积了许多垃圾的内庭花园。两年前，也就是年满十七岁时，别名莫弗莱斯的马加利托·帕切科离开了他母亲位于两个街区之外的佩拉维略区的住所，搬到了这里。他靠维修摩托车维生，偶尔也修修汽车，不过他修理汽车的技术可实在是难以恭维。他自己也对此心知肚明，甚至毫不避讳地承认那种能力欠缺。何塞·阿尔科和我推着那辆本田摩托车来到他的修理铺时，他已经一年没修过汽车了。他最擅长修理摩托，尽管找上门的生意并不多。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喜好，他就把家安在了充当修理铺的车库里，不过，如果来客观察不细的话是不会发现这个细节的。这里仅有的可见的生活气息就是安放在一堆轮胎后面的行军床和一个书架，书架周围到处都是油渍斑斑的旧日历，有的配图是汽车，有的则是裸体女人。厕所在院子里。要洗澡的话，还得到他母亲家里去。

第一眼看上去他好像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但实际并非如此。他的整排上牙全都没了，也许这就是他最初选择离群索居的原因，他回答问题时谦逊有礼，在我们哈哈大笑时则会露出神秘的微笑。这种状况通常会持续到陌生人——这次我就是那个陌生人——真的说了什么好笑的趣事为止。只有那时他才会真的开怀大笑起来，或者开始以极快的语速说话，而且还用了一种夹杂着许多行话和自创术语的西班牙语。他的眼睛很大，有点过大了，不过随着了解的深入，你会发现他那病态的瘦削体型透着股奇异的美感，非对称的美感，那种美还会让人感到平静。那排上牙是十五岁的他在一次打架时失去的。至于修理摩托的技术则是在这个车库里学到的，他先是看，后来给一位蒂华纳来的修理师打下手，根据莫弗莱斯的描述，这位修理师堪称卡斯塔内达的唐璜。两年前，修理师死后，他的遗孀对铺子毫无兴趣，不到一个礼拜就收拾行囊回老家去了。莫弗莱斯有这里的钥匙，于是就留了下来，等待着某人找上门来宣称自己是此处的业主，或者至少来问他索要租金。刚开始他是睡在地上的，后来才把行军床和一些衣物运了过来。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除了寥寥几个客人之外，上门的就只有一个想把偷来的摩托车寄存到这里的家伙。他的修理铺就是这样开起来的。

我那次见到他时，他的铺子里就只摆着两辆摩托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另一辆就是阿兹特克公主，也就是何塞·阿尔科曾建议我买下的那辆贝纳利摩托。我对他说我很喜欢那辆车。莫弗莱斯说那是辆好车，至今还没卖出去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几天之后我才明白他当时真正想说的是，我也才明白那辆摩托甘愿挤在油渍和脏木板之间是在等待它真正的归宿，它在等待着我把它带走，或是在等待着我把它抛弃。在处理偷来的摩托车方面，莫弗莱斯只跟两种人打交道，偷车的人和把它带走的人。他一贯如此。而且似乎还有干这种事的固定时间。月初的时候会有人送来摩托，月中的时候就会有人来付钱，摩托也就被带走了。在这两年时光里，阿兹特克公主是唯一一辆打破这种规律的摩托。半个月过去了，买家还没出现，一个月又过去了，结果还是一样，这辆摩托眼看就要变成孤儿了，又或者会被拆解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成为其他摩托的一部分。

我当天晚上就把它买了下来。

可以这么说，交易就只是在字面意义上完成了。我没钱，不过莫弗莱斯也没有买家。我答应赚到钱后先给他一些，剩下的分两个月付完。他的建议要更加合适：我只要在能给他钱的时候给他就行，每次给多少都无所谓，他把摩托卖给我的价格和他买入时的价格一样，唯一的条件就是当天晚上就要把它骑走。在何塞·阿尔科略带笑意的目光中，我同意了。我没有驾驶证，好吧，我甚至连怎么骑摩托都不会，但是我对自己的运气抱有盲目的信心，而且我也相信自己在这件事上隐约感受到的某种预兆。如果你有电话的话就完美了，我对他说道。

“电话？你在说什么鬼话啊，这里能有电灯用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没问他指的是这片社区还是他的修理铺。何塞·阿尔科烧开了水，冲了三杯雀巢速溶咖啡。莫弗莱斯从挂在墙上的塑料袋里取出了点冷甜玉米饼，把它们放在金属煎锅上加热了一下。尽管外观看上去不怎么样，可是那些玉米饼尝起来味道还真是不错。在加热玉米饼时，他让我那几天抽空来帮他给摩托上漆。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我说道。

“偷来的摩托都得重新上漆。这是惯例。”

“这些玉米饼可真好吃的啊，”何塞·阿尔科说道，“是你妈妈做的吗，大师？”

莫弗莱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然后说出了似乎是全世界最让他惊讶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犯了什么毛病，竟然忘了把标志取掉。我还是刚刚才留意到的。”

“什么标志？”

“‘阿兹特克公主’这几个字。它们就像是一直在引吭高歌一样。”

“那块标志做得很好，字母都是金属的。”

“天知道我为什么还没把它们取掉。”

“我想保留下来，”我说道，“我是不会把它们取掉的。”

屋外的雨还未停歇。有时狂风大作，这间车库就像是要被连根拔起一样，车库的几扇门吱嘎作响，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快速狂吼之后发出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拿棍子敲击杀人一样，何塞·阿尔科嘟囔道。我们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暴雨和纷杂的思绪像是让我们丢了魂儿，似乎修理铺并不存在，我们也从未有过交谈。院子里的风吹得厉害，反复拖拉着空罐子和纸页。

每阵噪声过后莫弗莱斯都要望向屋顶。有时他还会从一扇门走向另一扇，手里端着速溶咖啡，他也试过阅读，或者试过假装阅读墙上贴着的一层摞一层的宣传海报。不过他看上去并不紧张，而是恰恰相反。不过你当然可以认为这种冷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只是表面的冷静，那是种孤傲感，尽管不是冰冷的或无知的孤傲，却是刚刚摆脱酷刑折磨的基督徒表现出的那种孤傲，是被拳打脚踢后仍保留着的孤傲，是酒足饭饱后无所顾忌的孤傲。

“世界真美啊，不是吗？”莫弗莱斯说道。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早晨五点了。我的两位朋友给我解释了好一阵子骑摩托车的理论知识。他们说其中的要诀就是不要害怕汽车，要会加速、刹车和控制离合器。怎么变速呢？那也很重要。要试着保持平衡。要试着时不时地瞅一眼信号灯。别怕下雨。

我走到院子里感受了下天气状况。雨已经没那么大了。我问何塞·阿尔科如果我们上街后雨又下大了怎么办。他没回答我。莫弗莱斯调试好那辆本田摩托后问我们想不想听他念几首他写的诗。（在问这句话时莫弗莱斯表现得就像个见到教皇的乡村神父：他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绝不会为自己的文字辩护。）他那晚念了五首或六首诗，其中有一首我很喜欢，那首诗讲的是他的女朋友鲁比塔和他的妈妈一起从远处观察某栋大楼的建设过程。剩下的诗流行味儿太浓了，像是歌词或叙事歌谣。何塞·阿尔科很喜欢那些诗，但我不喜欢。等咱们离开修理铺后，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我要给你讲讲莫弗莱斯编出来的最棒的故事。

“什么故事？”

“童年的乔治·佩雷克^[1]阻止了伊西多尔·伊苏^[2]和阿尔塔戈^[3]将要在巴黎一片荒凉的区

域进行生死决斗的故事。”

“我还是想自己读一读。”

“他没把故事写下来，是口述的。”

莫弗莱斯红着脸笑了笑，拿块布擦了擦手，然后又开始烧水了，他要最后再给我们冲一杯速溶咖啡。

我突然发现我有些害怕，有些恐惧，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上千种事情糟糕收场的可能性，我仿佛先是看到自己出现在警察局里，然后又到了医院，浑身的骨头都断了。我们喝着咖啡。我静静聆听最后的骑车指导。上街后，我发现街上一片漆黑，什么人都没有。何塞·阿尔科一言不发地骑上了我的摩托，把它发动了起来。排气管的咆哮声吓得我浑身发抖。然后他又骑上了他自己的摩托，我们沿着街道向街区尽头驶去，来测试摩托车的状况，我们绕了个圈，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最后我们回到了莫弗莱斯等待我们的地方。

“你把它修得就像新的一样。”何塞·阿尔科说道。

我什么也没说，全神贯注地小心注意着不让摩托车熄火。小心点，早日再来看我，莫弗莱斯说道。当然，当然，何塞·阿尔科说道。你觉得怎么样，雷莫？我快吓死了，我说道。奇怪的是，我听着我们的说话声很遥远，就连摩托车发出的噪声听上去也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相反，沉睡的街道上发出的其他声响却似乎近在耳边：猫咪的叫声，清晨最早的鸟叫声，管道中流淌的水声，某个遥远房间的开关声，邻近住房中一个男人的鼾声。

“没事，这很正常。咱们慢慢来，记得别隔太远，让两辆车离得近一点。”

“没问题。”我说道。

“那么回头见啦，莫弗莱斯。”

“再见。”

我们开始驶离那片街区了，就像是骑自行车一样。何塞·阿尔科时不时地就会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们很快就驶出了莫弗莱斯住的那片街区的空荡街道，拐上了一条大路。

“你别离我太远。”何塞·阿尔科说道。

两辆摩托猛地驶入大道。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身体里踢了一脚。我的手心全是汗，我真怕自己会松开车把。我不止一次想过停车，但是我确信只要我踩了刹车，我就会把阿兹特克公主丢在路边，然后坐地铁回家，就是这种想法阻止了我做出刹车的动作。最开始我只能看到柏油马路，它似乎没有尽头，背景是突然被打破的寂静，我还能看到骑在本田摩托上的我的那位朋友的模糊轮廓，他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又故意落到我后面。后来，就像是冷清道路上的幕布被缓缓拉开，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它非常遥远，似乎是在眨眼，又像是在细雨中检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灰色调。那是什么鬼东西？我在脑海中喊叫道。死神之龟？巨型蜣螂？我盘算着那玩意儿得有一座小山那么大，而且正直直地向我们移动过来。它像是靠伪足行动，又像是坐在气垫上逼来。从我的位置上看，它的移动路线是固定的，没有太大变化。我不需要问何塞·阿尔科我们在往哪儿去。

“瓜达卢佩大教堂！”他用食指指着那只哥斯拉说道。

“瓜达卢佩大教堂，瓜达卢佩大教堂！”我开心地喊道。

直到那时我才留意到我们的旁边已经有汽车在行驶了，被雾气遮挡、半隐藏在街角处的信号灯时亮时灭，在人行道上走着的几团黑影正抽着烟，还有些开着车灯的汽车就像漂

浮的船只，要把工人载到各自的工作地点去。马路中央有个喝醉酒或是吸了毒的人喊着他想死，然后就跪了下去，冷漠地看着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从一家刚刚开门的咖啡馆里传出了民谣的旋律。

我们把车停在了大教堂前的平地上，想活动一下腿脚，再总结下我最初几分钟的摩托车手经历。我对何塞·阿尔科说，刚才我把大教堂看成怪兽了，或者也可能是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在向我们冲过来。最好是说冲向市中心，不是吗？可能吧，我说道，不管怎样你和我都会受到冲击。还好你没出什么事，阿兹特克公主怎么样？它真的是辆好车吗？

不知是何原因，我感觉云层中间多了个空洞，空气就从那里渗下来，飘到我们身边。我点了根烟，对他说那是辆好车。

“结果不是原子弹，”何塞·阿尔科瞅了瞅我的摩托，嘟囔道，“而是瓜达卢佩圣母的城堡，她最伟大，是所有生灵的母亲。”

“没错，”我观察着刚刚现出的清晨景色说道，“是她保佑我没出交通事故的。”

“不对，伙计，是我和莫弗莱斯的功劳，我们是传授驾驶技术的能人。”

我把手伸进口袋搜索着硬币。

“等我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行。”

我在附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给劳拉打去。等了好一阵子之后，她妈妈接起了听筒。我因为当时时间太早而请求她的原谅，然后问她是否能让劳拉接电话。我猜你是有急事找她吧。我也不确定算不算急事，我开始装傻了。我不困，但是我当时特别想躺到我的床垫上去。街道已经亮了起来，我旁边站着两位出租车司机，他们正在谈论足球，一个喜欢美洲队，另一个则喜欢瓜达卢佩队。劳拉接起电话后我又一次道了歉，就好像现在跟我通话的又变成她的妈妈了一样，然后我对她说我爱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我爱上你了。”

劳拉说道：“你能给我打电话可真是太好了。”

“我就只是想告诉你这个，我爱你。”

“太好了，”劳拉说道，“太好了。”

我挂了电话，回到了我们停放摩托车的地方。

“怎么着？咱们走？”

“对，”我说道，“咱们走。”

“你觉得你能把车骑回家吗？”

“没问题，我能。”

“反正我还是要陪你一起的。”

“没这个必要。你肯定已经累了。”

“我累了？没有，伙计，而且我还没给你讲伊西多尔·伊苏和阿尔塔戈的故事呢。”

“那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啊？”

“就是莫弗莱斯编的那个故事嘛，你可别犯困啊，伙计。”

我们不紧不慢地向市中心骑去。清凉的空气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起来。骑着摩托车观察

街道和窗户逐渐苏醒，这是种很奇妙的体验。值夜班的人正开车准备回家或是去其他什么地方，而上白班的人则开着车往单位去，当然也有人叫了出租车或是等待着公交车的到来。这些都是城市里的几何图形景色，甚至连颜色也是如此，这种景色有转瞬即逝的一面，精致又有活力，如果你睁大眼睛，唤醒身体里隐藏的那股疯劲儿的话，你还能感受到像“飞飞鼠”^[4]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或者压根儿毫无缘由地在墨西哥城宽阔的大街上滑行一样飞速显现又消失的种种信号中隐藏的悲伤。不过那并非忧郁的悲伤，而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悲伤，一种悖论式的悲伤，它为生活而呐喊，为光芒四射的生活而呐喊，无论那种生活隐藏在何处。

“那故事很有意思，”何塞·阿尔科喊道，“我是不会无礼地问你知不知道伊西多尔·伊苏和阿尔塔戈是谁的。”

“你还是对我无礼点吧，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谁。”

“真的吗？拉丁美洲的年轻知识分子真操蛋啊！”何塞·阿尔科笑道。

“好吧，伊苏是法国人，”我喊道，“我想他可能创造了某种视觉诗。”

“真冷啊，真冷啊。”

然后他说了些我听不懂的东西——可能是罗马尼亚语——再然后我们从一辆运鸡的卡车前穿过，接着又是一辆运鸡的卡车，再一辆，又一辆，是护卫队。鸡从笼子里探出头来，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像大活人一样咯咯哒哒地议论着。我的鸡妈妈在哪儿？鸡们好像是在说着类似的话。我的蛋丢在哪儿了？我的天啊，我想道，我可不想撞车。拉萨鲁德家禽农场。何塞·阿尔科的本田摩托离我只有几厘米远。

“伊苏是字母派诗歌之父，阿尔塔戈是元诗歌之父！”

“啊，太棒了！”

“他们仇视对方！”

我们在红灯前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莫弗莱斯是在什么鬼地方读到那些东西的。他连高中一年级都没上完。”信号灯变绿了。

“你是在哪儿读到的？”阿兹特克公主启动更慢，而且刚启动时会抖动几下。

“我可是会去法语书店的！那些傻瓜们排大长队去听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时，我就花上几个钟头在那里看书。实话告诉你，我可以称得上是上个世纪的骑士！”

“你在那儿从来没遇到过莫弗莱斯？”

“从来没有！”

一辆车速上百码的野马轿车疾驰而过，打断了何塞·阿尔科的话。通过他的讲述，我慢慢了解到莫弗莱斯只去地下室书店，而且去的次数很少。伊苏、阿尔塔戈和乔治·佩雷克的故事非常简单。“二战”结束后不久，巴黎还在实行配给制，伊苏和阿尔塔戈在某家传奇咖啡厅相遇了。我们假设伊苏坐在最右端的露天座位，而阿尔塔戈则坐在最左端。尽管如此，两人还是觉察到了对方的存在。中间的座位上坐的是些美国游客、有名的画家、萨特、加缪、西蒙娜·德·波伏瓦、电影演员和约翰尼·哈里戴^[5]。

“怎么还有约翰尼·哈里戴？”

“你瞧，这就是莫弗莱斯的混蛋风格。”

那些人的在场使得我们的那两位诗人相形见绌了。事实上只有他们两人发觉了彼此的存在，因为他们一个是元诗歌之父，另一个则是字母派诗歌之父，这两派人之间的敌意要比维罗纳的开普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仇怨还要大。

“莫弗莱斯说他们两人都既年轻又野心勃勃！而且还爱慕虚荣！”

“这操蛋的莫弗莱斯！”

因此在满怀心事地喝完茴香酒、吃完三明治（他们两人那晚都只吃了这个）后，两人同时要求结账，可是一个用的是元语言，另一个则用上了字母派俗语，来自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流派，然而接下来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拒绝付钱了。他们想要的效果是：首先，引起坐在中间位置的人们的注意；其次，要服务生满腹狐疑地来询问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出现了咒骂声。服务生们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只得低声咒骂他们。伊苏在咒骂服务生们愚昧无知的同时也在羞辱阿尔塔戈。坐在另一端的阿尔塔戈一边大声对服务生们的知识匮乏表示同情，一边又攥紧拳头向伊苏示威。

“真是俩混蛋啊！”

“哈哈哈。”

“嘿嘿嘿。”

“在莫弗莱斯看来，他们可都是英雄！”

咖啡厅领班加斯顿曾是“二战”时期法国游击队中最凶猛的战士之一，他的出现给那场对抗画上了句号。加斯顿是个狠角色，没人敢轻视他。尽管不情不愿，两位诗人还是付了钱，更让他们难堪的是在坐在中间位置的大人物们面前出尽了洋相。伊苏和阿尔塔戈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咖啡厅。走到街上后，两个男人突然决定要决斗一场，生死相搏。（尽管两人的悲伤是共通的，可仍然认为对方是巴黎城里多余的人。）他们约定次日黎明时分在靠近埃菲尔铁塔的巴黎学生公寓一决生死。乔治·佩雷克就是那时出场的。

“你知道乔治·佩雷克是谁吧？”

“当然，但是我没读过他写的东西。”

“他是最棒的作家之一。”何塞·阿尔科严肃地说道。我们的摩托以二十千米的时速沿着人行道边缘前进。

“咱们就像是两个下了夜班回家的工人。”我说道。

“差不多吧。”何塞·阿尔科说道。

根据莫弗莱斯的描述，佩雷克当时还是个和公鸡起得一样早的小男孩。他一大早就从外公家偷偷溜了出来，取出自行车，迅速骑着它上了街，丝毫不顾及当时的气温有多么低。那天早晨他刚好就在巴黎学生公寓附近骑车。到那儿后他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阿尔塔戈，当时此君正坐在一条长凳上背诵着某首诗来给自己打气。小佩雷克把车停在他身边，听他背诗。在佩雷克听来，那首诗的发音是这样的：Sunx itogmire ésinorsinx ibagtour onéor galire a ékateralosné^[6]。如果你和我还有莫弗莱斯十年前能亲耳听到玛丽·波平斯^[7]演唱那些“超级无敌莫名其妙晦涩难懂恍若天书之词”的话，咱们应该就能体会到小佩雷克当时的心情了。还是根据莫弗莱斯的讲述，小佩雷克尽管年纪不大，但却喜欢卖弄学问，时刻都想着让自己表现得很有教养，于是他开始热情地鼓掌，这自然引起了阿尔塔戈的注意，他望向小佩雷克，问道：Veriaka e tomé？

“啊呀，啊呀，啊呀，莫弗莱斯可真能扯。”

Tumissé Arimx，小男孩答道。阿尔塔戈赴死的决心烟消云散了。他觉得这个小男孩就是个信号，是个神迹，是神灵在指点他，让他明白自己应该继续乘风破浪地进行创作。于是他站了起来，整理了衣服，毕恭毕敬地向小男孩弯腰致意，然后回宿舍睡觉去了。不久之后小男孩又遇到了伊西多尔·伊苏，后来发生的事情和刚才讲过的差不多。很可能伊苏甚至都没有和小佩雷克交谈，只是看到他在巴黎学生公寓骑着自行车唱着“Echoum Mortine Flas Flas Echoum Mortine Zam Zam”，这就够了。许多年后，在写实验戏剧《我记得》^[8]时，佩雷克不知为何没有把这段故事写进去。

“佩雷克的作品没有被译成西班牙语，而莫弗莱斯也看不懂法语。这个谜一样的故事就留给你在吃早餐时慢慢回味吧。”

暗黄色的光芒铺满整个墨西哥城。我们到了。我不想吃早餐，如果可能的话，跟劳拉一起睡倒是可以。我对何塞·阿尔科说最近几天我见了不少更糟糕的事情。

“莫弗莱斯的世界里全都是那种故事。我时常会问自己他会不会就是其中某份影印杂志的主编。”

“咱们回头可以问问他。”我对他说道。

我把摩托停在了底层的楼梯间里，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希望有人把它偷走的隐秘愿望，我一步两阶地上了楼梯。

[1] 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1982），法国当代先锋小说家，其作品以任意交叉错结的情节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见长。

[2] 伊西多尔·伊苏（Isidore Isou，1925—2007），罗马尼亚裔法国艺术家，1940年发起了融合超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达达派前卫发音方法的字母主义运动。

[3] 法国作家安德烈·韦尼耶（André Vernier，1915—1992）的笔名。

[4] 墨西哥动画片中的人物，又名“飞毛腿冈萨雷斯”，是一只速度极快，并且常用夸张的墨西哥口音说话的老鼠。

[5] 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1943—2017），法国摇滚歌手、演员。

[6] 此处与下文未译之处，均为阿尔塔戈和小佩雷克等人所说的难以理解的呓语。

[7] 英国女作家特拉弗斯（P. L. Travers，1899—1996）创作的儿童故事中的角色，又被称为“魔法保姆”，该故事后以电影、音乐电影等形式多次被搬上大银幕。

[8] 《我记得》（*Je me Souviens*）讲述的主要故事是：主人公骑着自行车在夜晚前行，嘴里说着没人能听懂的话，越说越激动，自行车也越骑越快。与莫弗莱斯描述的小佩雷克的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扬的那张脸颊泛红的面庞，然后是安赫莉卡·托伦特吸着德里卡多香烟的希腊人像式侧影，再然后是劳拉带着期待的平静笑容，他们被某种漆黑又精致的能量弧联系到了一起，这可能是眼屎给我造成的幻象，最后，我把毯子拉到鼻子的位置上，我看到房门是开着的，走廊上的植物随风摇动，我又看到一位女租户逐渐远去的身影，她一手拿着卷卫生纸，另一只手里则抓着个以最大音量功放的收音机。

安赫莉卡·托伦特是一小时之前来的，来了之后就一直在跟扬争论什么。当然了，这并非她此次到访的目的，她的目的甚至与此截然相反，她是为了爱情和表白而来的。不过事情出了岔子，两人的顽固劲儿都上来了，于是就陷入争论之中，他们声音很大，但我却一直没被吵醒。争吵的导火索是扬用科幻图书搭建起来的那张桌子。扬带着奇彭代尔^[1]追随者的骄傲向安赫莉卡展示了自己的杰作，而安赫莉卡在惊讶与恼怒的情绪中研究了那张桌子，然后表示那是对文学整体，尤其是科幻文学的侮辱。“书就应该摆在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好，书是给人阅读的，用它们查阅信息也行。可是绝对不能这样对待它们！把它们当成拼装玩具或是普通砖块怎么行呢！”扬辩论说，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经常有人吃书的情况发生：1942年，在塞瓦斯托波尔^[2]就曾发生年轻作家吞食部分法语初版《追忆似水年华》的事件。扬认为科幻文学与非同一般的书柜特别配，例如桌式书柜，这丝毫不会影响到书的内容或书中描绘的冒险故事的价值。安赫莉卡表示用书搭桌子是种愚蠢的做法，而且这桌子的实际用处很小很小。桌子是用来在上面吃饭的，酱汁会洒在上面，还可以把刀叉在上面丢来丢去。我的天啊！扬轻蔑地说道，真是胡说八道！你对我的杰作一点概念都没有！上面还会铺桌布的呀！

有那么一瞬间，两人似乎想要把吵嘴变为动手。两人可能会突然开始自由搏击，面具侠大战长发怪，搏斗的高潮应该是两人纠缠着滚到扬的床垫上，他们会腿缠着腿，手抓对方的后背和肩膀，撕扯抓挠，两人的牛仔裤都褪到膝盖以下。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做出了佯攻的架势，最多就是打了对方前臂几下，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眼神中充满怒火。后来劳拉就来了，于是争论逐渐和缓直至平息。那张桌子压根儿就没引起劳拉的关注。“我刚才在楼梯间看到了一辆摩托车，”她像女先知一样说道，“我肯定那辆车是雷莫的。”

“不，不，不，”扬气喘吁吁地说道，“绝对不可能。我这位被爱包围的同伴只会骑自行车。”

“你赌多少钱？”劳拉就是这种人，当她笃信某件事的时候，她宁愿赌上性命也不愿举手投降。还好她猜中的时候很少，不然恐怕会沉迷于此，不过被她猜中的事情往往会像猎鹰的喙一样尖锐。

“不过，亲爱的，”扬说道，“如果说他到昨天为止还没有摩托，你为什么会坚信他现在就有了呢。”

“那肯定是他的摩托。”

“说‘是’不太合适……”扬疑惑了起来，“顶多是他偷的，不过哪怕是这样……怎么会有人在不会骑的情况下去偷辆摩托车回来呢？”

扬的脑海中飞速闪过一个画面：我签下合同，买下了一辆摩托车。后来他向我坦陈，这种可能性让他惊呆了，因为那意味着他不得不接受某种他不愿面对的情况：我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如果说那辆摩托车是我的话——他越来越觉得这事儿是有可能的了——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将会负债累累，而且这种状况起码要持续五年，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出门找工作了。

“上帝啊，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他说道。

“那辆摩托车很漂亮。”劳拉说道。

“是真的，我上楼的时候也看到那辆摩托车了，”安赫莉卡回忆了起来，“不过我不觉得好看。那辆摩托又旧又丑。”

“为什么你会觉得它丑呢？”劳拉说道。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那辆摩托很旧，到处都粘着胶。”

“你肯定是不仔细看。那辆摩托很有个性。而且上面也没有粘很多胶。实际上，上面只是嵌了几个字，金属的，很有原创性，阿兹特克公主……这应该就是它的名字了。”

“摩托车的名字？”

“真是个细致入微的姑娘。”扬说道。

“啊呀，我觉得给摩托车起名字很俗气，而且还起了个‘阿兹特克公主’这样的名字，啊哈哈。”安赫莉卡说道。

“不，不会是雷莫的车。”扬说道，“不过话说回来，劳拉，你竟然这么细致地研究了一辆摩托车！”

劳拉笑了，她说没错，还说那辆车摆在楼梯间里就像个锈迹斑斑的怪兽，一下子就引起了她的注意，那辆摩托车身上有种什么东西，让她觉得难过，甚至想哭。安赫莉卡说了句“真能胡扯”。我就是那时醒过来的。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执行烦琐的穿衣任务。两位姑娘已经见过裸体的扬了，我怀疑她们觉得在我起床时闭上眼睛或把脸转向墙壁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我什么也没跟她们说，只是在毯子里面穿好裤子，尽可能地收拾好自己。

“那是我的摩托。”

“你看吧？”劳拉说道。

“我是从佩拉维略区的一个孤僻诗人那里买的，等我有钱了我在分期支付给他。”

“也就是说，你永远都不会付钱。”扬说道。

“我会再多找几份工作的。我会参加所有的文学竞赛，竞争所有的文学奖项。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出人头地，到时候我的收入起码得和混得最差的公务员一样多。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没有因为无证驾驶一辆凭空出现的摩托而被抓的基础上。”

“偷来的。”扬说道。

“没错。就是那么回事。不过不是我偷的！它能来到我手上都是命运的安排。你能想象孤胆奇侠在售马会上把‘银子’买下来吗？^[3]不，孤胆奇侠是在草原上遇见‘银子’的。他们相遇了，对上了眼儿。红莱德^[4]的故事也是一样。只有操蛋的霍帕隆·卡西迪^[5]才有钱每年换一匹马。”

“可你不会骑摩托啊。”

“我昨晚学会了，并不是很难。事实上骑摩托是一个心理问题。最大的困难是驾照、警察、红绿灯以及对汽车的恐惧。如果你把这些都忘了，只需半小时你就能学会骑摩托。”

“当然了，”安赫莉卡说道，“就和喝醉酒的道理一样。如果你对一切都不再害怕了，

那么坏事也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大部分交通事故都是驾驶员喝醉酒引发的。”扬嘟囔道。

“不对，是半醉半醒的驾驶员，这差别可大了。半醉半醒的驾驶员很害怕驾驶失误，所以最后就真的驾驶失误了。酩酊大醉的驾驶员想的是别的事情。好吧，事实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很少会真的去开车，他们会爬到床上去的。”

我们又继续聊了一会儿我的摩托车和我在像墨西哥城这样的城市里骑它时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大家（除了我以外）一致认为优点是我可以摆脱交通堵塞的困扰准时赴约或上班了。但他是不会去工作的，劳拉带着谜一般的微笑说道，他要写诗，要在所有的文学竞赛中胜出。的确如此，我说道，所以我其实不怎么需要摩托车，也许灵感缺失的时候你会想要骑上它出去兜兜风也不一定。竞赛？什么文学竞赛？扬精神一振，问道。所有的文学竞赛，安赫莉卡说道。你可以骑着摩托去邮局，为了避免在骑车过程中那些手稿被风吹散，你可以把它们坐在屁股下面。对啊，这个主意不错，我说道。而缺点就是油价了，不过没人对摩托车的油价有概念。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扬和安赫莉卡准备一起出门的时候，我明白劳拉和我之间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了。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说道。我总是支持扬到房间外面走走的，哪怕一天一次也好，不过这次我倒是希望他能留下来。他们两人是搂抱着走出门的，看上去很幸福。扬搂着安赫莉卡的腰，安赫莉卡则摸着朋友的头发。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恐惧。

“到楼梯间去，”扬说道，“我们要去见识见识你那辆摩托车，要是我们够胆的话，说不定还会骑着它绕着伊拉普阿托之花转一圈。”

“别太晚回来。”我说道。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劳拉了，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了下来，气氛像石膏球一样沉重。劳拉坐在扬的床垫上，而我则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劳拉站了起来，也走到了窗户边。我坐回到自己的床垫上，嘟囔了几句关于摩托的话，还提议我俩一起去伊拉普阿托之花喝杯咖啡。劳拉笑了，但什么也没说。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姑娘，我对此已经不存任何怀疑了，而且她也是最直率的姑娘。

“昨晚你说你想跟我做爱。说你想死我了。你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我有些生疏，”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想和你做，那是我最渴望的事情，不过我有些生疏。而且，怎么跟你解释呢，战争给我留下了创伤。”

劳拉笑了，她让我再继续给她讲讲。我慢慢地开始觉得好一点了。我泡了一杯茶，我们俩一起喝，我先是针对天气做了些乏味的评论，然后对她说不久之前我曾被人多次猛踢睾丸，那是智利给我留下的糟糕回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认为自己再也硬不起来了，作为龚古尔兄弟的年轻崇拜者，这种反应怕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过我还能硬起来，我承认道，只不过只有独处时才行。

“智利那边的人为什么要打你呢？”

“啊，这是个谜。扬和我像疯了一样寻找鲍里斯，他是我们的朋友，结果不仅没找到他，连我们自己也栽进去了。”

“连扬也……？”

“对，对，我们是一起挨打的，每次扬哀号一声，我就会紧跟着哀号一声。”

“但是扬可以正常勃起啊，”劳拉说道，“我知道他是可以的。”

啊，我觉得劳拉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和可怕。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既嫉妒又愤怒，那个虚伪的色鬼是什么时候搞上我女朋友的呢？我冷冷地笑了一下，说道：

“是吗？”

劳拉对我说，就在我们聚会的那个夜晚扬和安赫莉卡已经做过爱了。我大概是喝得太醉了，又或是吸了太多大麻，再或是读洛佩斯·维拉尔德读得太投入、太郁闷，总而言之我没发觉那件事。当时安赫莉卡感觉不舒服，她的姐姐和扬一起陪她去了卫生间。事实上当时房间里的空气糟糕到了极点。劳拉在某个晾衣间找见了罗拉·托伦特、何塞·阿尔科和佩佩·科里纳。安赫莉卡和扬不见了。塞萨尔喝得烂醉如泥，他想走了。他乞求着、哀求着，甚至威胁说自己就要吐了，可怜的塞萨尔，可是那些都毫无用处。劳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塞萨尔想跟她在在一个摆满水桶、水管和空清洗剂瓶子的角落里做爱，当时她正倚在那里的栏杆边欣赏街景。他没能成功。劳拉继续慵懒地在屋顶平台上漫步（就像是举着蜡烛在王子的城堡里漫步的公主，她最终是要嫁给他的！），她走到了一个扬十分激动地称之为厕所群的地方。她就在那儿停下了脚步，她有些犹豫，不久之后她听到从其中一间厕所里传出了一些沉闷的声响。她想安赫莉卡可能比看上去的情况还要糟糕，于是决定上前探视一番。她没听错。扬正坐在马桶上，裤子脱到了脚踝处，左手的几根手指捏着根细火柴。安赫莉卡在他上面，骑在他那根挺立的阴茎上。每当火柴烧到手指肚时，扬就会把它扔掉，然后再划亮一根。劳拉悄悄地回到了其他人所在的地方。第二天，安赫莉卡给她讲述了她看到的事情，还补充了一些细节。

“噗！还好还好。”

“什么还好？你的灵魂伴侣在被踢了蛋之后还硬得起来，这事还好？”

“别那么粗俗。我之前以为你和扬睡过了。”

“没有，我和塞萨尔回到了你们晾衣服的地方。那地方挺不错的，你应该让我看看那里白天是什么样子。我命令他在那里干我。我俩差点儿从栏杆那儿掉下去。很快，很快就完事了。塞萨尔喝得太多了，他非常沮丧。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你，我感觉很不错，我想我当时肯定在心里笑个不停。”

“为什么你当时不告诉我呢？那天早上咱俩聊了好几个小时呢……”

“那不关你的事。我当时困了，而且跟你聊得不错，为什么要惹得你和我去争论那些事情呢？”

“我是不会和你争论的。我更可能会哭。妈的。”

“傻瓜，那就像是一场道别。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决定不再和他好了。可怜的塞萨尔，”她坏坏地叹了口气，“我甚至没和他告别，我只是和他那根二十五厘米长的阴茎告别，是我亲手用我妈妈的米尺量的。”

“操，操，操。我永远都不会让你拿着米尺接近我的。”

“我不会的，我发誓。”

[1] 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英国家具设计家和制作者，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

[2] 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城市。

[3] 孤胆奇侠（El Llanero Solitario），又译为“独行侠”，美国知名西部骑警形象。他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广播剧中，后多次被翻拍为电影、电视剧。“银子”是他的坐骑。

[4] 红莱德（Red Ryder），美国知名连环漫画中的牛仔形象。

[5] 霍帕隆·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美国虚构牛仔形象，多次出现在小说、电影中。

亲爱的菲利普·何塞·法默：

可以用性爱或宗教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一切迹象都表明——天知道这是多么黑暗的时代——这两样东西是公民们仅有的选择了。我们暂时把宗教搁到一边。只留下性爱。我们试着赋予它某种有用的功能。先问个问题：美国的科幻作家群体，尤其是您本人，能做些什么呢？我建议立刻成立一个委员会，集中团结起一切力量来。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编一本作品选，收录十个或二十个最激进作家的作品，而且他们必须得十分享受描写肉体关系与未来的主题。（委员会可以自由选择，我只是建议把乔安娜·鲁丝^[1]和安妮·麦卡芙瑞^[2]的某则故事收录进去，我觉得这是不可或缺的，也许我以后会在另一封信中解释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那本选集可以叫《宇宙中的美国高潮》或《春光四射的未来》，要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欢愉上面去，还得不断提醒他们回顾过去，也就是回顾我们目前所处的日子，回顾这条充满努力与和平的道路，只有走过这条路才能到达那片爱的无主之地。每篇故事里都要至少出现一次拉美人和美国人的性爱描写（或者是描写激情的匮乏和纯洁的同志情谊）。举个例子，传奇宇航员、菲德尔·卡斯特罗号宇宙飞船舰长杰克·希金斯^[3]和哥伦比亚籍的航空工程师格洛莉亚·迪亚斯保持着有趣的肉体和精神关系，或者宇宙飞船迫降在BM101小行星上，德梅特里奥·阿吉拉尔和珍妮弗·布朗在那里用十年的时间研读实践《爱经》里的秘法。那些故事都得有大团圆结局。让人绝望的社会现实主义要为人们渴望的幸福服务。每艘飞船里都要混居着各个种族的人，每艘飞船里都要有大量的性行为！与此同时，委员会还应该与美国其他科幻作家取得联系，那些作家可能对性爱主题不感兴趣，也可能由于风格、伦理、商业、情感、情节、美学、哲学等原因而未涉足情爱描写。必须让他们明白对性爱高潮进行描写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希望拉美和美国未来的居民有机会体验到那种高潮的话，现在就必须行动起来。如果他们还是坚持不写的话，那么至少应该说服他们给白宫写信，请白宫停止侵略行径。或者说服他们和华盛顿的主教们一起祈祷，祈祷和平早日到来。但这只是种替代方案，我们暂时先不要把这种方法公布出去。我还要在这封信里表达我对您的仰慕之情。我并非简单地阅读您的小说，而是如饥似渴地读它们。我今年十七岁，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能写出很棒的科幻故事。我从一周之前起就不再是处男了。

一个拥抱，

扬·史瑞拉，别名罗贝托·波拉尼奥

[1] 乔安娜·鲁丝（Joanna Russ，1937—2011），美国作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2] 安妮·麦卡芙瑞（Anne McCaffrey，1926—2011），美国科幻小说家，雨果奖首位女性得主。

[3] 实为英国科幻作家。

墨西哥宣言^[1]

- ^[1] 此部分后经作者修订，收入《未知大学》的手稿中。此处收入的是作者在1984年创作并放入《科幻精神》手稿中的原始版本。——原书注

劳拉和我那天下午没有做爱。当然，我们试过了，但没成功。或者至少我觉得那次没成功。现在我也拿不准了。我们做过爱了，这倒是也有可能。劳拉是那么说的，她还顺便把我引入了公共浴室的世界中，从那时起，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那里都代表着愉悦和游戏。

第一家公共浴室无疑是最好的。它叫蒙特祖玛健身房，某个不知名的艺术家在前台处画了幅壁画，画中，阿兹特克皇帝泡在池子里，只把头露了出来，池边离皇帝不远的地方有些面带微笑的男男女女在沐浴，只不过身形小了许多。似乎所有人都无忧无虑，只有皇帝坚定地望向壁画之外，似乎是在搜索着某个未必存在的窥探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深邃，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恐惧。池水是绿色的，石头则是灰色的。壁画远景是群山和几片风暴云。

照看蒙特祖玛健身房的小伙子是个孤儿，他的身世也就成了我们聊天时的主要话题。我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光顾那里时和他交上朋友的。他的年纪不会超过十八岁，他想买辆车，所以在竭尽所能地攒钱，尽管不多，可他还是会把小费也攒下来。劳拉说他智力不太正常。不过我觉得他人倒是不错。所有公共浴室里都会时不时地出现争吵的场面，可是在那里我们从没碰上，也没听说过。那里的客人们似乎都受制于某种未知的机制，十分遵从小伙子的指示。当然了，顾客实际上也不多，关于这一点我从没找到过合理的解释，因为那儿很干净，也很现代化，连桑拿单间都有，在里面还可以享受到吧台服务，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

就是在那里，在十号桑拿间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裸体的劳拉，我只是傻笑了一下，拍了拍她的肩膀，对她说我不知道扭哪个开关才能把蒸汽放出来。那些桑拿间，准确地说应该叫私人包房，其实是由两个小隔间组成的，它们之间只隔了道玻璃门。第一个隔间里一般会有张长沙发，是那种会让人想起精神分析和妓院的老旧长沙发，除此之外，里面还会摆放着一张折叠桌和一个衣帽架；第二个隔间就是真正的桑拿间了，里面有可以出冷水和热水的淋浴，还会在紧挨着墙壁的地方摆个瓷砖长凳，长凳下面藏着数条管道，蒸汽就是从那里喷出来的。

从一个隔间移动到另一个隔间是很神奇的，尤其是在其中一个隔间里由于蒸汽的影响我们已无法看清彼此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打开玻璃门，钻进有长沙发的隔间里去，一进到里面，一切就都明晰了起来，而在我们身后，蒸汽云也如残存的梦境一般迅速消散了。我们手挽着手躺在长沙发上，听着或者说试图去听从健身房传来的模糊声响，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体逐渐冷却下来。等到我们的身子几乎凉透，完全陷入沉默状态时，我们终于能听清从地面和墙壁中传出的如猫打呼噜般的响声了，发出这种声响的是隐藏在这幢建筑物中某个隐秘地点的管道和锅炉，正是它们在维持着浴室的正常运转。

“总有一天我会迷失在这里。”劳拉说道。

她光顾公共浴室的经验自然比我丰富，这很好理解，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从未迈入过类似场所的门槛。不过她坚称自己对浴室一无所知，至少是了解不多。她曾经和塞萨尔来过几次，在塞萨尔之前还曾陪一个年纪是她两倍的男人来过，每次提到他时，她总会用些神秘的话语来描述此人。她进公共浴室的次数总共不超过十次，而且去的都是同一家，也就是蒙特祖玛健身房。

我们一起骑上那辆贝纳利摩托，那时我已经可以灵活操控它了。在混合着爱恋与游戏的纯粹激情的驱动下，我们生出了逛遍墨西哥城所有公共浴室的想法。我们自然始终未达成这一目标。与此相反，越是推进我们的计划，我们周围的深渊就裂得越大，那是公共浴室巨大的黑色布景。就如同其他城市的隐秘面孔是剧院、公园、港口、沙滩、迷宫、教

堂、妓院、酒吧、廉价影院、古旧建筑，甚至超市，墨西哥城的隐秘面孔就是那张由合法、半合法及地下公共浴室组成的巨大网络。

行程最开始时，我们采用的策略十分简单：我们请看管蒙特祖玛健身房的那位小伙子给我提供几家廉价公共浴室的地址。他给了我五张卡片，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另外十几家浴室的地址。这就是我们最先去的一批浴室了。去过一家后，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搞到更多家浴室的地址。各家浴室的营业时间和它们所在的建筑的外观一样变化多端。有一些我们是早上十点钟去的，在那里一直待到饭点。这些地方通常都光线充足、墙皮斑驳，我们在那里时不时就会听到少年们的笑声和孤独又迷茫的人的咳嗽声，咳过几声之后，他们通常就会哼起博莱罗舞曲。那里会让人感觉自己正身处净界之中，仿佛到处都是亡去孩子们紧闭的眼睛。那些地方不太干净，很可能每天过了中午才打扫一番。还有的地方我们下午四点或五点才去，然后一直待到夜幕降临。（这也是我们最习惯的时间安排。）在那个时间开放的浴室里你似乎总能享受到永久的阴暗光线，不过也可能你会因此而感到受罪。我想说的是，那种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像是被穹顶或树的枝叶遮住的感觉，不过更像是被装进了有袋类动物的袋子里，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惬意，但等到最后肯定会被埋进坟墓还要憋闷。晚上七点、七点半和八点开门的浴室客流量最大。门前的人行道上，年轻人们聚在一起聊棒球和流行歌曲。走廊上回荡着刚从工厂或车间下班的工人们讲的不正经笑话。前台处，老同性恋们如迁徙的候鸟般匆匆而过，他们用洗礼名或绰号来称呼接待员和坐在扶手椅上消磨时间的人。迷失在走廊之中，略微或轻微地放任一下，也不失为收获良多的事情。开着的和半开的门如流失的土层一样晃动，敞开的部分又像是地震造成的裂缝，透过那些门，幸福的窥视者会看到许多鲜活的画面：里面有成群的裸体男人，他们在蒸汽中移动、晃动、跑动；少年们如美洲豹一般迷失在淋浴的迷宫中；运动员、健美人士和孤独者的表情细微而可怖；一位麻风病人悬挂着的衣服；喝着璐璐牌汽水的老人们微笑着倚在土耳其浴室的木门上……

在那里很容易交上朋友，而我们也确实交了几个朋友。情侣们只要在走廊里碰上几次，就会觉得有必要和对方打个招呼。这可能也与异性相吸的法则有关。在许多公共浴室里，女性顾客只占少数，因此经常会有人讲些关于攻击和骚扰的离奇故事，当然了，那些故事八成是编出来的。在那里建立起的友谊通常仅限于一起在吧台喝杯啤酒或是别的什么饮料。进了浴室大家就只是打打招呼，最多是选相邻的浴室。过上一会儿，先洗完的人会敲敲隔壁浴室的门，也不等对方开门，就只是说他们会在某餐厅内等对方。然后隔壁浴室的人在洗完后会前往那个餐厅，大家一起喝几杯，然后就各回各家，直到下次再在浴室见面。有时在这样的朋友面前大家也会表露心事，女人或男人都是如此，尤其是结了婚的人就更愿意打开心扉了，不过这种谈话自然不会在夫妻双方之间展开，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而听者只需要表示认可，或者说些爱情啊，遗憾啊，命运啊，孩子啊之类的话。温馨又无聊。

还有另一种更加混乱的友谊，大家会互相拜访彼此的隔间。这种交往可能也会像上面那种一样无聊，不过却要更加危险。他们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现身，直接用急促而古怪的方式敲门，说把门打开。访客通常不会独自前来，几乎总是三人一组，两男一女，或者全是男人。这种来访的借口大多很不可信，或者愚蠢透顶，例如一起抽几口烟叶，在公共浴室里当然不能干这事，再如售卖东西。劳拉每次都会放他们进来。最初几次我很紧张，甚至做好了生死相搏、血溅隔间的准备。因为我觉得那些人最合理的动机就是抢劫我们或是强暴劳拉，甚至会强暴我，我往往会紧张得起一身鸡皮疙瘩。访客们自然也明白此中道理，所以他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或者必须表达礼貌的时候才会跟我说话。所有提议、交易和私语都是针对劳拉的。是她给他们开的门，是她主动问他们在卖什么东西，也是她让他们进入带长沙发的隔间（我在蒸汽间听着他们坐下的声音，第一个人坐下了，再一个，

又一个，劳拉平静的背影透过门玻璃隐约可见，就是那扇门隔开了蒸汽间和那个突然之间变得异常神秘的隔间）。最后我也站了起来，在腰上围了块浴巾，走进那个隔间。访客通常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他们一看见我就会谨慎地冲我打招呼，好像从最开始他们就是冲着劳拉来的，而非冲着我们两人，又像是他们只想在我们的浴室里找见劳拉一人，真是不可理喻。他们坐在长沙发上，漆黑的眼睛不放过劳拉任何细微的动作，与此同时，他们的手在机械地卷着烟叶。他们之间交流用的语言是我不熟悉的，至少不是年轻人惯用的说话方式，我当时已经对墨西哥城年轻人的说话习惯了然于胸了，不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他们用的是一种更造作的行话，每个动词和句子都带着股墓穴的死气。（扬曾经当着劳拉的面说那可能是空中墓穴，是无瑕墓穴的众多疯狂面貌之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不管怎么说我也参与到交谈中了，或者我曾试着参与进去。这可不是件容易事，但至少我试过了。有时候他们还会拿几瓶酒出来配着大麻喝。酒不是免费的，不过我们也没付过钱。访客们做的生意就是在隔间里卖大麻、威士忌和海龟蛋，接待员和清洁人员通常是不会允许他们做这些买卖的，所以总是毫不通融地追踪他们，因此能有人在隔间里收留他们对这些人而言就显得异常重要了。他们也愿意收钱表演，实际上他们也可以出去演，例如去付钱人的单身公寓表演。这些流动剧团的剧目可能十分有限，但也可能五花八门，不过演出的基本要素是相似的。年纪大些的男人留在长沙发上（我猜他是在思考），而小伙子和姑娘，或者两个小伙子，会和观众回到蒸汽间里。表演的时长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观众有时候会参与表演，有时则不会。表演结束后，长沙发上的男人打开门，向尊敬的观众宣布表演结束，蒸汽往往会使他咳嗽连连，他恨不得立马退回到摆着长沙发的隔间里。返场表演价格昂贵，而且往往只持续十分钟。年轻的访客们快速冲澡，然后从年长男人手中接过衣服，身子还没干彻底就会把衣服穿上。那位思考者兼艺术团团长极有事业心，他会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向心满意足的观众们兜售放在筐子或箱子里的食品：纸杯盛的威士忌，行家亲自卷的大麻卷，已被他用拇指的长指甲剖开的海龟蛋，这些蛋会被倒进纸杯里，再调上柠檬汁和辣椒。

在我们的隔间里情况则不同。他们压低声音说话，抽大麻。他们的脸上会慢慢覆满汗珠，他们就这样任由时间流逝，只是偶尔会看看表。有时他们会碰到彼此，我们也会，毕竟所有人都挤在那张长沙发上，这种事是无可避免的，大伙的腿脚胳膊互相摩擦，最后可能会产生痛感。不是性爱方面的那种痛苦，而是不可饶恕的迷失之痛，是仅有的微小愿望荒废在（行走在）不可能国度中的痛。如果是熟人的话，劳拉会邀请他们脱光衣服和我们一起到蒸汽里去。他们很少会接受这种邀请。他们更喜欢抽大麻、喝酒、听故事，还有休息。又过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合上箱子走人。不过他们还会回来，再做同样的事情，一个下午来回两三次吧。劳拉如果心情好的话就会给他们开门，反之则连请勿打扰之类的话也懒得回。我们和那些人之间除了拌过一两次嘴之外，其他时候相处得都还算融洽。有时我觉得那些人早在认识劳拉之前就已经很欣赏她了。

一天晚上，负责带人过来的老家伙（那次来了三个人，一个老头和两个小伙子）问我们想不想看场表演。我们从没看过。多少钱？我问道。不要钱。劳拉说，那来吧。蒸汽间还不热，劳拉解下浴巾，转动开关，蒸汽开始从地上冒出来了。我感觉我们正身处纳粹毒气室里，马上就要被毒死了。当看到进来的是两个干瘦黝黑的小伙子，后面跟着的揽活老头只穿了条脏得无法形容的内裤后，我的那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劳拉笑了。小伙子们站在屋子中央，盯着她，显得有点拘束。后来他们也笑了。那个老头没脱下那条可怕的内裤，一屁股坐到了我和劳拉中间。你们只是看看，还是既欣赏也参与？就只看看，我说道。

“看情况吧。”劳拉很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方式。

就在那时，两个小伙子就像听到了指令一样，突然跪了下来，开始往对方的生殖器上打肥皂。他们的动作熟练又机械，似乎流露出某种疲惫感，同时又带着轻微的颤抖，可能是由于劳拉在场的缘故。一分钟过去了。房间里又满是蒸汽了。两位演员保持最初的姿势不动，就像是冻僵了一样，他们面对面跪着，不过跪的姿势却带着种奇特的艺术气息，他们用左手给对方手淫，右手则保持着平衡。真像鸟啊，就像是用金属薄片拼成的鸟。他们应该是累了，所以还没有勃起，老头说道。事实上，两根打满肥皂的阴茎只是羞涩地微微上挺。小家伙们，可别把它们磨细了，老头说道。劳拉又笑了。你一直在笑，我们怎么能集中注意力呢？其中一个小伙子说道。劳拉站了起来，走到他们身边，靠墙站着。此时，在她和我之间多了两个疲惫的表演者。我感觉时间仿佛在我的体内炸裂开来了。老头嘟囔了句什么。我看了看他。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我们已经很久没睡觉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松开了同伴的阴茎说道。劳拉冲着他笑了笑。我身边的老头开始打呼噜了。两个小伙子轻松地笑了，他们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我听到了他们的骨头咯吱作响的声音。劳拉顺着墙滑坐了下去，直到屁股压上地砖。你太瘦了，她对其中一个小伙子说道。我？他也不胖啊，还有你自己也是，小伙子答道。蒸汽时不时地发出啸叫声，让人听不清别人说话的声音，可能也是因为说话声太小了。劳拉的整个身子，靠着墙壁的后背，抬起的膝盖，全都汗渍渍的，汗珠沿着她的鼻子滑落，流过颈部，汇聚在她的胸前，甚至挂到了阴毛上，最后才滴落到滚烫的地砖上。我们正在融化，我嘀咕道，我突然觉得有些难过。劳拉点了点头。她真可爱啊。我们这是在哪儿呢？我想道。我用手背擦掉了从眉毛往眼睛里钻的汗珠，它们搞得我看不清东西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叹了口气。我真困啊，他说道。那就睡吧，劳拉说道。太奇怪了，我觉得灯光暗了下去，没那么亮了，我害怕自己会晕厥过去，不过转念又想应该是蒸汽过多引起的色彩和亮度的变化，现在确实暗了许多。（就像在欣赏落日，只不过我们是在室内，密不透风，连窗户都没有，我心想。）威士忌和大麻不是好搭配。劳拉像是读懂了我的心思，说道：

“你别担心，亲爱的雷莫，一切正常。”

然后她又笑了，不是嘲讽的笑，也不是开心的笑，而是种终结式的笑，一种夹杂着唯美和凄惨的笑，只不过这样的笑容既不唯美也不凄惨，而是微弱的凄美，真是对相悖的侏儒，移动的侏儒，难以捉摸的侏儒。

“不必紧张，亲爱的，都是蒸汽搞的。”

两个小伙子都认为劳拉说的话无可辩驳，于是不断点着头。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直接躺在了地砖上，头枕着胳膊，睡着了。我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避免吵醒那个老头，然后走到了劳拉身边。我蹲了下去，把脸埋进了她潮湿香润的秀发中。我感觉到劳拉正用她的手指抚摸我的肩膀。过了一小会儿，我发现劳拉好像是在玩耍，她的动作很轻柔，但确实是在玩耍，小拇指在我的肩头漫步，然后无名指走了过来，它们亲吻致意，后来拇指也来了，那两根手指，小拇指和无名指，就向下沿着我的胳膊跑走了，大拇指占领了肩膀，开始睡觉了，我甚至认为它吃了点那里长着的蔬菜，因为我感觉到她的指甲嵌到了我的肉里，后来小拇指和无名指在食指和中指的陪伴下折返回来，它们一起把大拇指吓跑了，后者只得藏身在耳朵后，从那里窥探其他的手指，不明白它们为何要把它赶走，与此同时，其他四根手指开始在肩头跳舞、饮酒、做爱，最后因喝得太醉而失去了平衡，一起从我的后背跌落了下来。劳拉就利用这一意外事件抱住了我，她的嘴唇也贴到了我的嘴唇上，那四根跌伤的手指也趁机开始沿着我的脊椎向上爬，大拇指则始终观察着它们，丝毫没有离开耳朵的意思，因为它和耳朵的关系已经很亲密了。我俩头碰头静静地笑了起来。你真美，我低声说道，你的脸在发光，还有眼睛，乳头也是。你也一样，劳拉说道，可能有点苍白，但是也在发光。蒸汽夹杂着汗味。另一个小伙子静静地观察着我们。你真的爱

他吗？他问道。他的眼睛又大又黑。我坐到了地上，紧靠着劳拉。爱呀，劳拉说道。他肯定疯狂地爱着你，小伙子说道。劳拉笑了。没错，我说道。这并不奇怪，小伙子说道。不，不奇怪，我说道。你知道混着汗味的蒸汽是什么味道吗？这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汗味，不是吗？小伙子靠着他的同伴躺了下去，侧着身子，太阳穴直接贴到了地砖上，但是却没合上眼睛。他的阴茎现在硬了。他用膝盖碰了碰劳拉的双腿，又在开口说话前眨了几下眼睛。咱们来做一小回吧，他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劳拉没回答。小伙子就像是在自言自语一样。你知道小蒸汽珠混上小汗珠尝起来是什么味道吗？会是什么味道呢？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热度使我们昏昏欲睡。老头身子一倒，整个人都躺到了长凳上。睡着的小伙子则蜷缩着身子，不过他的一只手搭在和我们说话的小伙子的腰间。劳拉站了起来，从高处俯瞰了我们一会儿。我想她就要打开淋浴了，这将给那些睡得正香的人带去悲剧性的后果。真热啊，她说道，热得让人受不了，要是他们不在这儿的话（她指的是这三位访客），我肯定会让吧台送杯冷饮过来。你可以这么做呀，我说道，他们又不会进到这里来，只是在门口把冷饮递给你。不，劳拉说道，与那无关，我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不然我把蒸汽关了？不要。那个小伙子歪着脑袋，死死地盯着我的脚看。他大概是想跟你做爱，劳拉说道。还没等我回答，那个小伙子几乎连嘴唇都没动，就简练地说了句不想。我在开玩笑，劳拉说道。然后她跪在了他的身边，伸出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臀部。接下来的那幅画面转瞬即逝可又令人不安，我看见那个小伙子的汗珠流到了劳拉的身体上，她的也流到了他身上。纤长的手指和男孩的屁股同时闪耀着温润的光芒。你大概是累了，那个老家伙是个疯子，他怎么能想着让你们在这里干那种事呢。

“是为了让咱们看啊。”我提醒她道。

劳拉没听到我的话。她的手在小伙子的臀部来回滑动。不是他的错，小伙子嘀咕道，那个可怜人已经不记得床是什么样了。他也不记得穿干净内裤是什么感觉了，劳拉微笑着补充道。他最好还是什么都别穿，就像雷莫一样。没错，我表示认同，这样更舒服。也不会太尴尬，小伙子说道，不过能穿上洁白干净的内裤可真是太棒了，最好是贴身款，但是也不能太紧。劳拉和我笑了起来。小伙子轻柔地责备着我们：别笑，这事很严肃。他的目光有些涣散，那对灰色的眼睛就像是雨中的水泥路一样。劳拉用两只手握住他的阴茎，向外一拉。我听到自己问了句：“我把蒸汽关掉？”但是声音太弱了，还很遥远。你那混蛋经理睡在哪儿呢？劳拉说道。小伙子耸了耸肩。你有点儿弄伤我了，他嘀咕道。我用一只手握住劳拉脚踝，又用另一只手擦掉了正往眼睛里钻的汗水。小伙子挺直了身子，最后坐了起来，他的动作很轻柔，因为不想弄醒同伴，他吻了劳拉。我侧了侧头，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小伙子正用他那厚厚的嘴唇嘬着劳拉的嘴唇，劳拉的嘴是闭着的，不过还是能看出她在微笑。我眯起眼睛。我从没见过她露出如此平和的微笑。蒸汽突然遮住了她。我感受到了阵阵遥远的恐惧，我是害怕蒸汽把劳拉闷死吗？两人的嘴唇分开后，小伙子说他也不知道老头睡在哪里。他把手抬到颈部，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然后又摸了摸劳拉的脖子，把她又拉近了一些。劳拉的身子弹性十足，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姿势。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墙壁，她依然能透过蒸汽看到墙壁，她身体前倾，乳房摩擦着小伙子的前胸，或是轻轻地压在了小伙子的前胸上。蒸汽暂时淹没了他们的身形，或是让他们变得若隐若现，就像是镀了层银，又像是把他们包裹在了梦境之中。到了最后，我已经不可能看到她了。先是只能看到一个影子叠加在另一个影子上，再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房间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了。我又等了几秒钟，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相反，我觉得蒸汽越来越浓了。

（我问自己老头和另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睡得这么死呢。）我伸出一只手去，我摸到了劳拉的背，背是弓着的，下边应该是那个小伙子的身子了。我站了起来，沿着墙走了几步。我感觉劳拉正在呼唤我。雷莫，雷莫……你想要什么？我说道。我快憋死了。我又退了几步，没有前进时那么谨慎了，然后我弯下身子向着我认为他们所在的位置摸了过去。我只

摸到了滚烫的地砖。我想我是不是正在做梦，还是说我正在变疯。劳拉？我的身边响起了那个小伙子的声音，据他所言，混上汗味的蒸汽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又站了起来，这次我做好准备进行盲踢了，管他会踢到谁呢，不过我忍住了。关掉蒸汽吧，劳拉的声音从某个位置传了过来。我磕磕绊绊地来到长凳处，弯下身子准备寻觅蒸汽开关，就在这时老头的鼾声几乎就响在我耳边。他还活着，我心想，然后关掉了蒸汽。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在众人的身形逐渐可辨之前，有人打开门离开了蒸汽间。我等待着。那个去了另一个房间的人搞出很大的声响。劳拉，我低声叫道。没人回应。最后我终于看到了那个老头，他还在睡觉。两个演员躺在地上，一个蜷缩着身子，另一个则四仰八叉地躺着。失眠的那位看来真的已经睡着了。我从他们身上跨了过去。劳拉已经在摆着长沙发的隔间里穿好了衣服。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怎么了？我说道。咱们走，劳拉说道。

我们后来又跟那三个人碰上了几次，有一次是在那同一家浴室里，还有一次是在阿斯卡帕萨科那边，按照劳拉的说法，那边的浴室都是些地狱浴室，不过我们再也没像那次一样和他们相处。最多就是一起吸烟，然后就说了再见。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坚持光顾那些浴室。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做爱，不过公共浴室之旅似乎就像磁铁一样对我们有特殊的吸引力。当然了，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小插曲，例如几个着了魔似的男人在走廊上赛跑，有人想强暴劳拉，还有人想抢劫我们，我们靠运气和智慧避开了所有这些磨难。智慧属于劳拉，而运气则来自洗浴者们的团结。所有那些浴室里的经历，如今都已经和劳拉微笑的面庞混合在了一起，我们从那些经历中提炼出了对彼此之间爱情关系的确信。最棒的一次经历是在蒙特祖玛健身房，也许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做爱的，所以经常会回到那里。而最糟糕的经历则发生在阿莱曼之家中的一家浴室，那里也被恰当地称作“漂泊的荷兰人”，那是我们见过的最像停尸间的地方。而且从三个层面上来看都像停尸间：卫生状况、阶级状况和里面那一具具肉体的状况。这一论断与欲望无关。

在有关那段日子的记忆中，有两样东西我至今仍难以忘怀。首先是一系列裸体劳拉的画面（坐在凳子上，躺在我怀里，站在淋浴下，倒在长沙发上，思考着），直到蒸汽缓缓变浓，最终把那些画面全部吞没，剧终，空白图像。再就是蒙特祖玛健身房的那幅壁画。蒙特祖玛深不可测的目光，蒙特祖玛露出水面的脖子，他的那些笑着交谈的随从（也可能不是随从），他们努力想要忽略他们的皇帝看见的东西。远景中，群群飞鸟和层层云团交织在一起。池子里石子的颜色毫无疑问是我在那些冒险中见过的最悲伤的色彩，只有走廊里工人们眼神中流露出的色彩可与之相比，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但毫无疑问是存在过的。

布拉内斯，1984

译后记

在为《科幻精神》而作的《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大箱子》（*El arcón de Roberto Bolaño*）一文中，墨西哥文学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多明戈斯·米歇尔（Christopher Domínguez Michael）写道：“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大箱子一样，人们也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大箱子里不断发现在他生前未出版的书稿。”我们不知道波拉尼奥的大箱子里还藏着多少东西，可是像《科幻精神》这样的早期作品依然能带给我们这些“波拉尼奥人”足够多的惊喜。

根据波拉尼奥手稿留下的信息来看，《科幻精神》的创作始于1980年，“完稿”于1984年，是与《佩恩先生》《莫里森的学生给乔伊斯粉丝的建议》同时期的作品，是1977年离开墨西哥远赴欧洲的波拉尼奥对那段墨西哥岁月的追忆结出的硕果。波拉尼奥曾经说过：“在墨西哥，我过着非常文学的生活。被作家们包围，处在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的世界。在巴塞罗那，我开始进入没有作家的世界。”在许多“自我流放”到欧洲的拉美作家之间有一种默契，认为远离故土是为了（才能够）更好地理解那片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幻精神》就是波拉尼奥的一次回首和反思，是对与好友圣地亚哥等人共同推动“现实以下主义”运动、跑到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讲座现场砸场子的那段无畏岁月的总结。

乍看上去，《科幻精神》的叙事结构十分简单，可实际上波拉尼奥对其进行了精心设计。小说包含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它们齐头并进，相互交织，在时间和空间的层面都创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性。第一条主要线索是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某位小说家在获文学奖后接受采访，随着情节的展开，他会逐渐讲述那部获奖作品的情节内容。第二条主要线索则是爱好文学的智利青年扬·史瑞拉和雷莫在1970年代在墨西哥城的生活经历。这条主线又可以拆分成四条辅线：雷莫与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何塞·阿尔科针对墨西哥城出版的文学刊物数量进行调研活动，扬在他与雷莫租住的阁楼上做千奇百怪的梦，扬不停给他喜爱的科幻文学作家写信，雷莫和劳拉产生爱情。波拉尼奥文学宇宙的许多经典元素出现在了这两大四小叙事线索之中：追寻、激情、执着、勇气……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很少能看到死亡、暴力、残酷、毁灭等后来频繁出现的那些让人心悸的主题，所以我会觉得存在着两个波拉尼奥：一个是写出了《科幻精神》《荒野侦探》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怀揣梦想，勇敢无畏，哪怕一再失败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写出了《智利之夜》

《2666》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看透了人性的本质，如最终审判的记录官一般将人类之恶记录下来。

可能正因为《科幻精神》和《荒野侦探》在主题上的相似性，许多评论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草稿”或“前身”，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科幻精神》对文学青年们在墨西哥城的生活的描写像极了微缩版的《荒野侦探》，而且结合遗存手稿显示的内容来看，波拉尼奥本想在现有故事的基础上扩展对雷莫、何塞·阿尔科等“摩托诗人”的描写，最后还会让雷莫和扬放弃文学、加入游击队，这种“文学梦起—梦碎”的设计也同样与《荒野侦探》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恰恰因为这些内容没有被创作出来，使得我们手中的《科幻精神》成了异于《荒野侦探》的文本，我们也许可以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就如同70回本和120回本《水浒传》的关系一样，篇幅上较短的版本在读者的情绪被调动到顶峰的时刻给文本画上休止符，读毕此书，我们的脑海中不会萦绕着索诺拉沙漠的黄沙和蒂娜赫罗的鲜血，只会有类似如下的场景盘旋在眼前：一对青年男女没在蒙特祖玛公共浴室的氤氲雾气中；诗人们骑着摩托飞驰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一个身高一米七六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蓝衬衫，顶着太阳站在美洲最长的大道边，眺望着他和友人的未来……

依稀记得读者“《荒野侦探》里既没有荒野也没有侦探”的抱怨（实际上书中既有“荒野”又有“侦探”），这样看来也许这篇文字也有义务对本书书名做一点（私人）解读。尽管有不少关于梦境、小说内容等虚构场景的描写，但《科幻精神》依然是一本更趋近现实的小说，而绝非科幻文学作品。上文提及的克里斯托弗·多明戈斯·米歇尔认为科幻对波拉尼奥而言更多意味着一种精神状态，是对逝去时光的逆向追寻。我赞成这个定义的前半句，却对后半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科幻对于波拉尼奥来说还意味着对未来时光的无尽幻想。幻想也是科幻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对未来的大胆想象，科幻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了。所谓科幻精神，就是通过想象建构希望，进而追逐希望的过程，哪怕这种希望如科幻一般虚幻。这正是扬和雷莫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何塞·阿尔科、安赫莉卡姐妹等“摩托诗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美国科幻作家成立协会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甚至“在政治领域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诸如此类的幻想正如科幻文学般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可我们真的愿意当那种终此一生都从未“异想天开”过的人吗？这也许也是“科幻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

波拉尼奥曾经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全部写作都是献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情书或告别信”，如果说《荒野侦探》先被写成了情书又被改写成了告别信的话，《科幻精神》就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单纯情书，不管是情书还是告别信，它们都足以让我们心潮澎湃，进而再次鼓足勇气，心甘情愿地“奉献一切却不求回报”，心甘情愿地“既愚蠢又高尚”，心甘情愿地做那些也许注定会失败的事情。

既然波拉尼奥的文字高明得多，那么译者也就没有必要笨拙地写些长篇大论了，但是在停笔之前，请容我摘录书中的几句话，在我看来，这些话正是波拉尼奥“科幻精神”的浓缩：

“我写了一整晚。”

“你不冷吗？”

“冷得很。妈的，我还以为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挨冻呢。”

“天快亮了。”

侯健
2021年11月21日，西安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1](#)

[2](#)

[墨西哥宣言](#)

[译后记](#)